

#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第四期(总第九十二期)第二十三卷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2021  
第4期

2021年12月 第4期(总第92期)第23卷  
Dec.2021 No.4 Sum.92 Vol.23



#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召开云南统一战线智库建设座谈会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和省委印发的《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精神，坚持开放办学、联合办学，加快推进云南统一战线智库建设，9月23日，云南省



社会主义学院召开云南统一战线智库建设座谈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科研部、省委统战部、省委政策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委党校、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相关部门负责人，重庆社会主义学院、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青海省社会主义学院智库负责人、有关专家，省社科联、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智库负责人

共20余人参加座谈，学院常务副院长何云葵出席座谈会并作总结讲话，学院副院长陈友康教授主持座谈会。

与会专家积极交流和分享智库建设做法和经验，对如何加强和推进云南统一战线智库建设提出意见建议。与会专家还在智库定位、开放科研、资源整合、队伍建设、项目管理、资金投入、资政发声、成果转化运用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为学院办好云南统一战线智库和做好决策咨询工作指明了方向、开出了“药方”。

何云葵指出，座谈会务实高效，成效显著。一是明确了发展方向。统一战线智库，就要聚焦统战、服务统战，努力成为全省高水平的统一战线研究平台。二是补齐了工作短板。与会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对提升云南统战智库平台的作用、破解云南统战智库建设面临的困难、补齐云南统战智库发展存在的短板有很大帮助。三是增进了友谊。任何智库都有相对明确的学科指向和领域范围，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专家的观点相互印证、思想相互碰撞，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增进了解、形成共识，这也是统战智库发挥统战作用的具体表现。



何云葵表示，会后省社院将针对现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在智库的运行管理、成果报送、队伍建设等方面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把牢政治方向，形成工作

合力，全面提高云南统一战线智库发展水平，助推云南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

学院党组成员、秘书长谢灿坤，相关处室负责人，全体教师参加座谈会。

（文字：念兴昌 图片：罗雷 责编：郭周静）

#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刊·2021年第4期(总第92期)

## 本刊顾问

杨保建 徐 彬 高 峰 李玛琳 喻顶成  
张宽寿 杨 洋 李学林 杨晓红

##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蔡 勇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 主 任:陈友康 杨春禄 袁光兴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寅平 李从贤 杨松禄 钟瑞华

侯晓芳 诸 芳 黄 梅 谢灿坤

魏贵华

主 编:陈友康

执行主编:王寅平

副 主 编:杨松禄

## 编辑部

主 任:王寅平

副 主 任:杨松禄 罗 雷

责任编辑:念兴昌 李亚强 朱家麟

英文翻译:李志凌

封面设计:严维国

编 务:郭周静

#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 目 次

### ●建党百年

- 百年党史中党内主题教育的特点规律与价值启示 ..... 祝 滢 (5)
- 百年大党理论自信的历史透析与时代启示 ..... 赵庸棕, 孙发平 (13)
-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 李俊余, 刘会柏 (22)

### ●统战理论与实践

-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 形态与逻辑 ..... 骆 平 (30)
- 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历史演进 ..... 董海军, 邹娟婵 (37)
- 统一战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云南实践研究 ..... 王寅平 (45)
- 云南统一战线智库建设座谈会综述 ..... 李亚强 (53)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边境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研究  
——以云南 W 学院为个案 ..... 兰良平 (58)
- 云南民族团结经验示范的三重维度 ..... 杨松祿 (64)
- 云南各民族共同性的历史形成与强化路径 ..... 叶 莹 (69)

[期刊基本参数: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5\*2021-12]



● 法治建设

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反腐法治理论的三重逻辑 ..... 戴晓静, 张茂杰 (78)

论犯罪预防的依据及措施 ..... 路云珊 (88)

● 文化建设

文化治边视角下的边疆统战文化建设 ..... 杨睿哲 (94)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红色抗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李际卫 (103)

明清云南少数民族诗词中的“国家认同”研究 ..... 高云翔 (109)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年 1—4 期 (总第 89—92 期) 总目 ..... (119)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4, 2021

## Contents

### The Centennial of the CPC

- Characteristics with Regularity and Values of Intra-Party Thematic Education on CPC's  
Centenni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Inspiration ..... Zhu Ying (5)
- Historical Perception into the Great Party's Theoretical Confidence and Its Enlightenment in Times  
..... Zhao Yongcong, Sun Faping (13)
- Hot Topics and Tendencies of Researches on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Based on CiteSpace Analysis  
..... Li Junyu, Liu Huibai (22)

###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Front

- The Centennial Development of the CPC' United Front: Forms and Logic ..... Luo Ping (30)
-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Formation of the CPPCC's Preferable Discourse Power  
..... Dong Haijun, Zou Juanchan (37)
- On the United Front's Promotion of th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Ethnic Minorities' Residential Areas  
on the Border: Practice in Yunnan ..... Wang Yinping (45)
- A Review of the Seminar on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ed-Front Think Tank ..... Li Yaqiang (53)

### The Chinese Nation's Aware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 Bordering-College Students' Awareness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A Case Survey on University  
W in Yunnan ..... Lan Liangping (58)
- Triple-Dimensional Demonstration of Experience in Yunnan's National Solidarity ..... Yang Songlu (64)
-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All Peoples' Shared Community in Yunnan and Ways to Intensify It  
..... Ye Ying (69)

### Construction of Law-Based Governance

-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iple Logic in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Theory of Law-based Governance against  
Corruption ..... Dai Xiaojing, Zhang Maojie (78)
- On Basis and Precautions to Prevent Crimes ..... Lu Yunshan (88)

### Cultural Development

-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Front on the Bo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based Governance  
in Bordering Areas ..... Yang Ruizhe (94)
-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Gang-Jiu Independent Brigade of Dongjiang  
Column in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 Li Jiwei (103)
- A Study of Yunnan Ethnic Minorities' Poetic Expression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Gao Yunxiang (109)
- General Catalogue of Journal of YNIS in 2021 Issues 1-4 (Total Vol. 89-92) ..... (119)

建党百年

# 百年党史中党内主题教育的特点规律与价值启示

祝 滢

(中共金华市委党校, 浙江 金华 321000)

**摘 要:** 重视党内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色, 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本文回溯考察了建党百年党内主题教育的不凡探索历程, 从教育动因与内容、教育模式和方式、教育成效与影响等角度阐释了党内主题教育的特点与规律, 从实践、理论、现实、历史、创新等维度阐述了其价值所在, 昭示了只有始终坚持理论、思想、政治、行动、创新自觉, 突出理论强党、问题导向、人民至上、紧抓关键少数、理论联系实际, 才能不断开辟党建的新境界。

**关键词:** 建党百年; 党内主题教育; 历程考察

**中图分类号:** D2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1) 04-0005-08

重视党内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与鲜明特色。《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sup>①</sup>。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 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百年来, 在不同历史时期, 面对不同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多次卓有成效的各具时代特色的党内主题教育, 为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定全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回顾与研究百年历次党内主题教育历史, 对于做好新时代党建工作, 极具借鉴价值。

## 一、党内主题教育百年历程回溯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既是一部波澜壮阔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 也是一部与时俱进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教育, 不断保持先进性,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跳出“其兴也勃, 其亡也忽”历史周期率, 不断发展壮大, 走向成熟、成功的党建史。依据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特点和现实需求, 笔者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革命从此掀开崭新的一页。建党初期, 中国共产党缺乏能有效地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党建的经验。遵义会议后, 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先后于1941年至1945年、1947年至1949年, 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以及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三查三整”整党运动。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 这场马克思主

**作者简介:** 祝滢, 中共金华市委党校教师, 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城市经济。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021年11月16日,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2021年12月12日。

义思想教育运动开创了党内集中教育之先河,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统一和团结,最后整风运动所形成的“延安作风”<sup>①</sup>彻底打败了“南京作风”<sup>②</sup>,使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发展从此进入了新纪元。

####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为了更好地应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局势,解决好党内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1951年至1954年、1957年陆续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等党内主题教育活动。其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干部理论学习和知识培训,整顿基层组织,坚决惩治腐败,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了党的建设,成为一个坚强团结的党、一个行动一致和努力奋斗的党,确保了新生政权的巩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飞跃和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也预示着党的建设进入了新征程。在深刻反思“反右扩大化”“文革”,总结过往党内主题教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分别于1983年至1987年、1999年至2000年、2005年至2006年、2008年至2010年、2010年至2012年,先后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党的建设,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和国家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以及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于2013年至2014年、2015年、2016年至2017年、2019年至2020年,密集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2021年,正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总要求,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深入推进。这些主题教育活动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既是与党的历次主题教育一脉相承,更是对以往主题教育的深化和升华,体现了党内主题教育的连续性和常态化,“促进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sup>③</sup>。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全面落实,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全面推进,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实现了马克思

<sup>①</sup> 延安作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为把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抗日的堡垒”“民主的模范”,毛泽东积极倡导一种以勤俭、平等、民主、亲民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风尚——延安作风。延安作风的形成和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以及后来民族解放战争的进程。

<sup>②</sup> 南京作风。指与“延安作风”形成鲜明对比的国民党作风。国民党作风恶劣,弃民如草芥,好逸恶劳、贪婪腐化。作风背后是人心向背和民力的兴替。

<sup>③</sup>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月9日,第1版。



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全党奋进新时代，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厚实的思想基础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 二、党内主题教育特点与规律考察

综观建党百年党内的主题教育活动，虽然其主题内容、活动要求、方式方法等不尽相同，但在教育动因、教育模式与路径等方面有着诸多的规律性。

### （一）教育动因与内容：“社会矛盾+党建危机”双倒逼

历次党内主题教育基本都是在党的事业发展面临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展开的，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社会矛盾与党建危机“双倒逼”，历史性与时代性缘起“双结合”。

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在抗日战争紧要关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经曲折，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全党带来很大的思想混乱的情况下展开的。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新增的76万党员中90%是农民、小资产阶级人士，他们的世界观亟需改造<sup>①</sup>；1941年1月突发“皖南事变”等，诸多因素叠加，催生了延安整风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党的自身建设也遭遇新的历史性课题。1949年新增党员140万，不少新党员理想信念不坚定、思想作风不纯，享乐主义、官僚主义、“功臣”思想、命令主义直接损害党的形象。1950年，面对“胜利来得太快太大，新党员新干部太多太杂，新任务太多太紧，某些政策方面的前进太快太远，来不及准备，来不及学习”<sup>②</sup>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新中国首次整风运动；1951年至1954年，整党再次展开，为新中国顺利开展各项工作奠定了基础；1957年，已在全国范围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对不断滋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再一次开展整风运动，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拉开序幕。针对受十年“文革”影响，党内普遍存在着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进入改革攻坚期，党内“三不讲”正严重阻碍党的路线方针、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现状；随着改革深入与对外开放扩大，部分党员受各种思潮侵蚀存在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展整党（1983年）、“三讲教育”（1999—2000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2005—2006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008—2010年）、创先争优活动（2010—2012年），积极探索现代化建设条件下的执政党建设，全力保障改革开放向前推进。

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冷战思维与霸权，以及党内面临的理想信念淡化、为民宗旨意识淡薄、执政素质不强、基层组织涣散、“四风”严重等的双重考验，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展了“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党史学习教育等主题教育，比如2019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新时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生动实践。

### （二）教育模式和方式：“传承+变革”双推进

历次党内主题教育既学习借鉴优秀传统，又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创新、超越、完善，呈现传

<sup>①</sup> 陈至立：《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6页。

<sup>②</sup> 《胡乔木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承性与创新性“双融合”，使主题教育常抓常新。

历次党内主题教育始终坚持完善“批评+自我批评”模式，党内民主因此得到大力弘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的有力武器。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使全党接受了一次极其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既达到了廓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也为后来党内统一思想、纠正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1957年的整风运动，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获得了新的团结。改革开放以后，1983年的整党，始终强调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使得党内组织生活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2013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过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及时发现部分党员思想和作风上存在的隐患并帮其化解，使其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历次党内主题教育始终坚持完善“理论学习+实际工作”方式，实现党建与业务工作双赢。历次主题教育，都对党员进行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从而使全党思想认识达到高度统一。如1947年至1949年的整党运动，通过“三查”“三整”，“打通思想，整顿组织，纪律制裁”，使得基层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有了很大进步。1951年的整党，也是结合当时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开展增产节约的主要任务展开的，同时以提高干部思想、严肃国家法纪、推动各项工作为目的。1999年的“三讲”教育，把学习理论、武装头脑同整顿思想、改进作风相结合，着重解决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腐倡廉、用人以及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密集开展的主题教育更是如此，如“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把专题教育与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结合，以解决问题的成果检验教育的成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动党内主题教育从“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向普通党员、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双延伸”；“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现教育活动与改革、发展、稳定中心工作双结合双促进双丰收。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入展开，更是以史为鉴，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 （三）教育成效与影响：“先进性+纯洁性”双提升

从教育成效与影响看，党内主题教育具有重大影响力和旺盛生命力，并与时俱进呈现常态化、规范化、法制化态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实现“双提升”，成效实现系统性、全局性“双治理”，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历次党内主题教育通过依靠党自身力量，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问题以及某些重大思想认识分歧和突发性事件进行专题斗争、引导和治理，实现自我净化、自我提高，让人民感受到党风的明显变化。正因为始终保持着这种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才能乘风破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历次党内主题教育都坚持人民至上，紧贴群众诉求，抓住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的突出问题，推进党内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消除了一些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因素，因此每个主题教育都取得扎实成效，都能高分回答“窑洞之问”。

## 三、党内主题教育的价值阐释

历次主题教育，既蕴含着重大实践、创新与理论价值，又蕴含着重大现实和历史价值。

### （一）具有重大实践价值

站在实践价值维度，开展党内主题教育始终是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建设的有效路径，对于坚定党员理想信念、巩固党的领导地位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历次主题教育，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越来越坚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不断增强。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sup>①</sup>。历次主题教育实践与探索告诉我们，通过开展党内主题教育，可以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以长远眼光和战略高度看待全局，从整体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问题，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通过开展主题教育，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执政之基更加稳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总览中国共产党这百年发展，繁重的历史任务和严峻的危险考验要求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历史阶段，都必须重视解决党内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实现正气充盈、政治清明，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服务人民群众、投身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开放的能力，经受住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肩负起时代重任、人民重托，不断夯实执政之基。

### （二）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站在理论价值维度来看，主题教育既是党内的学习教育活动，更是党的思想建设工程，其继承、发扬、创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与时俱进地丰富了我党思想建设的深刻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形成诸多独创性理论成果，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通过历次主题教育，党的思想建设的传统理论得以弘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问题，通过顺应时代发展，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密集地开展一系列理论联系实际的主题教育活动，在继承中弘扬，在弘扬中创新。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党员和广大群众，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特别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实事求是地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实践经验，形成三大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决议（即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实现了从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毛泽东思想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性飞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推动党的建设全面进步，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各个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完成了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马

<sup>①</sup>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7月17日，<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17/c397563-27322256.html>,2021年11月10日。

克思主义理论自觉自信不断增强。

通过历次主题教育,党的思想建设的传统理论得以发展,推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武装的与时俱进。“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sup>①</sup>百年以来,通过主题教育,中国共产党始终得以用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的科学理论教育与武装全党,从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毛泽东思想、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科学回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的科学发展观,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指导思想和理论水平的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科学指引。

### (三) 具有重大现实价值

站在现实价值维度来看,历次主题教育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开放等紧要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认识和实践行动,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解决现实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的有效措施。

历次主题教育,坚持问题导向,保证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开展,营造党内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折射的是一个政党政治生活的大环境和大趋势。开展主题教育,应直奔主题、直面问题,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坚忍不拔的韧劲,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问题作坚决斗争,营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良好政治生态,把党建设得更具生机活力,更加坚强有力。

历次主题教育,坚持人民至上,使党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②</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密切联系群众,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脱离人民群众,党就会失去根基与基础,就会遭受挫折、面临失败的危险。通过开展主题教育,中国共产党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广大党员思想和行动中,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拥护,并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把党的各阶段的目标任务、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

### (四) 具有重大创新价值

站在创新价值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的历次党内主题教育是一个传承和创新的过程,既有很强的共性,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与价值。

历次主题教育,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历次主题教育活动,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注重吸取以往党内主题教育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时代特点和历史任务,与时俱进地创新党内主题教育方针与策略、模式与机制、方法与举措等,形成诸多宝贵经验和丰富遗产,具有重大历史价值。进入新时代,更要全面总结、积极吸收和借鉴以往党内主题教育的经验,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98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77页。



不断推进主题教育的常态化、正规化、系统化、制度化、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强人民群众的参与、监督，不断提升广大党员的党性修养、理论素养、执政能力、斗争能力等。

历次主题教育，凸显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勇于创新的精神。百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有许多的经验值得回顾、总结与提升。特别是新时代，教育模式从过去“运动模式”发展为“活动模式”和“常态化学习模式”；教育方法通常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使教育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学习方法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把现实问题同历史问题结合起来，通过剖析对比来促进党员的认同与提升；教育方针坚持“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教育机制往往呈现阶段性、长效性相结合，集中性、系统性与经常性教育相结合，推进教育正规化、系统化、制度化；教育成效实现从单一性治理推进到系统性、全局性治理。

#### 四、党内主题教育的现实启示

百年党史中，历次党内主题教育的不凡历程与实践经验说明，开展积极有效的主题教育，必须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人民至上，紧抓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紧扣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才能不断开辟党建新境界。

（一）只有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始终坚持理论强党，才能不断引领党的建设实践与党的事业发展

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sup>①</sup> 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sup>②</sup> 历次主题教育实践深刻昭示，只有始终坚持理论强党，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取理论智慧和力量，才能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才能不断深化全党对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宗旨使命、实现奋斗目标的思想认识，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sup>③</sup>

（二）只有以高度的思想自觉，突出问题导向，自觉正视并勇于解决问题，才能确保把党的建设持续推进到崭新境界

历次主题教育实践证明，必须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聚焦各个时期党性党风的突出问题。例如延安整风运动聚焦“左”倾教条主义，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文风上的“党八股”；新中国成立之初聚焦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享乐主义；1957年整风聚焦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聚焦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聚焦“四风”问题不偏航、不冒进、不左倾，自觉正视问题，找实问题，挖深根源，注重实效，解决问题，通过自我革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确保党内集中主题教育目标清晰、路径正确、成效显著，以此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sup>①</sup>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7月1日，[http://www.gov.cn/ldhd/2011-07/01/content\\_1897720\\_2.htm](http://www.gov.cn/ldhd/2011-07/01/content_1897720_2.htm)，2021年11月20日。

<sup>②</sup>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

<sup>③</sup>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04/c\\_1122783997.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04/c_1122783997.htm)，2021年10月20日。

(三) 只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sup>①</sup>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根本价值追求,始终代表广大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只有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现实利益,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才能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凝聚党心民心,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执政基础才能更加广泛、深厚、稳固,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并获得不竭的力量源泉,汇聚起磅礴的伟大复兴力量。

(四) 只有以高度的行动自觉,始终抓住并切实发挥好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才能凝聚更大力量、有更大作为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sup>②</sup>历次主题教育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列为重点对象,特别要求这些关键少数们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担当,提升应对复杂环境的工作水平和能力;<sup>③</sup>提高管党治党能力和执政水平,引领、激励广大党员加强思想、人格的形塑,凝聚起全党强大的战斗力、执政力,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不断开创党建、党的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五) 只有以高度的创新自觉,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充分体现自身价值,展现强大生机与活力

一部党内主题教育史,就是一部主题教育与时俱进的创新史,就是一部主题教育服从、服务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史。只有立足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深刻变化,始终紧扣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党内主题教育才能更好地把握党和国家发展全局,把握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才能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充分体现自身价值,推动革命、建设、发展、稳定,推进改革开放,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sup>④</sup>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7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44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27日,<https://www.12371.cn/2017/10/27/ART11509103656574313.shtml>,2021年11月20日。

# 百年大党理论自信的历史透析与时代启示

赵庸棕<sup>1</sup>, 孙发平<sup>2</sup>

(1.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8; 2.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99)

**摘要:** 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演进之路, 理论自信始终是鼓舞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精神内核。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百年演进历经四个阶段, 即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萌芽期、确立期、提升期和成熟期。也正是在这四个阶段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 党的理论自信增强了。全面审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百年历程和深刻启示, 对催发当前和今后理论创新发展, 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更大成就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 理论自信; 时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1) 04-0013-09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始终映射着理论自信的伟岸身姿。2022年1月1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 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 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sup>①</sup>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新年之初着重强调理论根基, 将党的百年革命、建设、改革成果归根于信仰之基、理论之力, 这必将进一步坚定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自信力的信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指出: “今天, 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 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 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 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 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sup>②</sup> 因此, 全面审视理论自信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深刻总结其演进和实践的有益启示, 对于我们坚定信念、不忘初心, 持之以恒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治国理政、

**作者简介:** 赵庸棕, 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孙发平,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 青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域经济学和世界经济。

<sup>①</sup> 习近平: 《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人民日报》2022年1月12日, 第1版。

<sup>②</sup> 习近平: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第1版。

建党强党，昂扬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一、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萌芽：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及其传播和应用

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为之奔走呼号之时，理论自信便滋生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与近代中国各种主义的对比中，萌发于早期共产党人的头脑中。这种自信不同于得到历史验证的“礼仪之邦”“四方来朝”的儒学理论自信，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等待实践去支撑、探索和实现的科学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心怀爱国救亡之情，在与封建势力、殖民势力和买办势力殊死决斗中摸索出来的救国救民的良方，它击败了封建主义、改良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一系列思想，甫一问世便被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称为“最好的真理”“最服膺的主义”，理论自信由此开始。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地主阶级如张德彝，在旅法期间见证巴黎公社后所著的《三述奇》中片面提及或改述马克思经济、资本的相关内容，否定阶级立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义为蛊惑底层人民暴动的学说，未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救亡图存的实践途径。资产阶级如朱执信，努力将马克思主义植入资本主义框架，服务于资产阶级，“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sup>①</sup>，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对付封建官僚主义、进行社会革命的工具，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认可和信仰。异于封建地主阶级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歪曲化与资产阶级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片面化，早期共产主义者与无产阶级的杰出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无不全面深刻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感悟资本主义日益突出的弊端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趋势，认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的阶级立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审视国家、民族和时代。自此，中国破解了近70年来“儒学无用，西学无效”的理论难题。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形式由介绍变为宣传，传播的目的也由学术转为“救世”，并在一次次“胜利”的欢呼中迅猛提速。第一次世界大战彰显了平民的力量，“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sup>②</sup>；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了新纪元，是劳工的胜利。这些胜利尽皆奠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力，尤其是苏俄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并发表两次对华宣言，废除秘密条约，放弃侵略，得到土地、赔款和特权，更是激起了国民党左派和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切，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救世”良方的理论自信由此萌发。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真正地、广泛地传播开来，各类研究社、讨论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量文章、演讲、评论“一夜花开”。自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出先进分子的外文书袋，见之于许多报纸杂志、教室学堂乃至茶楼饭馆、小巷码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力，开始跃出精英们的藩篱，进入大众劳工的汪洋。“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聚集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来规划中国的未来”<sup>③</sup>，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个体认知走向群体拓展。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等爱国抗议活动，迫使北洋政府代表拒绝赴会签字并放弃卖国行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群体到阶级的融会。随着早期共产党人对理论的理解越发清晰，理论的自信力越发强大，进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理论基石。上海的公馆、南湖的红船都是

① 朱执信：《朱执信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2页。

② 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8页。

③ 胡绳：《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



理论自信力载体，中共一大的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理论自信力演化为革命的最高纲领，擘画了新社会的蓝图，更迎来了理论自信力跃出抽象思维进入现实国度的切要关口，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实现了科学知识到阶级纲领的升华。

## 二、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完善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取得的伟大理论成就，也是理论自信的重要生发基地和活力源头。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伟力，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信。

井冈山时期，刚刚经历了国民革命失败，身处“白色恐怖”的中国共产党稚嫩却坚定，以澎湃、毛泽东、贺龙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在考察了农民运动，分析了中国国情的前提下，相继做出了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壮举。中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形势与欧洲不同，“农村包围城市”的夺权道路也与苏俄不同，做出这一决定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魄力，以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坚信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正确道路。在革命根据地焕发勃勃生机之时，教条的、本本的主义卷土重来，“左”倾冒进的思想影响到了党的正常运转，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致命的伤害。故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清晰地意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自信的重要性，认识到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自信地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遵义会议正是这样的伟大实践。“政治局扩大会议指与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们党的整个路线来说，不过是部分的错误。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变强了”<sup>①</sup>，会议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与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错误指挥，抨击了张皇失措与悲观失望的“右”倾投降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国共产党开始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运用的自信，走上了独自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道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提出，理论自信便深深烙在党的血液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sup>②</sup>毛泽东号召党员同志们废除孤立、片面、静止和主观的研究方法，进行有实效的学习，并坚定地认为“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一定会有好的结果”<sup>③</sup>。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与后续马列学院编译部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树立铺平了道路。“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标志着我们党的理论自信真正确立起来。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都体现出了不俗的理论自信力。政治斗争上，中国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注意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sup>④</sup>，摒弃了苏俄“彻底清除”和过度镇压的

<sup>①</sup> 毛泽东：《毛泽东集》（第4卷），东京：东京北望出版社，1970年，第398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

<sup>③</sup>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9页。

<sup>④</sup> 毛泽东：《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40页。

错误做法。经济建设上,随着“三反”“五反”斗争的进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刻不容缓;认识到“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曾宣布把雇工若干人以上的企业收归国有,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在战后几年也曾宣布把几十个工人以上的工厂收归国有。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sup>①</sup>。同时,制定工业国有化方案,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进程,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上,“论十大关系”的问世,回答和解决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借鉴苏联经验,分析我国成败,集中社会一切力量,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sup>②</sup>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在正确理论的创造和运用中得到巨大的发展。

### 三、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巩固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成功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又一重大理论飞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思想路标和精神引航。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带领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进一步坚定了理论自信。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期。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sup>③</sup>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文革”结束后蹈袭覆辙的思想混乱局面在“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被彻底肃清,“两年徘徊”时期和“两个凡是”错误思想被“实事求是”作风彻底扭转,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的局面被中国的崛起彻底破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没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聒噪中失去理论自信,依然高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和毛泽东实践论,为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发出了思想的解放先声。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创新出的一系列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结晶,都是马克思主义传承和创新的结合体。在邓小平同志对“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与“物质精神需要”的实际国情的精辟论断中,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积极地参与世界全球化进程,为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注入了推进定力,延续了历史逻辑。自此,肇始于邓小平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催发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

世纪之交千年之汇,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空前发展是抓住历史机遇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深刻分析和把握国内外形势,开展“三讲”运动,讲学习,提高理论自信;讲政治,提高政治境界;讲正气,提高公民作风,将理论学习、理论自信作为从政、做人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总结

①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②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③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223页。

了历史经验和任务要求，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党在过去和未来胜利的原因和方向，勉励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的胜利不是偶然取得的，未来的胜利也不是不能取得的。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明晰了发展特征和时代方位，认清了所处的关键时期，“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为应对人民利益和需求，探索现代化建设道路和模式，化解国内外危机和挑战，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贡献理论、方针和战略自信。江泽民同志不止一次提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sup>①</sup>，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努力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理论创新的崇高使命”<sup>②</sup>，这表明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在我们党内确立起来，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得到空前发展和巩固提升。

#### 四、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成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升华和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其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和科学判断，科学回答了诸多重大时代课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将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推向更高层次，坚定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并使其成为“中国梦”的重要宝贵基石，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重大创新性成果。

党的十八大报告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sup>③</sup>报告正式提出了理论自信的概念，定义了理论自信的范围，确定了理论自信的作用，预示了理论自信的光明前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发展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理论自信与其奠基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特色。2016年7月，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sup>④</sup>，理论自信被再次提及。讲话重申了理论自信的地位——立党立国的根本自信力，理论自信的对象——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每一个中国人民，以及理论自信的来源——思想真理、时代背景和科学实践。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既理解了理论自信的本质又培育了理论自信的品质，在理论自信中自觉地完善和推进理论创新，并不断开辟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入开展理论自信宣传教育，深刻剖析了四个自信的内涵及其关系，深化树立理论自信的要求。砥砺全体中华儿女发自内心的宣传理论，不惧西方外来理论的冲击，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正确性、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光明性。2017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我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

①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②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1页。

③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第1版。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实需要,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要放宽视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sup>①</sup>,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方向。同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sup>②</sup>高昂的自信力,洪亮的主旋律,激昂的正能量,体现出理论自信宣传教育的卓越成果。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唤起全党效仿周恩来同志的记忆,不忘共产党人党性,不忘革命者身份,不忘理想信念,不忘方向和立场,“牢固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sup>③</sup>。2019年11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全党反复学习、深入研究,不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思想营养。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sup>④</sup>,呼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sup>⑤</sup>,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感悟思想伟力,坚定理论自信。理论自信,弥坚愈益,理论上清醒,道路才能坚定,制度才能正确,文化之力才能转化为奋斗的精神力量。

## 五、中国共产党坚定理论自信的深刻启示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sup>⑥</sup>中国共产党以理论学习为指引,指导理论实践,进而推动理论创新,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断前行的艰苦探索中形成了丰富的坚定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这些宝贵经验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鼓舞更多中国共产党人为伟大斗争的进行、伟大工程的建设、伟大事业的推进、伟大梦想的实现,自信地做出理论注释。

### (一) 筑牢根基,增强理论学习能力是坚定理论自信的首要前提

中国共产党历来是重视理论学习的党,深厚的理论根基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精神养料,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学习的丰厚馈赠。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通过学习我们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更可以在学习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并最终达到思想的统一”<sup>⑦</sup>,要求我们投身理论学习进而解放思想,作出正确科学的判断和决策。“在激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页。

④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4月1日,第1版。

⑤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⑥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⑦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09页。



发学习动力、提高学习质量、增强学习实效上狠下功夫，坚决避免形式主义”<sup>①</sup>，积累扎实的理论功底，切实提高自身理论学习能力。

### 1. 坚持理论学习动员广泛化、常态化

理论学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它同土地革命扩大生产、武装斗争推进革命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sup>②</sup>，因此，将延安附近的公职人员统统划为理论学习的参与对象。从此，理论学习运动被广泛推广，并成为一种常态。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相继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党史学习教育等理论学习运动。以党史学习教育为例，中央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在其指导下创立党史学习教育官网，广泛地传播党史学习教育精神，深入开展“永远跟党走”“我为群众办实事”等一系列实践活动。成立党史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指导各级党委有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监督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体学习教育的开展。在《人民日报》、光明网、《青海日报》、《浙江日报》等中央、地方报刊开设了党史学习教育专栏，跟踪报道各军队、单位、机构、团体、高校党史学习教育运动的开展情况。当前，如火如荼的理论学习成为坚定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的重要支撑。

### 2. 坚持理论学习机制深入化、完善化

早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刚刚在井冈山站稳脚跟时便开办了军官教导队，进行革命理论学习，确立革命人生观，坚定革命信仰。瑞金期间又建立起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等五所红军学校，进行政治理论学习，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延安时期建立中共中央党校，三年后设立了干部教育部，并将其延伸至军队，次年5月在延安开展在职干部学习教育运动，学习机制由此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的理论学习机制，较为完善的有省部级在职领导干部学习制度，其规定每届任期内须到中央党校进修一次，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地方领导轮训机制，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校共同举办研修班，轮训全国县委书记；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机制，正在进行的第十九届学习至今已经开展了35次。故此，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学习机制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得以坚定的关键因素。

### 3. 坚持理论学习教育长效化、终身化

毛泽东将党比作大学，称其为“无期大学”，寓意中国共产党永不停歇学习的脚步。“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sup>③</sup>是习近平总书记常挂在嘴边的金句。的确，时代在不断发展，唯有学习不停，自信才不止。党的初心使命和纯洁先进要靠学习来保持，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要靠学习来提高，党的理论素养和理论自信要靠学习来巩固，学习型政党的提出正是因为我在历史转折和时代变迁中窥破了这一奥秘。温故知新，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下求索，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一个学习型政党，把中国建成一个学习大国，是我们党在不断探索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实践中得出的又一条宝贵经验。

<sup>①</sup> 胡锦涛：《关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水平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3页。

<sup>②</sup> 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5页。

<sup>③</sup>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4月1日，第1版。

## （二）脚踏实地，推进理论指导实践是坚定理论自信的续航风帆

理论实践是保持理论自信的最有效的手段。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sup>①</sup>，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推进理论实践，见证实践成果，才能形成发自内心、心悦诚服的理论自信。

### 1. 积极开展实践，在探索中检验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锋利的思想利刃，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止对理论的运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理论；全民族的抗战，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至今，我们的一切奋斗都运用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遍遍投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充分地检测出了理论的“含金量”。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以及理论运用过程中的一次次纠错反正，就没有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建树，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更是无从谈起。

### 2. 归纳实践方法，在发展中丰富理论

务必采取合理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只有正确的方法论才能使得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促进理论自信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归纳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既考虑到“一般”，强制制定必要的共同的条文，又考虑到“个别”，允许制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正确处理了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丰富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邓小平同志归纳出“摸着石头过河”与“大胆地试、勇敢地闯”相结合的方法，在开放问题上大胆试点经济特区并逐步扩大范围，勇敢试行经济责任制推进国企改革，同时又强调步子要稳，一步一个脚印，注重社会承受度，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习近平同志归纳出“精准和协同相结合”的方法，在扶贫工作中既对症下药、直击要害、突出重点，又统筹兼顾、注重协同、聚合发力，健全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掌握正确的实践方法有利于在实践中解决具体问题，完善理论体系，逐步增强理论自信。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归纳和发展理论指导实践的方法，在创新理论原理的同时创新方法论，实现理论和实践统一路径的与时俱进，指导中国创造出一个个世界奇迹和人类伟业。

### 3. 宣传实践成果，在胜利中总结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广泛宣传这一奇迹是使理论自信深入人心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制度和国民工业体系建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增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实现了富起来的第二次伟大飞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新时代和中国梦被提出，实现了强起来的第三次伟大飞跃。理论自信凝聚在国家的一次次强大中，成就在一次次宣传中。

## （三）守正创新，坚持理论与与时俱进是坚定理论自信的生命之源

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要得到正视，共产主义思想要牢牢守住。光知抱令守律，死守老祖宗的智慧，是没有前途的，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拥有坚定不移、永固长存的理论自信。

<sup>①</sup>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页。

### 1. 实事求是，理论创新要以国情为起点

国情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毛泽东同志在考察了中国农村革命运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后，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封建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本国情，创造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邓小平同志在调查了国内生产生活状况、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后，立足于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社会主要矛盾，创造出了改革开放理论。习近平同志在审视了管理政策滞后与社会飞速变革的矛盾后，立足于美好生活需要得不到充分平衡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创造出了新时代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理论创新、每一个创新成果都是基于当前国情的创新，从具体国情中出发寻找不足，弥补理论缺陷，离开了国情的一切理论创新都将失去根基，会误判进度，迷失方向，都将是镜花水月。

### 2. 先导意识，理论创新要以问题为导向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向来不是漫无目的齐头并进，而是伴随着重大问题的解决，在完成“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过程中有条不紊地实现的。为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问题，毛泽东思想被提出；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邓小平理论被提出；为解决建党和党建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提出；为解决新形势下的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被提出；为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提出，立足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我党带领人民不断探索。在此过程中，促进了我国理论的创新。没有迫切的问题也就没有了理论创新的动力，没有问题的解决也就没有了理论创新的实现。“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sup>①</sup>，不管什么理论，能解决问题的理论就是创新的理论。解决问题，是理论创新的根本要义。

### 3. 人民江山，理论创新要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是理论创新的价值选择，也是理论创新的评价主体。“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sup>②</sup>，革命时期，苏区人民自发形成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形成了“合作社模式”，推动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设时期，安徽凤阳小岗村人民自发决定包干到户，形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农村土地使用模式的变革；深化改革时期，城市化的推进迫使农村人民自发流转土地经营权，形成了“土地三权分置”，推动了乡村治理与振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是为了人民，它所创的理论都是用来保护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扎根于人民，坚定人民的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初心使命与永恒追求。

责任编辑：李亚强

<sup>①</sup> 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sup>②</sup>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3日，第1版。

#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李俊余, 刘会柏

(西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33)

**摘要:** 笔者以2017—2021年中国知网(CNKI)期刊库中篇名含“建党精神”的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 5.6.R3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文献特征、热点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发文量呈上升趋势,具有较强时政性;研究的中坚力量正逐步形成,但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热点议题主要包括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生成逻辑、鲜明特征以及实践路径五个方面;未来趋势集中于党史学习教育同建党精神的关系研究。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建党精神;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1)04-0022-08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伟大建党精神”这一概念以来,学界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展开了大量研究,且研究持续热度化。在中国知网(CNKI)期刊库中,以2017年以来篇名含“建党精神”的文献为检索对象(检索时间截止到2021年9月12日),共检索到199篇相关文章。笔者剔除会议综述、征稿通知和招聘报告等非学术性文献后保留176篇,以Refworks格式导出并保存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 5.6.R3对已保存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而绘制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文献特征、热点议题与发展趋势的科学知识图谱,以期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提供参考和借鉴。

### 一、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文献特征

#### (一) 发文趋势分析

自2017年以来,以“建党精神”为篇名的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根据图1,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1)2017—2019年,该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起步阶段,发文量较少,每年分别为3篇、6篇、3篇;(2)2020—2021年,该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热度化阶段,发文量增长迅速,每年分别为9篇和155篇。值得关注的是,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2022年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铸牢云南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022Y650)。

**作者简介:** 李俊余,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刘会柏,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2021 年的发文量高达 155 篇, 占整个研究阶段发文量的 88.06%, 这与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重大事件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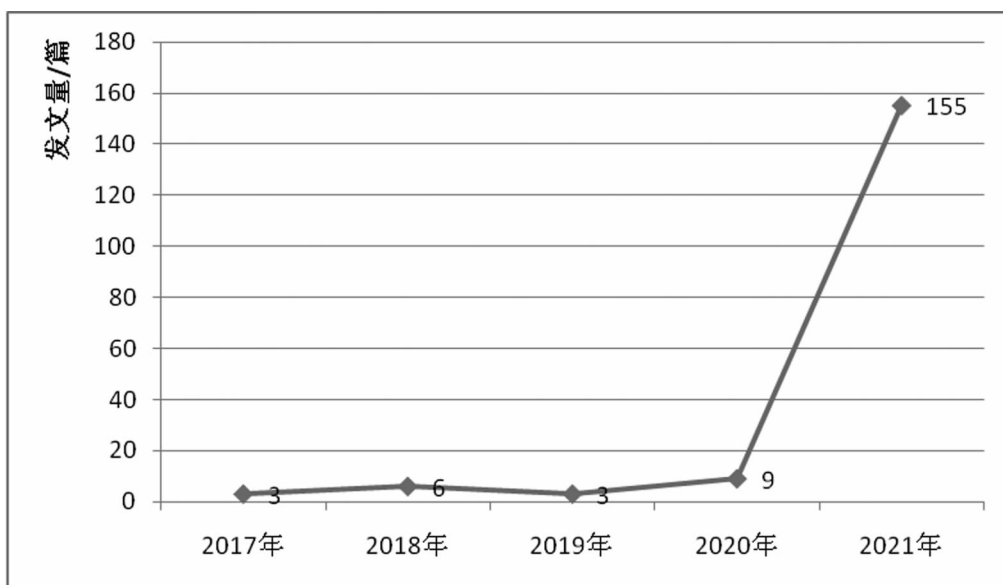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发文趋势图

### (二) 主要作者分析

笔者运行 CiteSpace 5.6.R3, 设置时间范围为 2017—2021 年, Years Per Slice = 1, Node Types = Author, 进行作者共现分析并绘制共现图谱。在作者共现图谱中, 作者节点共 51 个, 连线 10 条, 密度值为 0.0078。就发文篇数而言, 齐卫平是发文量最多的作者 (5 篇), 其余作者为忻平 (2 篇)、覃雅兰 (2 篇)、赵凤欣 (2 篇)、郭国祥 (2 篇)、董振华 (2 篇), 如表 1 所示。就中心度而言, 部分学者间存在合作关系, 如覃雅兰和郭国祥、忻平和赵凤欣、袁则文和徐光寿、李明明和陈挥。其中, 刘硕、丁小溪和史竞男之间的合作较为密切。总体而言, 单独的作者节点较多, 表明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

表 1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发文量大于 2 篇的作者

作者姓名	发文篇数	所属单位
齐卫平	5	华东师范大学
忻平	2	上海大学
覃雅兰	2	武汉理工大学
赵凤欣	2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郭国祥	2	武汉理工大学
董振华	2	中共中央党校

### (三) 研究机构分析

在保持作者共现分析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笔者重设 Node Types = Institution, 进行机构共现分析并绘制共现图谱。在机构共现图谱中, 机构节点共 51 个, 连线共 8 条, 密度值为 0.0141。就发文篇数而言,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研部是发文量最多的机构 (5 篇), 其余机构依次为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4 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4 篇）、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 篇）、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 篇）、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 篇）、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 篇），如表 2 所示。就中心度而言，部分机构间存在合作关系，如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和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等。其中，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上海师范大学之间的合作较为密切。总体而言，单独的机构节点较多，表明各机构间的合作有待加强。

表 2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发文量大于 2 篇的机构

研究机构	发文篇数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研部	5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4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4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3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3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

#### （四）期刊来源分析

期刊是作者学术成果的集成，对于推动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笔者运用 CiteSpace. 5. 6. R3 进行期刊来源分析，结果显示，共有 104 种刊物发表过该主题的论文。截取前五名，如表 3 所示，《党政论坛》是刊载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论文最多的刊物（10 篇），其次是《上海党史与党建》（9 篇），此外《当代广西》《社会主义论坛》和《思想理论教育》的刊载量相同（5 篇）。从总体上看，这五类刊物的刊载量仅占总发文量的 19. 31%，表明国内社会科学刊物对该主题论文的刊载量较少，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还存在较大空间。

表 3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刊载量大于 5 篇的期刊

期刊名称	刊载篇数	主办单位
《党政论坛》	10	上海市委党校
《上海党史与党建》	9	上海党史报刊社
《当代广西》	5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社会主义论坛》	5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
《思想理论教育》	5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会

## 二、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热点议题

笔者在 CiteSpace. 5. 6. R3 中重置 Node Types = KeyWord，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并绘制共现图谱，结果如图 2 所示，关键词节点共 144 个，连线 338 条，密度值为 0. 0328。其中，建党精神是出现频率和中心度最高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具有关联性强、重叠性高和分布集中的特点，故可



以把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热点议题概括为科学内涵、价值意蕴、生成逻辑、鲜明特征及实践路径五个方面。



图2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

### （一）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

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是深化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基础前提和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内涵的伟大建党精神。<sup>①</sup> 陈安杰等人采取概念操作化方法，把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划分为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三个维度。<sup>②</sup> 郭国祥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是一个集嘉兴红船精神、北大红楼精神和上海石库门精神于一体的精神体系。<sup>③</sup> 曹景文以建党精神和精神谱系的关系为视角，认为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历史开篇与逻辑起点，是对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高度凝练。<sup>④</sup> 笔者认为，深化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需要正确把握建党精神与各种系列精神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实践的思想结晶，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种系列精神的概括总结，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思想境界、优良传统与责任担当。一方面，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根”与“魂”，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各种系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与生动实践。

### （二）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价值意蕴

价值意蕴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段文静等人认为，弘扬伟

①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人民日报》2021年7月19日，第1版。

② 陈安杰：《论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时代价值》，《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第4期，第9—12页。

③ 郭国祥、覃雅兰：《建党精神内涵新探》，《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13—23页。

④ 曹景文：《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8期，第18—24页。

大建党精神既能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强党强国目标提供精神动力,又能为世界各国政党建设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sup>①</sup>万菊把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概括为四个方面:从理论维度看,建党精神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不断中国化;从实践维度看,建党精神能够为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灵魂支撑;从历史维度看,建党精神能够为中国共产党丰富发展精神谱系注入崭新活力;从现实维度看,建党精神能够为我国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提供方位导航。<sup>②</sup>陈安杰等人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归纳为三点:一是有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勇气;二是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应对化解外来风险挑战的能力;三是有利于坚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与立场。<sup>③</sup>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具有五个方面的重要价值,即凝聚党心民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价值、推动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和激发党建活力的党建价值、塑造党员高尚人格和提高党员党性修养的教育价值、传承中华文化和赓续红色血脉的文化价值、鼓舞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和开拓进取的激励价值。

### (三)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来看,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王阳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形成于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创党实践。<sup>④</sup>田凯华等人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首先,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挽救民族危亡的全部活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生成的历史逻辑;其次,西方文化的传入、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生成的理论逻辑;最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验证、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组建以及近代中国新道路的选择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生成的实践逻辑。<sup>⑤</sup>赵凤欣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及其中国化为建党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渔阳里建党实践充实了建党精神的基本要素,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建党精神的初步形成。<sup>⑥</sup>笔者认为,厘清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是深化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历史性、逻辑性与规律性研究的必然要求。以心理学为视角,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是外在环境影响过程和内在思想矛盾转化过程的统一。从外在环境影响过程看,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奋斗主题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形成、发展和完善。从内在思想矛盾转化过程看,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内在知情意行诸要素辩证运动、均衡发展的结果。其中,由知到行的升华表现为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 (四)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鲜明特征

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比,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具有更加鲜明的特征。齐卫平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具有集成性强、覆盖面广和内涵丰富的特征。<sup>⑦</sup>蒲清平等人把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特征归纳为四点:一是鲜明的政治性,即建党精神始终与我国时事政治密切联系;二是突出

① 段文静、鲍云飞:《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之源》,《皖西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第5—8页。

② 万菊:《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基因密码及时代价值》,《三明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8—14页。

③ 陈安杰:《论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时代价值》,《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第4期,第9—12页。

④ 王阳:《生成·结构·功能:建党精神解析》,《老区建设》2021年第16期,第8—14页。

⑤ 田凯华、齐卫平:《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生成的三重逻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4期,第70—80页。

⑥ 赵凤欣、忻平:《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与时代意蕴》,《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4期,第27—34页。

⑦ 齐卫平:《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属性、定位和特质》,《廉政文化研究》2020年第6期,第1—8页。

的实践性，即建党精神始终指导我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个环节；三是持续的先进性，即建党精神始终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理论品质；四是彻底的革命性，即建党精神始终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sup>①</sup>宇文利认为，伟大建党精神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和为民服务的统一、实现了建党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sup>②</sup>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还具有三个方面特征：一是科学性，即建党精神以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为基础，并经受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充分检验；二是整体性，即建党精神是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整体，其所包含的各维度之间存在互为支撑、彼此渗透和层层递进的关系；三是稳定性，即建党精神始终贯穿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全过程，不因时代演进、环境变化和人际更迭而凋零，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 （五）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实践路径

在实践中理解和践行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刘国中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践行建党精神就要厚植人民情怀，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行动归旨，坚决反对任何消极腐败的行为与作风。<sup>③</sup>蔡志强等人把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实践路径归纳为三点：一是要加强教育引导，促使党员群众将建党精神内化于心；二是要在内化建党精神的基础上，引导党员群众将已经形成的精神自觉转化为行为自觉；三是要充分发掘党史资源，将建党精神融入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之中并传承下去。<sup>④</sup>廉毅敏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弘扬路径概括为四点：一是要培养历史思维能力，特别是要用新时代党建理论武装头脑；二是要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为实现民族复兴指明方向；三是要树立担当格局，增强化解外来风险和挑战的勇气；四是要加强治党管党，突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sup>⑤</sup>笔者认为，新时代践行建党精神需要做好三项教育工作：首先，要加快构建大中小学党史学习教育一体化体系，为推动建党精神进校园、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提供制度保障；其次，要把建党精神融入课堂教育教学、校园文化建设以及学生课外实践等领域，使学生心灵得到全面滋养；最后，要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为建党精神的践行营造良好氛围。

### 三、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发展趋势

笔者在 CiteSpace 5.6.R3 突发性探测窗口中设置 Minimum Duration = 0.1, Burst items found = 1, 得到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关键词突现表。由表 4 可知，在 2017—2021 年间，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研究涌现出大量关键词，如“中共一大”“红船精神”“党组织建设”“初心使命”“伟大抗疫精神”“党史学习教育”等等。由此可知，该阶段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研究均与各年时事热点密切相关，显示出较强时政性。

2017 年 10 月 31 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专程赶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与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望建党历程，总结建党经验。习近平强调，上海党的一大会址、

① 蒲清平、范海群、何丽玲：《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特征、时代价值与弘扬路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第 1—11 页。

② 宇文利：《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意涵与特质》，《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12—18 页。

③ 刘国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党建研究》2021 年第 7 期，第 30—32 页。

④ 蔡志强、袁美秀：《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形成机理与实践要求》，《思想理论教育》2021 年第 8 期，第 4—11 页。

⑤ 廉毅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推进新的伟大工程》，《党建》2021 年第 9 期，第 11—13 页。

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sup>①</sup>2017年,“中共一大”和“红船精神”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这一年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源流关系与价值意蕴进行了深入研究。

表4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关键词突现表

序号	突现词	突现年份	突现率
1	中共一大	2017年	0.6729
2	红船精神	2017年	0.9184
3	党组织建设	2018年	0.8678
4	初心使命	2019年	1.6613
5	伟大抗疫精神	2020年	1.8243
6	党史学习教育	2021年	1.9257

2018年,“党组织建设”成为研究热点。这一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党的组织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会议提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加强作风建设的决定等标志性事件,有力地推动了新时代我国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同时,党组织建设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重大任务,一直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

2019年,“初心使命”一词备受学术界青睐,6月,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这既是对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现实需要,也是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最好形式。同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首次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决定。此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成为党的建设和党员党性教育的重大课题。

2020年,“伟大抗疫精神”成为热点。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给世界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领导。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首次提出伟大抗疫精神的科学内涵,并阐明其在抗击疫情中的重要价值。此后,学术界掀起了研究“伟大抗疫精神”的热潮。同时,伟大抗疫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新视角。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也是党史学习教育之年。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党史学习教育要重点突出和务求实效的基本要求,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指明了方向。同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伟大建党精神”这一概念,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反响。在建党100周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必然掀起学术界研究党史学习教育同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关系的热潮。

这些突现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热点变化与视角创新,以及在不同年份结合重大热点事件挖掘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如马克思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样,“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

<sup>①</sup> 《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 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志永远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日,第1版。

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sup>①</sup>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面临不同任务，因而建党精神的内涵也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研究，也将随着建党精神内涵的延展而不断深入，集中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创新性原则。

#### 四、基本结论

笔者运用 CiteSpace 5.6.R3 可视化分析软件对 CNKI 数据库中 2017—2021 年期刊中有关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文献特征、热点议题与发展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而得到发文趋势、主要作者、研究机构和期刊来源图表，并在关键词共现分析基础上绘制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关键词突现表，最后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从发文趋势看，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自 2017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发文量增长迅速，在 2020—2021 年间发文量呈爆炸式增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始终受到学术界关注，其仍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与重点。

从主要作者和研究机构看，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诸多学者展现出较强的科研能力，发文量最多的是齐卫平教授；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研究机构大多属于高校，发文量最多的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研部。就中心度而言，单独的作者和机构节点较多，这表明各学者、机构之间的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期刊来源看，《党政论坛》《上海党史与党建》《当代广西》《社会主义论坛》和《思想理论教育》是刊载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论文较多的期刊。总体而言，国内社会科学刊物对该主题论文的刊载量较少，未来此类文章具有较大刊发空间。

从热点议题看，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热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侧重于建党精神的量化与可操作性研究；二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侧重于建党精神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研究；三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侧重于建党精神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规律研究；四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鲜明特征，侧重于建党精神的本质属性与定位特质研究；五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实践路径，侧重于建党精神的贯彻落实研究。

从关键词看，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研究的关键词分别为“中共一大”“红船精神”“党组织建设”“初心使命”“伟大抗疫精神”“党史学习教育”等。但就突变率和延续性而言，学术界未来可能会集中于党史学习教育同建党精神的关系研究，特别是注重建党精神的高质量研究。

责任编辑：李亚强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2 页。

## 统战理论与实践

#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形态与逻辑

骆 平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重庆 400064)

**摘 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一直珍视的重要法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在新时代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独特且重要作用。纵观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存在“作为革命斗争策略的统一战线”“作为国家建设基础的统一战线”和“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统一战线”三种形态,其演变逻辑是从联盟之术到治理之道、从国家建构到社会整合、从抽象笼统到具体清晰。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着重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着力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全党都来做、都重视做的局面;着力提高统一战线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彻底根除产生统一战线“可有可无”思想的土壤;着力推进统一战线现代化,使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展现无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发展历程;形态;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1)04-0030-07

“形态”是指事物的样貌和表现,感知和把握各种事物“形态”,是我们认知与改造世界的基础。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一直珍视的重要法宝,“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sup>①</sup>。通过组织并领导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兴党强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和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识,厘清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各个“形态”,是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坚持好维护好这一重要法宝的基础性工作。

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辉煌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历经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及爱国统一战线五个发展阶段,表现为“作为革命斗争策略的统一战线、作为国家建设基础的统一战线和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三种形态,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不断发展壮大。

### 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发展的三种形态

#### (一) 作为革命斗争策略的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弱小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中国共产党,单靠工人阶级是无法取得革命彻底胜利的,必须找寻一切可能的合作力量和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统一战线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斗争胜利的武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紧密相

**作者简介:** 骆平,重庆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及民主党派史。

<sup>①</sup>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联。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sup>①</sup> 1922年7月在党的二大上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强调“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sup>②</sup>，表明这一时期统一战线更多表现为政党联合，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初始状态，也是后来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思想基础。但由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理解的教条化、抽象化，在统一战线领导权、统一战线对象以及要不要统一战线等问题上接连犯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如在大革命中主动让出领导权，在瑞金中华苏维埃政权中大搞“清一色”以及拒绝与发动福建事变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合作等，不啻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使党遭受了严重损失<sup>③</sup>。

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濒于覆灭危险的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和反思党成立以来事业成败基础上对统一战线的认识逐渐理论化、具体化：

从理论化来看，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在1939年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归结为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同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团结与斗争、统一与独立等问题上日臻成熟，比如在坚决抵制和批判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中，强调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和独立自主原则；在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摩擦中，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强调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方针，对其中还能抗日的群体予以联合，对坚决反共的加以孤立。这些原则、方针、策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sup>④</sup>”，从而统一了全党思想，有力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在既往开展统战工作中“过左过右摇摆”的现象。

从具体化看，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原则”、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吸引和吸收知识分子、加强民族团结以及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根据地各阶级、阶层、民族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坚决抗战；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通过支持民主运动、推动民主党派成立与发展、加强与国民党左派、开明士绅、地方实力派、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引导和帮助民主人士等方式，把以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和国统区广大爱国进步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逐渐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由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优势，领导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蒋介石反动政权陷于全民的包围中，最终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的腐朽统治。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

③ 对此，毛泽东1947年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深刻指出：“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本来是不孤立的，后来因陈独秀右倾而孤立了，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先是表现在城市工作方面，不但把自己孤立了，而且到后来在城市简直立也立不住了，只好退到农村。到了农村，他们又有军事斗争方面的‘左’和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方面的‘左’。他们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详见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0页。

④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3页。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把这一过程形象称之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sup>①</sup>这一组织起来的方式就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作为革命斗争策略的统一战线也反映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巨大差异，共产党与国民党同样师法苏俄，同样既是政党也是武装集团，在解放战争初期尚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国际环境不利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国民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能集全党之力最大化运用统一战线，从政治高度团结朋友、瓦解敌人以及化敌为友，变劣势为优势，从根本上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和敌我力量结构，从而战胜强大敌人赢得斗争胜利。

## （二）作为国家建设基础的统一战线

作为革命斗争策略的统一战线也必然伴随着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革命胜利了，统一战线还要不要的问题。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战线“左倾关门主义”倾向，部分党员干部轻视统一战线，认为“统战路线，地主路线；民主观点，糊涂观点”。<sup>②</sup>对此，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靠党外的人员合作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sup>③</sup>这也就意味着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国家建设，必须要继续团结各方、凝聚力量。这时，统一战线的定位从化敌为友、克敌制胜的法宝转变为凝心聚力、团结各方共同奋斗的法宝，作为革命斗争策略的统一战线也转化为作为国家建设基础的统一战线，这充分表现在：

第一，从国家构建来看，统一战线为新生政权提供有效政治制度供给。国家构建是指一个现代国家或一个有效现代国家塑造的过程，弗朗西斯·福山把这一构建过程更多视为是政治制度建设，即“国家构建是指建立新的政府制度以及加强现有政府”<sup>④</sup>。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其他强势国家的制度移植，但西方国家的制度和价值观并不是普世的，弗朗西斯·福山对此坦言“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社会来说，要实现自由西方的现代性非常困难”，<sup>⑤</sup>除少数发展中国家完成转型外，其他国家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因而，国家构建的核心在于能否找到和坚持适合于本国国情、符合本国人民利益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始了国家构建中的独特制度创设。如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组成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70多年的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创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其鲜明的“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特征既有效解决一党缺乏监督也避免竞争性政党制度中政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局面，更好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等，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统合来看，这些制度

①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3页。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年，第186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④ [美]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郭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年，第7页。

⑤ [美]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第14页。

既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又契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带有浓厚统战意蕴，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国家建构尤其是制度建构的重要来源。

第二，从国家合法性基础来看，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合法性基石。在西方政治学语境中，国家合法性最普遍的来源是政府机构执行民主政治和顺应民意，“民主政体依赖于最少的强制和最多的同意”<sup>①</sup>的基本特性决定了民众和社会的认可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所谓代表“全民利益”实际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不同的是，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真正的主人，因此能否代表和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衡量国家合法性的标准，而这与统一战线密切相关。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政权合法性来自于代行全国人大职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由人民政协制宪开国的新政权是一个由各阶级、各方面人士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大量统战成员进入新政权并为之工作，国家的合法性基础由此建立；<sup>②</sup>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广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各界爱国人士经由统一战线投入到社会主义改造中，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结构由原先四大阶级联合转变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两阶级一阶层”，统一战线顺应国家和社会变化，团结吸纳更广泛的联盟对象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集中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诉求；改革开放后，统一战线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界定统一战线性质，即统一战线已由“阶级联盟”转变为“政治联盟”，统一战线由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邓小平认为爱国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还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统一战线包含的范围和吸纳的对象都得到空前增加，“前程远大、大有可为”<sup>③</sup>，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积极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将包括非公经济人士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纳入统战工作范畴，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随着统一战线包容度的不断扩大，各党派、各民族、各宗教、各社会阶层和海内外各界的利益和诉求都能反映到国家决策酝酿、制定和实施、监督中来，突出表现在以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相互支持和补充来扩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以对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安排、实职安排推进国家政治整合，以人民政协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实现统一战线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以及完成社会整合。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统一战线越是得到巩固与发展，越能得到全体国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增量，社会主义国家合法性基础才能稳固如山。

### （三）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统一战线

在政治学术语中，治理通常与统治相比较。与单一政府（权力）主体、依靠法律强制、自上向下的统治方式不同，治理突显多元主体在遵守法律和契约条件下共治、共享、共建。从这一点上来说，政府权力的边界就是统治的范围，而以公共领域为边界的治理范围宽广得多。<sup>④</sup>从统治走向治理，是国家现代化进向和制度变革的主要趋势，也是中国改革发展的一条主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① [美] 拉里·戴蒙德：《民主政治的三个悖论》，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1页。

② 陈明明：《现代国家建设视域下统一战线三重面相：策略、战略与治道》，《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6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49页。

④ 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2014年第1期，第5页。

能力的现代化是我国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重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列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至少有6个与统一战线直接相关,包括“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一国两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涵盖统一战线中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也就是说,统一战线作为政治联盟,已制度化嵌入在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将这一独特政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统一战线,其特点在于:

第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最大政治共识。团结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步伐一致需要凝聚政治共识。在新时代,这个政治共识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sup>①</sup> 新时代,统一战线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sup>②</sup> 统一战线定义中“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表述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统一战线领域的反映,也是统一战线在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把“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基本内涵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充分调动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有序有效地参与到国家治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

第二,担负实现统一战线现代化重任。统一战线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统一战线也必然要现代化。当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双重背景下,统一战线面临着诸多挑战。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东升西降”大趋势加速演进,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日益复杂,民族、宗教、新疆、西藏、港台海外等涉统战工作领域不断出现新挑战,统一战线处在反渗透、反分裂、反颠覆的第一线;从国内看,新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利益诉求多样化与思想观念多元化相互交织,统一战线处在扩大群众基础、化解社会矛盾、凝聚思想共识的第一线。统一战线面临的挑战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直面的问题,统一战线必须对自身构成范围、矛盾关系、理念方针、制度机制、方式进行深刻调整,<sup>③</sup> 以适应现代化要求和趋势。

第三,将服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统一战线战略目标。具体表现在以统一战线协调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保持整个国家有机平衡,画出最大同心圆;以协商民主推动多元主体有机、有序参与国家治理,让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港澳台同胞等不同政治社会力量在“有事多商量好商量会商量”理念指引下成为国家治理中能够相互

① 习近平:《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2012年11月29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22/c359238-20879677.html>,2021年7月15日。

②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3页。

③ 王斌元、颜旭、黄长勇、廖新生:《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统一战线现代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125页。

倚重的力量；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中实现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和谐发展；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世界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求同存异、包容发展，共建和平、安全、繁荣、开放、美丽的世界。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三种形态的底色是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国家构建、国家建设中成为一种自变量，围绕和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这个因变量。这种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互关系深刻揭示了“我们什么时候重视统一战线党就能生存发展，忽略或轻视统一战线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的辩证唯物主义统战史观，也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的逻辑。

## 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的逻辑

### （一）从联盟之术到治理之道：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是对过往统一战线形式的超越

从最广泛的层面定义，统一战线是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成的政治联盟。这些社会政治力量既可以是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也可以是民族、国家，它们之间的联合、联盟就是统一战线。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统一战线常以“联盟之术”面目出现，表现为“关于结盟的谋略”。

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到要完成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解放，单靠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联合其他革命阶级组成革命阵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鲜明口号，十月革命后，为了支持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列宁将此口号进一步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把各被压迫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有机联系起来，指导欧亚各国无产阶级开展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统一战线因之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解决自身团结和同盟军问题的一门科学。为了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无产阶级比以往出现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更加重视统一战线，更加重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并将其从谋略提升为策略直至战略，使其脱离了单纯“联盟之术”的窠臼。

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的百年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为此独树一帜地提出了“统一战线法宝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化最富有创造力的阐释。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颁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完善统一战线各项制度，不断推进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以及各领域的创新，将统一战线制度化、规范化并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把对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境界和高度，在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直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在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中，在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统一战线从斗争策略逐步提升为治理之道。

### （二）从国家建构到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是对传统“国家——政党——社会”模式的重构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内容，政党在政治运作和发展中起核心作用。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珍视的政治传统和独特政党文化的载体，当把这一政治传统运用到中国国家构建和建设、

社会发展层面时,重构了传统政党政治领域内的“国家——政党——社会”模式。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政党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一方面民众通过政党去控制国家权力,实现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政党与社会连接,与社会实现互动。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为特征的竞争性政党制度能够确保民众利益得以贯彻和实现。得益于西方选举制度的成熟、政治博弈的运用等多方面原因,竞争性政党制度在维护和发展西方民主政治上展现出一定的价值,西方国家一度把“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视为民主政治的样本向全球推广。然而在封建体系瓦解与新的国家秩序尚未形成的旧中国,无成熟议会或选举制度可以利用,中国共产党只能用革命形式改天换地,天然地负有团结带领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的重任。与西方国家先有国家再有政党的局面不同的是,中国是由政党主导构建现代国家,形成了“政党——国家——社会”模式,中国共产党既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在建立独立国家、领导国家建设和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成为主导力量,中国各政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围绕实现共同目标开展有序合作而不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各方势力的对抗、制衡。“政党——国家——社会”模式的形成表明中国共产党既要充分探索现代国家发展道路,又要构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共治共享共有格局,既要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和方向、体现人民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又要尊重不同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差异、兼容并包,这一切应当也只能通过统一战线实现。

### (三) 从抽象笼统到具体清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在螺旋上升中得到发展

从作为革命斗争策略的统一战线到作为国家建设基础的统一战线,再到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不断从抽象笼统走向具体清晰,通过不断试错和总结经验、规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在螺旋上升中得到发展,这与党百年的艰辛奋斗历程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统一战线三个形态之间并非截然割裂,而是前递后承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一直以来把统一战线作为重要法宝就是这种递承关系的重要体现。同样,上一个形态中错误的思想和做法在一定条件下会“死灰复燃”。如直到现在,轻视忽视统一战线的现象在党内始终不同程度地存在,典型的有“过时论”,认为相比革命年代敌强我弱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人才匮乏的情况,我们党现在拥有大量执政资源,统一战线可有可无;有“点缀论”,认为统战工作是敲边鼓、软任务,做点意思意思;有“上层论”,认为统战代表人物都在上层,下面可要可不要。<sup>①</sup> 这些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思想上打不开的“结”,正是把统一战线仅仅作为革命斗争手段的“遗留物”,这些错误思想不仅在实践上危害统一战线正常运转,更阻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局面的形成,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要警惕统一战线中的错误思想的“沉渣泛起”就必须着重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着力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全党都来做、都重视做统战工作的新局面;进一步提高统一战线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彻底根除产生统一战线“可有可无”思想的土壤;着力推进统一战线现代化,使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展现无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责任编辑:念兴昌

<sup>①</sup> 上海交通大学统战部:《“统战工作条例解答”中的干货》,2015年11月13日, <https://tzb.sjtu.edu.cn/theory/500-2018-08-27-01-17-49.html>,2021年7月15日。



# 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历史演进

董海军, 邹娟婵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的重要篇章。笔者从雏形、突破、探索、发展、升华五个时期, 全面分析阐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发展过程; 以“建设”“改革”“稳定”“发展”“治理”为主题, 勾勒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体系建构的主线; 厘清了人民政协制度在探索建构和创新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统一战线的组织优势、多党合作的制度优势、平等协商的民主优势和凝聚共识的团结优势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优势话语体系。

**关键词:** 政协制度优势; 政协优势话语; 政协话语体系建构; 政协发展演进

**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1) 04-0037-0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标志着人民政协制度正式确立。<sup>①</sup>人民政协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的制度安排。然而在西方政治话语霸权背景下, 中国政治制度的经验、价值和创造性常常被外界低估, 有时甚至被自我低估。

制度自信与制度认同需要制度优势话语支撑。要科学阐释、有效传播和自觉捍卫人民政协制度, 就必须建构起具有内在自洽性、强大认同性和显著吸引性的制度优势话语体系。回溯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历史过程, 对于建构新时代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 进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具有积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制度优势的话语建构, 经历了雏形期 (1949—1978 年)、突破期 (1978—1989 年)、探索期 (1989—2002 年)、发展期 (2002—2012 年)、升华期 (2012 年至今) 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不同, 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内容也就各有侧重, 并体现出其历史延续性和实践发展性。

## 一、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的初步显现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至改革开放前, 为建设和巩固新生政权,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20 年度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认同研究” (2020BKS083)。

**作者简介:** 董海军,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邹娟婵,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年, 第 291—292 页。

党人创立了人民政协制度并积极建构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

1. “人民政协”概念彰显其话语优势。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政协的概念经历了旧政协到新政协再到人民政协的变迁。1949年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对于新政协如何命名，与会代表进行了周密论证。谭平山在《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报告》中总结指出，一是因为两者性质发生变化，为使人民感到耳目一新，因此有改名的必要。二是因为这次会议“是四面八方的大团结”，出席代表的成分和所来自地区都空前广泛，故应改名为人民政协更名符其实。<sup>①</sup>正是由于人民政协具有与旧政协不一样的性质和代表的广泛性，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得以凸显。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词《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指出，会议之所以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其“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同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人民政协的成立，表明“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sup>②</sup>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是在同旧政协相比较的性质优势中、在团结全国人民的代表优势中和同世界文明相比较的优势中建构起来的。

2. “统一战线”“政治协商”“党的领导下的合作”初步构成政协优势话语基本要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人民政协的性质、职能、其他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形成了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初步构成了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和关键内容。一是指明人民政协制度统一战线性质优势。新中国初期，人民政协曾以独特的优势在协商建国和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是把人民政协定位为统一战线组织。毛泽东就曾这样表述过人民政协的性质，“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sup>③</sup>虽然受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定位和优势话语建构却始终没有改变。二是在阐释必要性中构建人民政协制度政治协商话语优势。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首要职能，人民政协在协商中产生，以政治协商为使命职责，人民政协曾经发挥的协商建国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毛泽东在《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中明确指出有了人民代表大会以后仍然需要通过人民政协来进行政治协商的必要性，还举例说“宪法草案就是经过协商讨论使得它更为完备的”。<sup>④</sup>指明人民政协制度，尤其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的政党间有效合作具有政治协商的优势。1954年人民政协章程明确指出人民政协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sup>⑤</sup>，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奋斗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及党和非党的关系应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概念随后还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形式对其进行了政治确认，成为人民政协工作的基本方针，推动人民政协“使得一切积极因素都能够动员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势成为构建人民政协制度优势的重要话语之一。

①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3—345页。

③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01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编：《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83页。

⑤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12页。

## 二、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的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以后，围绕“改革”主题，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政协的性质、职能、方针和政策提出系列新思想，指明了人民政协的发展方向，人民政协也进入了制度变革、优势话语基本形成阶段。

1. 在破旧迎新中开启优势话语的新探索。改革开放后，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是在消除旧体制弊端的影响、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政协制度受到严重影响并一度陷入瘫痪状态。直至1978年通过了人民政协的第二部章程，人民政协制度才从停滞状态中逐渐恢复并开始重建，但与1954年的第一部章程相比，第二部章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比较深的“文革”烙印。1980年，邓小平在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民政协第二部章程部分内容存在不当之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sup>①</sup>基于此判断，邓小平提出了人民政协“是我们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这一重要论述。<sup>②</sup>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把人民政协和我国政治体制联系起来，开启了将人民政协纳入国家政治体制组成部分的新进程。1982年修订的《宪法》，在序言中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得到了法制确认。

2. 从“革命的统一战线”到“爱国统一战线”的话语转变。改革开放新时期，伴随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变，人民政协制度统一战线性质优势历经了由“革命的统一战线”“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到“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和“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话语建构过程。在阶级斗争年代，“革命”是时代的主题，这极大影响了人民政协统一战线性质的话语表达。1978年以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人民政协制度统一战线优势话语实现突破创设了基本条件。1979年，邓小平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应该叫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1980年，邓小平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重要作用》中强调，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我国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sup>③</sup>这就意味着人民政协已突破单一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的话语，开始强调“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统一战线的革命语义进一步转化。1982年修订的人民政协章程把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从此，人民政协是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阐释人民政协性质的基本话语构成，人民政协制度统一战线性质优势完成了新时期“爱国”的话语定位。

3. “民主监督”话语的产生与拓展。1982年人民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充分肯定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定的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机构继续发挥政治协商作用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民主监督这个概念并将其增加为新时期人民政协的重要职能写进新的人民政协章程中。在章程的草案说明中，刘澜涛不仅明确指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是政协的两大职能，还依据历史经验对人民政协的政治优势作了说明。他指出政治协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政

<sup>①</sup>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编：《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第333页。

<sup>②</sup>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编：《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第331页。

<sup>③</sup>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编：《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第334页。

协民主监督不同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没有法律约束力,是一种民主监督。这两大职能都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优良传统。<sup>①</sup>紧接着不久,邓颖超也提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是我国统一战线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传统。<sup>②</sup>此后,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作为我国政治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在优势话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1989年颁布的《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标志着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两大职能向常态化、制度化话语方向迈进。自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初步完成了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优势话语建构。

4. 在中西对比中“多党合作”制度优势话语的成型。多党合作是人民政协制度的显著优势。对此,邓小平首先指出西方国家多党制的弊端,认为这种制度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竞争的结果,因此其代表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sup>③</sup>随后,邓小平指出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制度所具有的多党派合作的特点和优势,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在我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sup>④</sup>这里实际上道出了与资本主义多党制对比,我国人民政协多党合作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人民群众认可的合法性优势。至此,在不断地将中外两种政党制度进行比较和对比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不仅基本解答了资本主义多党制和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谁优谁劣”的问题,建构了人民政协多党合作制度优势话语,还强调了人民政协制度多党合作优势之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随着党的十二大报告把人民政协的“八字方针”发展为“十六字方针”,正式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政协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后,这一组合型概念日后也经常出现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著述中,成为明确构建人民政协制度新型合作关系优势的基本话语之一。<sup>⑤</sup>

### 三、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的丰富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为坚定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自信,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稳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民政协的性质、职能以及多党合作制度优势等维度对人民政协制度的优越性作出新的阐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得以丰富和发展。

1. 人民政协性质话语内涵的演变与丰富。人民政协制度的性质经历了从单一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话语到二元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话语的转变。1989年1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以制度化形式,明确了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sup>⑥</sup>1991年江泽民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组织形式”,<sup>⑦</sup>并特别强调人民政协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意义。1994年修订的人民政协章程将人民政协的定位由“重要组织形式”升级为“重要机

①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420—421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编:《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第400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7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编:《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第331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⑥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85页。

⑦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06页。

构”,明确将人民政协性质界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sup>①</sup>在随后的政协章程修正案草案中对于这一修改的意义作了充分说明,指出这将会使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性质的话语优势表述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2. “参政议政”职能优势话语的提出。“参政议政”职能的产生是居于协商监督职能的延伸。1994年修订的人民政协章程在人民政协传统两大职能基础上,增加了“组织参加本会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sup>②</sup>的职能。对此,在《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有相关解释,指出这是对于政协主要职能的延伸,“有利于广泛调动参加政协的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发挥政协的整体优势和发挥政协工作的主动性,更好地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sup>③</sup>这充分表明,人民政协参政议政职能话语的提出,必将促进政协广泛调动各族各界政治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1995年出台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明确将参政议政并列为人民政协的三大主要职能之一。至此,人民政协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发挥职能优势上来,致力于全面建构和完善规范化、制度化的人民政协职能建设和履行的优势、特色话语体系,推动政协发挥和彰显其三大主要职能及相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话语优势。

3. 在坚持构建政党制度话语中阐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我国的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政党制度的建构离不开人民政协的支撑,人民政协因作为政党制度的重要机构而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1990年江泽民在同人民政协主要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以人民政协作为重要组织形式的政党制度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经受住了考验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比当前苏联和东欧发生政局动荡的状况,更加显示出我国这一制度的优越性”。<sup>④</sup>从维护社会稳定和同苏联对比的角度下,阐释我国政党制度优势的同时也凸显出人民政协制度的支撑作用和贡献。李瑞环在《在前进中开拓,在开拓中前进》讲话中,在阐述人民政协是实现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机构的基础上,指出人民政协这一组织形式是老一代领导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理论和中华民族和衷共济传统精神的伟大构想,“符合中国国情,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我国政治体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sup>⑤</sup>,表明了人民政协作为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机构而获得了巨大的成长空间和光明的发展前景,并且具有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的巨大优越性。

#### 四、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的日趋完善

进入新世纪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领导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继往开来,围绕“发展”主题对人民政协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新的重要部署,为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建构做出新的贡献。

1. “民主”优势话语的提出与建构。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领导的党中央着重开始建构人民政协制度民主优势话语。虽然早在1994年修订的人民政协章程中就提出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当时提及人民政协性质表达的“三句

①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38页。

②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40页。

③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53页。

④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90页。

⑤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89页。

话”是分开论述的，尚未形成系统。为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协所拥有的民主性质优势，凸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价值，2004年修订的人民政协章程将“三句话”连在一起，形成系统表述，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sup>①</sup>对为何要增加政协民主性质的话语表达，胡锦涛在2005年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55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优势”，<sup>②</sup>很好阐明了政协民主所具有的独特话语优势和重要政治地位。自此，“三句话”表述形成了对人民政协性质的科学界定，也成为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重要内容。

2. “团结和民主”主题优势话语的相沿成习。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重大贡献还在于明确提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主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要“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sup>③</sup>2004年修订的人民政协章程，在总纲中就增加“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的表述。随后贾庆林进一步指出，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可以使得人民政协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能，有利于团结一切力量、调动积极因素和集中智慧力量。<sup>④</sup>可见，这两大主题是党和党的统一战线以及人民政协工作和事业增强感召力、凝聚力的巨大话语优势。此外，胡锦涛和贾庆林等也在多个场合强调“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继往开来的方向和使命”的话语，体现了团结和民主主题对于人民政协制度的发展具有导向指引和使命建构的话语优势。

3. 在体制完善中建构制度优势话语。党的十六大以来，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体系的建构另一突出特点是在加强人民政协制度建设中发展制度优势话语。一是坚持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建设。2003年3月，胡锦涛在人民政协第十届全国第一次委员负责人会议上指出，“必须进一步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是保证人民政协切实履行职能的重要保证，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sup>⑤</sup>，不仅阐明了人民政协职能需要进行制度化建设，也解释了为什么要进行制度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要推进人民政协三大职能的制度建设。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建构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的高度自觉。人民政协是实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只有进一步加强政协制度建设，才能不断地加强党派之间的合作，发挥人民政协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为此，2005年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在系统总结我国政党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sup>⑥</sup>；要保证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协中占有较大比例，充分发挥作用；首次提出政治协商包括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和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两种基本形式，体现了中共中央致力于从“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等方面加强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二是通过明确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重要主体地位，强化其制度优势话语。虽然早在1993年李瑞环就指出

①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692页。

②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49—75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④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57页。

⑤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下），第681页。

⑥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69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①</sup>，但直到2006年通过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才正式明确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主体地位，成为我国构建现代国家政治体制战略性的存在。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人民政协作为中国政党制度的重要载体与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四大班子”之一。自此，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话语体系中获得了国家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话语定位，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进入制度化建构阶段。

## 五、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的夯实与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治理”主题，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出发，就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加强凝聚共识和党的全面领导等方面对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进行新的阐释，实现了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的新飞跃。

1. “协商民主”和“国家治理”优势话语的凸显。新时代以来，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表达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强调，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sup>②</sup>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国家治理维度实现了新时代对人民政协制度优势阐释和话语建构的新飞跃。一是从协商民主维度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专门协商机构”都是党的十八大后提出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概念。特别是“专门协商机构”，其综合承载了人民政协性质新的定位和新的概括，从机构的性质和特征上进一步突显了人民政协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相较于西方式的协商民主，以人民政协为专门协商机构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超越，既独具中国特色又充分彰显协商民主制度优势。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强调，“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需要完善制度机制”。<sup>③</sup>这表明新时代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将会更加成熟和定型，其地位和作用必将进一步彰显。二是从国家治理维度看，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以来，习近平就反复强调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人民政协定位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开辟“中国之治”的重要制度设计和独特治理平台。2018年，习近平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并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机制与“新型政党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对接。2019年，习近平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行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sup>④</sup>新时代以来，人民政协作为在国家政治体制中专门进行政治协商的组织机构，展现其凭借协商民主和政治影响力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的优势，将其在国家治理方面特有的制度和话语优势以其特有的方式转化为行动和成果的现实效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独特贡献。

2. “凝聚共识”优势话语的提出。新时代人民政协在坚持三项主要职能优势基础上，建构凝聚共识优势话语。在2018年的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提出要把“凝聚共识”作为人民政协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人民政协要“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sup>⑤</sup>，表明新时代党的历史

①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24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293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296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297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295页。

使命的实现,要求人民政协必须把凝聚共识作为重要职能,充分发挥其广泛团结和凝聚力量的优势。2020年5月,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出要加快推动人民政协“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sup>①</sup>,明确指出了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优势是不仅能够转化党的主张为社会共识、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共识以厚植治国理政根基,而且能够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广泛地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大政治共识和正能量,在润物无声中不断地增进人们内心对制度优势的深刻认同,从而形成制度优势共识,扩大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体系的影响力。

3. “中国共产党领导”话语的意义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制度还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意义提升的过程中充分彰显同心同向的政治优势。2013年贾庆林提出了“两个根本”,指出确保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的主要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一部人民政协史,就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奋斗史”,<sup>②</sup>论述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人民政协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话语实现了意义上的提升。<sup>③</sup>党的领导优势位居于各种制度显著优势之首,因而坚持党的领导成为人民政协制度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人民政协这一制度安排和政治组织最本质的特征。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首个系统全面论述加强人民政协党建工作的专门文件,为人民政协党的建设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明确要求要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坚持党对人民政协领导的制度在新时代中实现了内在意义的提升,同时也切实增进我们对人民政协制度所具有的坚持党的领导政治优势的理解和把握。

总之,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建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生成和话语定型,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借鉴不同文明的有益成果,提出了许多具有一定原创性的概念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话语和命题,充分表现出党以概念话语形式引导思想解放和行动转化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不仅有利于全面发展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体系,而且有助于打破制度优势话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政治和民主话语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有力唱响和传播中国声音、中国故事。

责任编辑:罗雷

<sup>①</sup>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人民日报》2020年5月28日,第4版。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

<sup>③</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 统一战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云南实践研究

王寅平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

**摘要:** 统一战线是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服务和助推边疆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发展的重要任务。作为全国统战工作的“大户人家”,云南具有突出的边疆、民族特点,统一战线助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对云南统战工作、民族宗教工作领域的全覆盖。云南统一战线助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政治协商实践、民族团结示范创建、宗教中国化实践、助力脱贫攻坚、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取得较大成效,丰富和拓展了统一战线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 统一战线; 统战工作; 边疆民族地区; 边疆治理现代化; 云南实践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1)04-0045-08

---

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发挥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是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的重要法宝。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任务。其中,统一战线工作发挥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发挥统一战线各方面的积极作用,能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重要方面的基本政治制度效能;促进统一战线团结合作,能有效发挥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统一战线的民族宗教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中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工作;促进统一战线各方面和谐关系是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共建共治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重要讲话精神,明确提出要做好地方工作,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结云南统一战线助力边疆治理的成就和经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党中央关于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新要求,特别是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对进一步发挥好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提高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

**作者简介:** 王寅平,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

## 一、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任务

统一战线是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进一步彰显，以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为基本任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sup>①</sup>

第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统战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开宗明义地强调修订条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统一战线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sup>②</sup>。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党在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上的具体要求。集中统一领导与提高工作水平是统一的，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能进一步增强党对党外各个方面的政治领导，为提高工作水平提供组织领导保证，而提高工作水平更好地实现了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第二，统一战线工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土壤，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根植于近代以来的政治探索、根植于新中国以来成功实践和经验，彰显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新”就新在，国家政权与人民普遍意志高度统一，中国的政党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参政的各民主党派，都共同为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利益、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广泛共同利益服务；“新”就新在，执政党和参政党为更好地实现民族、国家和人民利益而高度整合形成政治合力，共同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新”就新在为促进科学、民主决策而团结合作形成国家治理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促进政党关系、党内和党外关系和谐，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作用，体现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发挥政治制度优势。

第三，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是统战工作的基本方针和重要原则，也是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一致性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统一战线团结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强调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覆盖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的共同奋斗目标，强调坚持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统一战线思想引领基础，归根到底就是强调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多样性反映了新时代社会成员在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客观多样性和差异性。统战工作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基本点是在追求一致性的同时尊重客观性的求同存异，基本途径是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通过协商凝聚共识，促进政治参与。通过多协商、广协商和深协商，找到符合全社会意愿的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统战工作为更好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服务，体现在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统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强调各个方面广泛有序参与、充分表达意见建议、努力形成一致共识，体现了国家治理的“善治”要求。统一战线组织

<sup>①</sup>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4页。

<sup>②</sup>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3页。

广泛覆盖参加协商民主的各个方面，是各类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参与主体。人民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也是我国协商民主的专门协商机构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战线各个方面政治代表参加协商民主的专门渠道。参加协商民主是党外代表人士参加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指导和组织党外代表人士参加各类政治生活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统战工作支持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其他党外代表人士参与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以及其他协商。

参与主体多样性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要求。统战工作以发挥政治工作作用促进治理参与者的团结合作，教育引导参与者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协商促进广泛共识、画出共同利益最大公约数、履行实现一致目标共同责任，发挥参与者积极作用，形成治理合力。统战工作以发挥统一战线组织性作用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加强对社会各个方面代表性的政治吸纳、政治培养和政治推荐，拓宽其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渠道，促进党外代表人士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政治协商职责，在履职中发挥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重要作用。

## 二、准确把握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的云南统战工作要求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工作形态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并作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云南工作，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是一个重要方面。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部署，确保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云南得到坚决贯彻落实。体现在云南统战工作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为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服务，坚决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好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做好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重要工作的民族宗教工作。

坚持党的领导对云南统战工作、民族宗教工作领域的全覆盖。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无论是边疆地区还是民族地区，无论存在地区的特殊性还是民族宗教问题的特殊性，无论是工作的一般性还是复杂性，都不能以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或局部性等原因脱离或削弱党的领导。事实证明，一些先前出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影响面大影响时间长的民族宗教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被弱化或虚化。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往往源自基层牵扯到民族宗教因素，还往往与其他问题相互交织，处理和解决好问题更需要从全局出发系统解决，加强各级地方党委在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作用，统揽工作全局、有效组织各方面协同解决问题，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在民族宗教工作主体责任。

要把思想政治、促进发展、依法治理等工作统一在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是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最重要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坚持不懈在各族人民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宣传教育，增进各族人民和宗教界及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政治工作实践形式是全面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民族工作以团结进步为主线，以促进共同发展为重要工作内容，促进发展特别是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的民族发展以及兴边富民等行动是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必然要求。宗教工作以法治规范管理为主要任务，以解决宗教领域突出问题为重点，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三、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云南统战工作实践和经验

云南是一个民主党派组织齐全、民族宗教问题复杂、侨务资源丰富、与港澳台海外联系紧密的边疆省份。这样的省情统情，决定了统战工作在全省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党中央“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云南省委明确提出“云南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要把统战作为中心工作”，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力量，为建设新云南凝聚了人心和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作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党和国家工作实现战略性伟大转折，云南统一战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统一战线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开启了统一战线创新发展的新阶段，云南统战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一）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云南统战工作实践

近年来，云南统战工作在贯彻落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壮大了统一战线组织，推动了云南统一战线事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港澳台海外关系和谐，增强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要求的政治整合、以汇聚力量促发展为根本任务的社会整合的统一战线，为做好云南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工作服务，为促进云南高质量发展服务，为推动脱贫攻坚服务。

##### 1. 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在云南蓬勃发展

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2018年以来，紧扣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历史节点、历史事件，支持民主党派组织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制度自信，不断提升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深入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8个民主党派省委在云南日报发表题为《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联合署名文章，抒发了“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的共同心声。

不断提高民主党派组织质量。2017年以后，8个民主党派省级组织和55个州市级地方组织换届后，一批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党外代表人士走上民主党派省级组织领导岗位，并按照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民主党派政治交接的要求，以换届为契机，继承和发扬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深化政治交接，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水平。在提高发展和吸纳的党派成员质量的同时，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要求，各民主党的组织规模也得到适当扩大，不断为多党合作事业和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输入新鲜血液、增添新活力。据有关统计，近五年8个民主党派党员、会员或成员人数增速约为3%—5%左右，如民革党员、民盟盟员人数增速约2.6%，民进会员、农工党党员人数增速约3.5%，致公党党员人数增速约5%。

支持民主党派开展民主监督。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是民主党派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新领域。中共云南省委在协助做好农工民主党中央对口云南省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的同时，支持8个民主党派省委对口8个州（市）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丰富了民主监督的内容和形式。同时进一步健全完善民主监督知情、沟通、反馈机制，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政府重要工作、重大项目实施、重要政策落实等情况进行调研考察，提出意见建议，并开展民主监督。

高度重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其他党外代表人士的培养和使用。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的主阵地作用，到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深入开

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从把民主党派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纳入党委人才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到加大对民主党派代表人士的培养力度，再到协助民主党派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从配备社会主义学院领导班子党外领导干部到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并印发《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都充分体现了中共云南省委对发展多党合作事业，加强对党外的政治领导，夯实增强凝心聚力的思想政治基础的高度重视。

## 2. 政治协商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建言出实策

发挥政治协商机构的重要作用。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协商民主的专门协商机构，各级政协聚焦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紧迫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热点问题，积极通过提案履职建言，发挥了政治协商的重要作用。据有关统计，每年省级政协立案提案数量是委员数量的一倍多，州市级政协立案提案数量与委员数量相当，县级政协立案提案数量约为委员数量的一半以上。总数量如此之多并得到高度重视和广泛采纳吸收的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民生、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建言献策，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施策、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问题、解决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如2020年，省政协立案提案826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案376件，占总数的45.5%；围绕打好脱贫攻坚战、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等方面提案247件，占总数的29.9%；围绕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打好污染防治战、推动绿色产业发展等方面提案84件，占总数的10.2%；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云南文化繁荣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提案68件，占总数的8.2%；围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全面依法治国等方面提案51件，占总数的6.2%。此外，省级政协充分发挥政协界别横向联合和与州市县政协的纵向联系作用，集中优势资源组织建言资政工作，围绕我省“十四五”规划编制的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联合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和州市县政协开展了38个课题调研，聚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和保障民生、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生态文明建设5个专题协商议政，提出了一批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州（市）级政协，以普洱市为例，2020年立案提案183件，涉及社会建设方面68件，占37.16%，涉及经济建设方面62件，占33.88%，涉及文化建设方面22件，占12.02%，涉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20件，占10.93%，涉及政治建设方面11件，占6.01%，为推动民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做好地方治理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县（区、市）政协，以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为例，2020年政协立案提案88件，经济建设类5件，占5.7%，社会事业类25件，占28.4%，综合类11件，占12.5%，聚焦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实际问题建言献策。另外，在调研中我们还了解到，中共金平县委组织制定并实施年度重点协商计划，内容包括县政府工作和计划发展及执行报告、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评估、民族直过区和直过民族社会综合治理情况、县重点建设项目实施情况的民主监督、饮用水源保护和打造“长寿之乡”等9个协商议题。

充分发挥政党协商“直通车”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委及时制定出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政党协商等实施意见，制定年度政党协商计划，支持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对政府重要工作、重大项目实施、重要政策落实等情况进行调研考察，提出意见建议，并每年分别就事关全省改革发展大局的10个课题开展调研协商，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2018年，省委制定完善知情明政、考察调研、协商反馈等机制，建立政党协商专报制度，完善党外人士季度情况通报会制度，推进政党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做到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健全完善省委领导与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同志交流联系，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与省政府有关



部门对口联系以及情况通报会、征求意见座谈会等制度,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供有力保障,一批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和民生热点的意见建议乘上直通车。2020年昆明市委组织召开的一次专题调研协商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市级组织和无党派人士汇报了包括“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区域性国际化媒体融合中心”“打造生物多样性科研产业基地”“建设区域性国际绿色会展之都”“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聚焦建设国际区域性中心、凸显推动云南发展区域特征的专题调研成果,为全力推动昆明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作出新贡献。

### 3. 持续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取得实效

早在2011年,习近平同志就对云南民族工作就提出期望:“为把云南建设成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不懈奋斗。”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明确提出,希望云南“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做好民族工作,最大的挑战是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近年来,云南民族工作践行“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的庄严承诺,重点推进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响“直过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2018年以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为总抓手,推动实施“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抓实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脱贫攻坚工作。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2018年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成功举办民族大团结为主题的建州60周年庆祝活动,普洱市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市”,云南省第十一届民族运动会在临沧市成功举办。2019年,昆明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市)”。2020年,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布的《第八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拟命名名单》,云南拟有包括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等14个地方和单位入选“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

### 4. 坚持以“导”的要求推进宗教中国化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宗教工作要牢牢把握宗教工作主动权,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sup>①</sup>2017年,云南省制定实施《云南省宗教工作网格化管理问题清单交办责任清单落实制度》,推动基层统战、民宗等部门宗教工作责任“焊接”到网格单元。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展试点工作,建立县乡村三级宗教工作网格责任区,以问题为导向,打通破解难题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云南省还深入开展“和谐寺观教堂”评选,协助办好第二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第七届大理崇圣论坛,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18年,相继开展了云南佛教讲经交流、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讲经交流、道教玄门讲经、伊斯兰教卧尔兹讲经和天主教民主办教等活动,坚持以宗教中国化为主线,促进我省宗教和谐。2018年10月,以宗教中国化为引领、以爱国主义为主题、以云南宗教团体为主体,组织开展云南“五进”宗教场所活动。2019年,有关方面联合组织全省宗教工作和理论研究单位、宗教团体及宗教界代表人士,以“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云南实践和经验”为主题召开研讨会,广泛深入研讨云南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理论实践、经验做法、路径走向,促进云南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 5. 统一战线服务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近年来,统战部门牵头云南各民主党派启动“脱贫攻坚会泽同心工程”,保障农工党中央对口云南省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有效开展。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推动“中国光彩事业·德宏行”签约项目落地。2018年,深化“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成功启动为期3年的“中国光彩事业怒江行”活动。此外,统一战线成员还打造“同心·智力支持”品牌,实施“思

<sup>①</sup>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人民日报》2016年4月24日,第1版。

源工程”“同行公益”，组建“同心·绿色服务团”，开展温暖工程，推进智力支边等，展现了担当尽责的良好形象。2019年，把聚力脱贫攻坚作为服务中心大局的重大政治责任，聚焦深度贫困地区“两不愁三保障”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力整合、高效统筹、精准投放统一战线资源力量，深入开展“同心圆梦彩云南·聚力脱贫攻坚战”行动，着力打造六项同心工程，推动会泽同心工程示范作用，通过项目化、精准化的方式整合统一战线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彰显统一战线力量的聚合效应。同心聚力行动，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统一战线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将统战系统单位“所能”与深度贫困地区“所需”无缝对接，把统一战线整合的资源和力量用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刀刃上，形成涓流汇聚的强大合力。

#### 6. 助力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云南地处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一个重要地区节点上，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助力做好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工作，对国家发展意义重大，对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2017年，省委统战部参与举办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协助召开第六届“云台会”，举办第十五届东盟华商会及论坛等，促成一批招商引资、文化交流和公益捐赠项目签约或落地。2018年，依托和创新现有的同乡联谊、经贸合作、交流基地等平台载体，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品牌活动，深化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强云南海外联谊会自身建设，举办“同心圆梦彩云南·海联情系珠江源”曲靖主题活动，助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2019年，参与制定支持华人华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举措，成功举办第十届世界云南同乡联谊大会，在“走出去”“请进来”中凝心聚力，扩大了云南海外朋友圈。

#### 7. 扎实开展基层统战工作，增强基层治理

基层统战工作始终融合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在少数民族、边境地方的基层社会，统战工作始终与民族宗教事务、社会治安、边防安全、平安建设的社会治理紧密结合在一起，始终与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作用紧密结合在一起。以红河州金平县和绿春县为例。金平县边境线长达502公里，少数民族人口占88%；绿春县边境线长153公里，少数民族人口占98.8%，其中哈尼族人口就占87.7%，民族宗教和边境安全工作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工作。统战工作以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为主要抓手，发挥协调协同共治作用。如：实施“一把手”工程，落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加强地方基层党委对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对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安全等方面治理的全面领导；落实共建共创机制，如示范创建“九进”工程（进机关、社区、乡村、学校等），全方位全覆盖开展工作，促进示范创建工作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实施部门联动机制落实协同治理责任，排查调处涉及民族宗教问题的矛盾纠纷，妥善处理化解问题；建立民族团结示范创建的学习争创交流共进机制，增强创建的辐射带动作用，从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示范面”向“示范带”“示范圈”覆盖。宗教工作以依法治理为主线发挥统战工作主导作用，规范和细化管理，如管理细化到宗教场所、宗教人员、场所财产、资金财务、安全生产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存在和可能问题形成有效束缚的制度机制网，并落实管理责任。在社会治安、边境治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的平安建设上协同调动人民群众发挥群策群防作用。

#### （二）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云南统战工作经验

云南丰富的统战工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1. 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要求，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

坚持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集中体现在巩固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增强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上、开展民主党派工作的具体措施上，包括：引导巩固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团结合

作水平；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责、不断丰富团结合作内容和形式；指导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团结合作质量等方面。始终按照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加强民主党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要求，指导和推进多党合作事业在云南的实践，始终坚持省委在民主党派工作中的思想引领和组织领导作用，发挥统战部的联系、协调、沟通和相关工作的指导作用，充分调动各民主党派组织和党外代表人士发挥积极作用。

## 2. 始终把政治协商作为重要制度遵循，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

凝心聚力是统战工作的根本任务，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广泛而紧密的团结合作是形成凝心聚力的根本要求，其中政治协商起到重要作用。政治协商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石，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发挥着凝聚共识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促进团结合作提高治理水平、引导广泛参与、发扬民主的重要作用。云南统战工作始终把促进政党协商发挥“直通车”作用、促进政协协商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和及时反映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服务摆在重要工作位置，协调民主党派参加政党协商，促进统一战线各个方面和党外人士参加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和其他协商，推动统一战线各方面和党外代表人士发挥重要作用。

## 3. 始终把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各方面工作中共抓共管

云南是民族工作大省，这决定了云南工作在很多情况下都与做好民族工作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突出特点，决定了云南统战工作既要发挥民族和宗教工作的直接职能，又要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和工作在推进中共同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在促进民族进步工作中形成很多好经验，如“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思想、“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信念、“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决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承诺、“不懂民族工作的领导干部不称职，做不好民族工作的领导干部是失职”要求等。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实践上，也形成了民族团结同心、奋斗目标同向、繁荣发展同步、稳定和谐共治、美丽家园共建等“同心、同向、同行”的经验概括，体现各项工作对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共同责任。

## 4. 始终把促发展、促和谐、保稳定作为重要抓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是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任务，经济发展为民族团结进步提供物质基础，社会发展为构筑各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奠定社会基础。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解决很多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根本要求，充分体现“各民族都是一家人”理念，共同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摆脱贫困。统战工作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抓手，以“同心”为主题，调动统一战线在智力、经济、文化、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资源，通过项目建设和示范作用推动脱贫攻坚，促进统一战线成员的实践参与，增强团结合作，不断增进共识。社会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涉及民族宗教的问题始终是关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统战工作对存在的问题始终坚持依法依规管理，对实施制度规定坚持精细化管理，对解决问题坚持责任管理，以刚性制度要求预防出现问题，以柔性方法有力解决问题，以引导、调解、促和等方法化解矛盾问题。

责任编辑：念兴昌

# 云南统一战线智库建设座谈会综述

李亚强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 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的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统一战线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日益增多, 汇集统一战线领域研究力量, 建设特色鲜明的统战智库尤为必要。云南统一战线智库聚焦云南统战领域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展开研究, 为云南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进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召开的云南统一战线智库建设座谈会, 围绕建设统一战线智库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功能定位、面临问题及经验做法进行交流研讨, 形成一些可供借鉴参考的经验, 为有效推进云南统一战线智库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 云南统一战线智库; 功能定位; 经验做法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1) 04-0053-05

2021年9月24日,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召开云南统一战线智库建设座谈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重庆社会主义学院、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青海省社会主义学院、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政策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云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云南省社科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昆明市社会主义学院等十四家单位的智库负责人以及学院各处(室)负责人、全体教师参加座谈会。

本次座谈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中共云南省委印发的《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等文件精神;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智库建设的目的、性质、定位、功能、做法以及智库建设面临的困境等内容进行了交流研讨, 对怎样建设好云南统一战线智库提供了提出许多具有建设性、指导性、参考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 为推动云南统一战线智库建设不断取得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

## 一、统一战线智库建设势在必行

### (一) 建设统战智库可以有效应对统战新情况新问题

新时代统一战线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 亟待开展有效研究和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这其中有很多问题与统一战线各领域交叉衔接, 需要通过凝聚统一战线智慧和力量集中予以

**作者简介:** 李亚强,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讲师, 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回答。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科研管理处处长刘英凤认为,建设统一战线智库要统筹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回应问题挑战。一方面,中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日益增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风险加大,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好本国的智力资源,建设符合自身发展和定位的新型智库,致力于研究和解决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另一方面,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的责任更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此,建设兼具理论深度和国际视野的特色新型智库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以智库为媒介和平台积极做好对外文化交流合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科研部项目处处长田琳琳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针对统一战线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新时期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有鉴于此,加快建设旨在研究和解决统战领域新情况新问题的统一战线新型智库尤为重要。

### (二) 建设统战智库是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编辑部执行主编林华山认为,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就如何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等方面,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深化管理体制,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给出指导性意见,为各地智库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随后,各省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出台实施意见。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开始了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智库建设。

中共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信息处处长向忠义认为,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党外代表人士迎新春会上鲜明指出,“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可以说是一个大智库”,明确作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统一战线智库的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学院要发挥好智库作用”,对社会主义学院加快统一战线智库建设,发挥社院智库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此后,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为代表的全国社院系统开始了有步骤的统一战线智库建设工作。

### (三) 建设统战智库是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的重要举措

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戴有锟认为,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明确提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具备条件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可以建立统一战线智库,开展统一战线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这为社会主义学院建设统战特色智库,充分发挥好“三个基地”作用指明了方向。《条例》颁布后,社院系统进一步加快统一战线智库建设的步伐。目前,已完成智库挂牌并开始运行的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智库等多家社院智库。这些智库当中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资政成果,为推动统一战线领域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推动云南统一战线智库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和经验借鉴。

## 二、统一战线智库建设的功能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处长李艳霞认为，智库建设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重要论述和指示为根本遵循，在智库建设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其功能定位，确立智库的研究领域、服务方向和基本原则，在明确以上基本要素之后，再开展有针对性的智库建设工作。

青海省社会主义学院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马震认为，统一战线智库与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等其他类型的智库既存在相似之处，也具有鲜明的区别。从相似性来看，统一战线智库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序列中的其他类型的智库都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都是国家或地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具体功能来看，统一战线智库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序列中的其他类型的智库的关注点、侧重点、研究领域各有不同，统一战线智库立足“小中心、大统战”，聚焦的是统战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服务于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服务于党的统一战线、服务于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统一战线智库建设的功能定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为开展好共识教育提供学理支撑。统战智库要始终坚持用学术讲政治，以文化育共识。社会主义学院是开展统战教育的主阵地，要充分发挥好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基地、方针政策宣传基地作用。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讲清楚，要向广大统一战线成员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问题，做到党的理论方针政策进课堂、进教材、进学员头脑。

二是为党政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其智库的研究不仅要服务统一战线工作，更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原则，充分发挥自身点多线长面广的研究优势，发挥好统一战线智力密集的特点，引导智库科研力量致力于开展一些符合地区实际、推动地区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储备性研究，形成一批站得住、推得开、叫得响、有影响、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参考。

三是社会主义学院是意识形态的一线部门，统战智库要突显意识形态功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做到“社院姓社”是其鲜明底色。因而统一战线智库的功能定位要不同于一般的宣扬开展客观和中立学术研究的智库，统一战线智库应该坚持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属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坚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统战智库要发挥好统战功能，起到联结上下、协调各方的纽带作用，致力于搭建汇聚不同观点意见的诉求平台，处理好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

四是文明互鉴搭建交流平台。社会主义学院的另外一块牌子是中华文化学院，旨在开展以爱国主义为宗旨，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研究和对外交流活动。因而社会主义学院建设的统一战线智库天然地具备打造海内外学术交流平台，做好对外文化研究阐释交流合作的职责，天然地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助推中华文化的传播，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

### 三、统一战线智库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与会专家认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别是建设统一战线智库在确定功能定位之外，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管智库，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主任杨顺书认为，统战智库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服务统战工作，服务地区、服务国家发展，服务统战成员、服务人民，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二是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统一战线事业发展。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决策咨询管理科负责人王馨慧认为，统一战线智库就是为凝聚起统一战线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围绕统战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问题，推动创新创造的关键问题开展理论与对策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着力提高智库的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正确处理好在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充分发挥好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

三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做深做实调查研究。统一战线智库研究要紧跟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展开，紧跟中央和省委决策需要进行，坚持求真务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带着问题深入一线开展经常性的调查研究，将调查研究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云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秘书处副处长付晶认为，统战智库要深入了解统战一线情况，积极研究和回应人民关切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按照“切口小、研究深、更管用”的标准积极做好建言献策、决策咨询工作，确保决策参谋参在点子上、谋到关键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尤功胜认为，在开展研究过程中要充分尊重不同领域、不同学术背景专家、学者的学术观点、思想碰撞、政策建议，通过学术争鸣、交流研讨形成最优方案并提供给党委政府决策参考，为智库发展营造健康向上的良好环境。

四是以我为主，坚持用开放理念办好统战智库。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友康认为，统一战线智库开展的统战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开展思想政治研究的重要平台，要充分运用好统一战线人才汇聚、智力密集的优势，运用好统一战线智库这个思想产品的小市场，在智库建设过程中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突出优势和特色。云南省社科联办公室副主任张谨认为，在坚持开放理念办智库的同时也要做好自身队伍建设，不断培育和壮大社会主义学院自身的研究力量，充分调动和发挥好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效提升服务智库发展和提供决策咨询的能力和水平。

#### 四、统一战线智库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可资借鉴的经验做法

与会专家认为，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发展进程较快，在推动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整体来看，我国新型智库发展仍存在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就统一战线智库而言，存在以下五个共性的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解决。一是高标准建设统一战线智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普遍重视，建设进度推进缓慢；二是统一战线智库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序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限，缺少与相关智库的横向和纵向联系，限制了自身作用的发挥；三是全国统一战线智库建设水平参差不齐，缺乏拿得出、推得开、叫得响、站位高的科研资政成果；四是统一战线智库项目建设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主题结合得不够紧密，对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关切不够；五是统一战线智库亟待培育一批拥有学术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的专家队伍、学科领军人物。当然，统一战线智库建设本身尚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优化相关体制机制、功能定位、



组织形式、管理方式等内容，才能实现智库健康发展、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针对统战智库建设面临的具体问题，与会专家认为，统一战线智库建设可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动智库发展走入正轨。

#### （一）建立完善的统战智库运行机制

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处智库办公室副主任陈竹认为，要着力建立完善的智库运行机制，理顺智库运行关系，以统一战线智库为抓手，统筹协调云南统一战线、各类统战系统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着力打造一体多元、协同推进的智库发展格局。

#### （二）建立完善的统战智库制度体系

云南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刘连杰认为，要逐步建立完善的智库制度体系，出台智库章程、智库专家咨询委员会管理办法、智库工作委员会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章程。以完善的制度建设为先导，推动智库运行规范化、有效化、科学化。吸纳建设一批包括特约研究员、学科带头人等在内的智库专家队伍，通过智库项目将智库科研力量有效联结和调动起来，充分发挥智库优势。

#### （三）建立完善的统战智库研究布局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科研部科研管理处处长刘英凤提出，要建立特色突出的智库研究布局。统一战线智库主要聚焦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创新三大领域的研究，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智库以研促教、以研资政、以研促鉴、以研助宣四大功能，推动教资研融合发展，发挥好智库的公共服务和舆论引导功能。

#### （四）建立完善的统战智库科研活动体系

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副科长郭晓可认为，要不断建立完善的智库科研活动体系。通过定期组织举办论坛、学术研讨会、文化沙龙、专家座谈会等方式，实现统一战线智库与国内、省内新型智库序列中其他成员的横向联系和纵向交往，获得前沿学术信息、学术资讯，紧扣国家发展、时代发展的主题和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及时组织科研力量进行专项研究，开展科研攻关。

#### （五）建立协调的统战智库资源统筹机制

昆明市社会主义学院市情研究中心主任罗荣武认为，要建立资源统筹机制。在此方面，统一战线智库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序列中的其他智库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优势，即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社会主义学院的定位给统一战线智库建设带来巨大的人才资源。无论是邀请到社院为培训学员授课的专家、学者，还是参与培训的统战学员都是统一战线智库建设可以深入发掘的富矿，要发挥好学院院务咨询委员会功能，协调各方力量，实现资源共享，特色共创，形成凝聚和培育智库科研人才的强大合力。坚持大统战视野和大统战智库建设思路，以统一战线智库为平台，实现统战系统内外科研力量的有机整合，推动智库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责任编辑：念兴昌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边境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研究

——以云南 W 学院为个案

兰良平

(文山学院, 云南 文山 663099)

**摘要:** 在高校大学生中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 离不开铸牢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深入了解边境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现状, 笔者以云南 W 学院为个案, 就该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予以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该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得较好, 宣传教育成效显著。同时, 对于存在的不足之处应引起重视, 学校应竭力在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课程构建等方面久久为功。

**关键词:** 边境高校大学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团结; 培育机制

**中图分类号:** D6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1)04-0058-06

我国是由 56 个民族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 “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 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 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 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统一体”<sup>①</sup>的格局。这个“多民族的大一统, 各民族多元一体, 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 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sup>②</sup>。因此, 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为紧要。正因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4 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up>③</sup>之后,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up>④</sup>并将其写入《党章》。随后, 2018 年“中华民族”被写入《宪法》。同时,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再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可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党和国家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也是宣传教育工作的思想主

**基金项目:** 云南省民委“云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云民宗办发〔2021〕14号); 文山学院质量工程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重点课程建设”(WYZL180208)。

**作者简介:** 兰良平, 文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3—21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99页。

③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252—253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27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2021年11月17日。

线。当代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接班人，这些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如何，有什么特点，存在那些不足，高校应如何精准培育？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本质要求。因而，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极为深远。

通过中国知网（CNKI）平台的文献检索，笔者发现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近年以来的主要学术热点之一。总体而言，当前关于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领域：一是理论研究。例如，商爱玲基于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个维度，阐释了其现实意义和基本路径<sup>①</sup>。二是课程融入研究。例如，刘玉以《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概论》为例，就如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教学展开探讨<sup>②</sup>。三是抽样调查研究。例如，李从浩、汪伟平以 29 所高校调查数据为例，对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因素展开研究<sup>③</sup>。四是路径研究。例如，孙琳从情感认同视角，分析了情感认同的依据、机理及铸牢路径<sup>④</sup>。通过这些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术成果是不断推陈出新的。遗憾的是，至今鲜有学者关注边境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欣慰的是，学者罗惠翹<sup>⑤</sup>、高永久<sup>⑥</sup>等为学界研究边境地区（牧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了个好头。笔者为了解边境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状况，选择中越边境地区之云南 W 学院为个案，实证回应学界、教育部门对边境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并就边境高校如何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展开探讨，以为我国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些个案参考。

### 一、技术路线与样本情况

本文以中越边境地区云南 W 高校的一至四年级本科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星”发放问卷的方法，并辅之以个案访谈，集中对 W 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现状展开调查。问卷设置了 21 个问题，调查内容包括：第 1 至 7 题涉及大学生基本情况，第 8、第 10 题涉及民族构成知识，第 9、第 11 题涉及相关知识来源，第 12、第 18 题涉及课程融入，第 13 至第 16 题涉及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第 17 题涉及大学生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第 19 题涉及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因素，第 20、第 21 题涉及培育路径。此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方法，调查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9 日至 26 日，范围是 W 学院的在校大学生，总共回收 1101 份有效问卷。样本构成主要情况：一年级 175 人，二年级 573 人，三年级 166 人，四年级 187 人；男生 269 人，女生 832 人；汉族 759 人，少数民族 342 人；17 岁以下 4 人，17 至 23 岁 1078 人，24 岁以上 19 人；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44 人，共青团员 835 人，群众 100 人，入党积极分子 122 人。

① 商爱玲：《铸牢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第 3—8 页。

② 刘玉：《西藏高校思政课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探——以〈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概论〉为例》，《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第 216—223 页。

③ 李从浩、汪伟平：《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 29 所高校调查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第 46—54 页。

④ 孙琳：《以情感认同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据、机理与路径》，《思想教育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147—151 页。

⑤ 罗惠翹：《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几个关键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29—34 页。

⑥ 高永久：《铸牢边境牧区各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意涵、外部影响与整体布局》，《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第 39—45 页。

## 二、数据统计与分析

为掌握云南W学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状况,我们用设定问题(含单选、多选)的办法进行调查。

###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sup>①</sup>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知识、理论的普及。本研究关于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知识的掌握、理解情况的调查结果如下:一是样本对自己民族成分的认知情况。由收回的有效问卷情况可知,1101位大学生对自己的民族归属作答清晰、认知很明确,样本中有汉族759人、少数民族342人。二是样本“是否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该问题,580位大学生选择“知道”,占有效样本的52.68%;56位大学生选择“不知道”,占5.09%;465位大学生选择“知道一点点”,占42.23%。三是样本对我国的民族构成的认知情况。样本中,有1072位大学生知道“我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大家庭,55位大学生认为“我国是由55个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5位大学生认为“我国是25个民族构成的”。

从以上回答来看,云南W学院大学生对于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基本认知状况总体较好,但相关的理论宣传和普及还存在一定盲区,如还有521位(占47.38%)大学生对“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了解不多或者“不知道”。

###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学习渠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指导我国民族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思想。然而,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渠道不同,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掌握的牢固程度。

由“您是从什么渠道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的作答情况,可以看出该校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学习渠道是多样化的,主要以新闻、报纸和互联网(877人,占样本的79.65%)、政治书籍(583人,占样本的52.95%)以及历史书籍(452人,占样本41.05%)为主。统计结果也表明,我国的新闻网络、政治和历史书籍里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宣传教育是有效的,其宣传和学生相关认知符合党和国家关于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构成总体把握的要求。此外,有的大学生还通过参加泼水节、火把节等民族活动(310人,占样本的28.16%),以真实体验来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认知和自觉。另外,有的大学生(368人)则从其他渠道获得相关知识,如聆听学术讲座、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等等。

在政治和历史宣传教育方面,高校主要是以课程和符号宣传方式对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思想引导。在高校涉及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课程里,80.11%的大学生表示在“公共思政课”听过老师讲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13.08%的大学生表示在“文科专业课”里听过,其中表示在“理科专业课”里听过相关知识的学生比例仅为1.36%,还有5.45%的学生表示“没有听过”。可见,高校“思政课”在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方面起着“主阵地”的作用。

### (三)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的看法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树立的价值观、民族观、国家观正确与否,将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

<sup>①</sup>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3—21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sup>①</sup>，问卷针对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课程融入方面的看法进行了调查。

问卷设置了“您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不要融入各门课程之中”的问题。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认为应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相应课程之中，如思政课、实践课等。具体来说，有 972 位大学生认为“要”将其融入课程之中，占 88.28%；79 位大学生选择“不知道”，占 7.18%；50 位大学生认为“不要”。很显然，绝大多数大学生对于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课程体系之中是认可的，但还有少部分同学迟疑不决。

#### （四）对自己与中华民族关系的理解

如何定位自己与中华民族的关系问题，将对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发挥、树立正确的民族观等产生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sup>②</sup>这句话集中诠释了个体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是命运与共的密切关系。那么，大学生对个人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的理解，是否也如此呢？

问卷设置了“如何理解您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的问题（多选题）。样本中，选择“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的有 1033 人，占 93.82%；选择“我和中华民族是命运与共的关系”的有 992 人，占 90.1%；选择“我热爱中华民族”的有 969 人，占 88.01%；选择“我会用实际行动捍卫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的有 942 人，占 85.56%。对于“您认为要由谁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问题，95.55% 的大学生认为要依靠“所有中国人”。

调查结果证明，云南 W 学院的大部分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各成员间是休戚与共的关系，这说明当代大学生从思想观念上树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体上较为牢固，为其担负起党和国家给予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 （五）大学生对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宣传的感受

铸牢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高校宣传工作的推进密不可分。为调查大学生对相关宣传的感受，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以下四个与之关联的问题：一是“您觉得，学校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吗？”样本中，有 793 位大学生（占样本 72.03%）认为是“重视”的，有 230 位大学生（占样本 20.89%）认为“不重视”，还有 78 位大学生（占样本 7.08%）“不知道”。二是“您在学校见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标语吗？”样本中，有 379 位大学生（占样本 34.42%）认为“有时有”，有 266 位大学生（占样本 24.16%）认为“经常有”，有 243 位大学生（占样本 22.07%）认为“很少有”，有 127 位大学生（占样本 11.53%）认为“没有”，有 86 位大学生（占样本 7.81%）认为“不知道”。三是“学校微信公众号推送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吗？”样本中，有 491 位大学生（占样本 44.6%）认为“有”，有 370 位大学生（占样本 33.61%）回答“不知道”，有 240 位大学生（占样本 21.8%）认为“没有”。四是“您参加过学校举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如民族知识竞赛、民族团结征文等）吗？”样本中，有 641 位大学生（占样本 58.22%）认为“没有”，有 320 位大学生（占样本 29.06%）认为“参加过”，还有 140 位大学生（占样本 12.72%）认为“不知道”。由此可见，云南 W 学院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工作，但效果不是太明显，这从宣传标语、公众号推送、举办活动使大学生得到的真实体验分别为 34.42%、44.6%、29.06% 可以得到佐证。

<sup>①</sup>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各族儿女携手奋进新征程》，2021 年 8 月 29 日，<https://xhpfmapi.xinhuanet.com/vh512/share/10221941?channel=weixin>, 2021 年 10 月 4 日。

<sup>②</sup>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民族》2019 年第 10 期，第 21—24 页。

#### (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因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环境,等等。因此,高校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需要让大学生了解哪些因素会制约其意识形成,从而使他们更好地接受和自觉配合培育工作。问卷设置了多选题“您认为影响高校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因素有哪些”。样本中,选择“学生不太关注民族问题”的占68.39%,选择“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不多”的占59.85%,选择“民族团结教育缺乏”的占54.13%,选择“学校重视不足”的占47.77%,选择“其他”的占29.97%。

上述结果表明,大学生们认为其主要影响因素是学生不太关注民族问题、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不多、民族团结教育缺乏。这反映出学校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方面也亟须加强。

#### (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除了了解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状况,还必须针对“如何铸牢”问题倾听大学生们的心声。因此,问卷设置了“您认为高校应该如何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题(多选题),以考察大学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施路径的建议。结果,样本中选择“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民族元素”的占86.92%,选择“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占78.93%,选择“开设民族理论课程”的占77.75%,选择“讲好民族团结故事”的占76.11%,选择“家庭、社会及学校重视民族教育”的占68.85%,选择“完善相关法律”的占49.05%,选择“其他”的占19.53%。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是否需要开设民族理论课程”这一问题,有86.74%的学生选择“有必要”。该结果与上文所述的选择以“开设民族理论课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施路径的样本比例大体相当,这反映出大学生对于高校设置民族理论课程的呼声比较高。同时,该选项的调查结果,同前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的看法”的调查结果相互呼应,进一步表明了开设民族类课程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现实情况是除了设有民族学(本科、硕士及博士)专业的高校、民族院校或者少数其他高校安排一些民族理论课程外,我国其他高校均没有专门开设民族理论类的课程。

### 三、结论与思考

上文通过对云南W学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状况的问卷调查情况,对结果与问题设定进行了分列式阐述。

从宏观层面审视该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可将其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 (一) 边境高校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得较好

从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了解、自身民族识别、自身所属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认知、自身使命担当等方面来考察,云南W学院大学生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掌握得较好(认知率为52.68%),对由谁来担此重任有明确的认知——所有中国人。尽管有少部分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不太深入,但是随着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不断深化,例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等通识课程的推广,完全有理由相信大学生们能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担当作为,从而促进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复兴。

需要注意的是,高校要更有效地开展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活动,不仅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的理论精髓,更要加强理论的实践和经验总结,并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培育机制,从而以“最大公约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 (二) W学院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成效显著

学校是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全国各地认真贯彻落实这一理念，务实进取，开创了民族团结进步、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高度一致的新时代，其中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也与时俱进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有代表性的边境高校，云南 W 学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党对工作的全面领导，在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文化传承方面成绩显著，在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调查问卷结果也反映出，72.03% 的大学生认为学校“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

在实践中，W 学院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调查结果显示，样本中 44.6% 的大学生认为学校开展了以下宣传教育活动：民族团结进课堂、进校园、进寝室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易班中心（E-Class）每周以“微视频”方式发布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汇、人物访谈等；校园里设有“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栏，建有“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广场；等等。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获得方面，主要以新闻（占 79.65%）、课堂（占 88.28%）、书籍（政治书籍占 52.95%、历史书籍占 41.05%）为主，其次参加民族活动（占 28.16%）。要注意的是，还有 27.97% 的大学生在问卷中表示不知道或没有接受过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这是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盲区。这就要求学院在总结已有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促进效果巩固提升，努力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到每一个角落。

### （三）边境高校大学生对开设民族类课程的需求较为迫切

尽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比较多，但由于各种原因，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工作仍有一定的滞后性，当前高校的民族观教育需要更好地与新时代民族问题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相结合。调查发现，不少同学认为民族团结是少数民族的事，甚至部分教师也持这种偏见，抑或认为这只是负责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部门应该承担的意识形态工作，非意识形态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笔者认为，这些思想认识较为偏颇。无论是思想政治、学科专业还是课程体系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是围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培育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中心任务进行的，因而教育领域的一切事务都属于思想工作。虽然学校各部门之间会因业务有所区分而设置不同岗位，但最终都是为“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为谁培养人”问题而服务的。所以，学校在深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必须通过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来实现团结一心、铸牢各族干部群众开展民族工作的思想凝聚力，促进各项工作和谐顺利开展。

宣传思想和大学课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主渠道，而民族类课程可以从历史、现实、未来的思维高度来诠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问题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当然，其他课程也能发挥凝聚各民族思想的作用，但因为专业性、方向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衔接强弱不一，因而通过民族类课程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最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对于开设民族类课程（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受调查学生的呼吁度达到 86.74%。教育部 2015 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指出，应“在师范院校和民族院校设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师范专业，培养培训民族团结教育课教师。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督导评估工作”<sup>①</sup>。这个决定，为包括云南 W 学院在内的师范院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了法规性文件依据。

责任编辑：杨松禄

<sup>①</sup>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15 年 8 月 17 日，[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508/t20150817\\_200418.html](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508/t20150817_200418.html), 2021 年 11 月 17 日。



# 云南民族团结经验示范的三重维度

杨松禄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 中央把云南定位为“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一个主要考虑是, 希望云南总结好民族团结的经验, 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做出云南示范, 为国内其他地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提供经验借鉴。总结经验并不是目的, 而是要把这些经验用起来。经验的形成并不是静止不变的, 它在实践中发展, 并不断形成也将在新的实践中形成新的经验。所以, 总结云南经验对云南、对国内其他民族地区、对国家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甚至从某种层面来说, 还具有国际性意义。

**关键词:** 云南; 民族团结经验; 示范区; 示范

**中图分类号:** D6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1)04-0064-05

2015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 明确要求云南要努力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这是党中央结合云南发展实际对云南提出的期望, 彰显了云南民族团结经验的价值。2020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云南考察, 对云南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2015年以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云南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举措, 全力推进示范区创建。在顶层设计上, 云南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意见》《云南省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规划(2016—2020年)》《云南省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规划(2021—2025年)》等政策文件, 颁布实施了《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并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在具体措施上, 云南明确提出到2035年将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目标, 列出了33项建设指标, 并对建设目标任务加以明确, 以确保示范区建设实体化、工程化、项目化。在示范区建设过程中, 云南积极探索, 形成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例如创新实施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 创新开展“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 在全国率先协调国有大型企业对口帮扶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脱贫发展, 率先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实施人口较少民族综合保险和学生助学补助等,<sup>①</sup>这些创新政策的实施, 一方面推进了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 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经过几年的全力推动, 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成效明显。截至目前, 全省9个州(市)、70个单位已经成功创建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云南经验研究”(13XMZ011)。

**作者简介:** 杨松禄,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副处长,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副主编, 副教授, 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政策、边疆治理等研究。

<sup>①</sup> 《云南省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2018年12月19日, [http://www.ynethnic.gov.cn/gzdt/gzdt/201812/t20181219\\_61228.html](http://www.ynethnic.gov.cn/gzdt/gzdt/201812/t20181219_61228.html), 2021年10月27日。

示范州（市）和示范单位。2021年11月底召开的云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创建行动，使16个州（市）、25个边境县（市）全部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市）、县。<sup>①</sup>民族团结进步全域创建，无疑是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的重要目标。党和国家明确提出要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这是对云南寄予的厚望，即希望云南通过示范区创建，先行先试，走出一条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新路子，为全国其他民族地区实现民族团结探索经验，做出示范。

现实的国家需要，迫切要求我们在理论上进行积极回应。近年来，总结云南民族团结经验成为理论界的热点话题。2011年，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以及《求是》杂志社联合到云南就民族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形成了《团结共谱同心曲 和谐花开彩云南——云南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经验与启示》<sup>②</sup>的理论文章，在国内掀起了民族工作的“云南热”。2013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云南省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课题组，用近一年的时间深入云南各地开展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形成了《民族团结云南经验》的调研成果。该成果形成1个总报告，即《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实践特色与基本经验》，并从“党的建设引领”“民族法制建设”“民族干部培养”“民族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民生保障”“民族文化建设”“民族团结教育”“民族理论创新”“民族工作创新”“民族关系和谐”“边疆繁荣稳定”等12个方面进行系统研究<sup>③</sup>，这是目前国内最权威、最厚重的总结云南民族团结经验的理论成果。另外，李若青、王延中、管彦波、郭家骥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云南民族团结的经验进行了总结。经验是总结了很多，也都很有道理，但这些经验是不是真正揭示云南民族团结规律的密钥，众说纷纭。不管这些经验是否科学合理，有一条还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经验总结出来后如果不能起到启示和示范作用是毫无意义的。

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普遍性和复杂性，不可能一劳永逸。云南目前的民族关系总体是团结和谐的，但现在团结和谐不代表以后会一直团结和谐下去，因为民族问题与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相互交织，引发矛盾的因素有所增加，我们处理好民族关系的困难就有所加大。<sup>④</sup>所以，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sup>⑤</sup>由于区位、历史、民族分布、发展状况等不同，各个民族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我们总结云南经验，肯定云南经验的价值，不是要求全国其他民族地区照搬和复制云南经验，而是希望他们要通过云南经验，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创造新的经验。正因为如此，包括云南在内，所有的民族地区都应该认真总结经验、用好经验、创造经验，妥善解决好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经验是死的，只有用起来它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如何用好云南经验，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把握。

### 一、云南维度：提升云南经验，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探索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云南民族关系基本上保持着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是云南独特的地缘、历史与现实互动的结果，也是云南民族工作创新实践的结

<sup>①</sup> 《王宁同志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全文发表》，2021年12月3日，<https://yn.yunnan.cn/system/2021/12/03/031800385.shtml>，2021年12月10日。

<sup>②</sup> 国家民委、中央统战部、《求是》杂志社联合调研组：《团结共谱同心曲 和谐花开彩云南——云南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经验与启示》，《求是》2011年第9期，第19—22页。

<sup>③</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调研组：《民族团结云南经验：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调研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sup>④</sup> 格桑顿珠：《抓住机遇开新局——访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格桑顿珠》，《今日民族》2006年第1期，第4—9页。

<sup>⑤</sup> 本书编写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果。云南民族团结的经验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甚至可以说，这些经验是在解决一个个问题中产生的。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是时代进步的主题，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必须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创新，才能续写云南经验，才能让民族团结之花永远绽放于云岭大地。正确认识主要矛盾既是谋划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矛盾的前提。当前，云南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是党和国家的庄严承诺，也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为了兑现这个庄严承诺、落实这个基本要求，国家应当更加注重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帮助民族地区繁荣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维护稳定，让少数民族群众通过共建共享示范区，获得更加充分的幸福感、满足感和获得感，切实构建起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人人参与、人人尽力和人人享有的共享发展格局。由于自然、历史、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云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起步晚，自我发展能力弱、发展差距大、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严重滞后、劳动力素质低、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如果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拉大趋势长期得不到根本扭转，就会造成心理失衡乃至民族关系、地区关系失衡。<sup>①</sup>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云南现象”将不复存在。因此，如何提升云南经验，保持云南现象，是每个云南民族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根本上而言，如今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良好局面的形成，是70多年来我国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生动呈现，所形成的经验既是云南的，也是中国的。因此，新形势下，面对我国民族关系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提升云南经验，为解决民族问题探索经验、作出示范，是云南民族工作的时代使命。要把云南民族工作统一于国家总体布局，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的实践中创新发展，借助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这个平台，深刻总结经验，科学提炼规律，创新工作方式，有效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难题，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事业探索经验、作出示范。要正确处理好民族团结与民族发展的关系，既坚持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各民族一起发展、一起过上好日子；要正确处理好跨越式发展与创新协调发展的关系，既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又要缩小民族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实现协调整体发展；要全面贯彻党和国家关于边疆治理的整体意志，坚持团结、发展、稳定的总体思路，既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边疆治理的领导，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治边方略，又坚持从边疆实际情况出发，创新边疆治理体制，推动边疆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边疆繁荣稳定；要正确处理好对内发展与对外辐射的关系，既注重把民族地区发展好，让边疆各族群众心向党、跟党走，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又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紧紧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难得机遇，充分发挥边疆民族地区开放前沿的作用，不断扩大对外辐射力、影响力；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开放与依法治理的关系，既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拓宽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又要加快推进民族地区法治化进程，发挥法治手段在调节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依法处理民族问题、管理宗教事务、化解风险矛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sup>②</sup>

<sup>①</sup> 参见李纪恒：《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2015年12月3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30/c\\_128581278.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30/c_128581278.htm)，2021年10月27日。

<sup>②</sup>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治国必先治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建设的实践经验》，《求是》2016年第18期，第14—16页。

## 二、全国其他民族地区维度：借鉴云南经验，促进本地区民族关系团结和谐

云南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缩影，全国民族地区所具有的特点在云南都可以找到。作为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并存的边疆省份，云南尽管面临错综复杂的环境和条件，却始终保持着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良好局面，所以说这种云南现象难得，云南经验可贵，这也是云南民族工作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原因。但是，全国各民族地区发展情况不一样、民族构成不一样，在坚持党的民族政策的大前提下，各民族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路子还是不完全一样的，可以说各有千秋。比如，与云南毗邻的广西，有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数居全国第1位，其中壮族人口1444.8万，占全区总人口的31.39%；虽然云南少数民族总人口仅占全省总人口的33.4%，构成却复杂得多，云南是全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人口数超过100万的少数民族有6个，超过10万不到100万的少数民族有9个，超过1万不到10万的少数民族有8个，超过6000不到1万的少数民族有2个，这就决定了云南“一族一策一山一策”的政策措施未必就适合广西。

云南是全国五大涉藏地区之一，其中迪庆藏族自治州常住人口38.75万人。迪庆藏族自治州以藏族等少数民族为主，多民族聚居，共有26个民族，其中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9.26%，有藏、傈僳、纳西、白、彝等千人以上的世居民族9个，藏族占总人口的36.18%。200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之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分别发生打、砸、抢暴力事件，严重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在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云南涉藏地区自始至终保持和谐稳定，这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云南涉藏地区治理的关注。在涉藏地区治理中，云南创新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积累了一些经验，最有特点的就是加强宗教事务的依法治理。2009年9月1日，云南施行了我国第一部藏传佛教管理方面的法规《迪庆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条例》；2010年，迪庆州正式颁布我国首部关于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的法规《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比如，成立寺院管理机构，实现了迪庆州管理机构进寺院、干部长期联系寺院，州、县、乡（镇）、村分级负责寺院管理、无缝覆盖的工作机制。建立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制度、活佛转世管理制度、僧侣入境管理制度、重大宗教活动管理制度、宗教场所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把寺院管理权牢牢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中。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建立健全寺庙民管会成员和代表人士生活补贴制度。规范宗教教职人员的备案管理，对藏传佛教寺庙僧侣依法进行登记备案，建立僧侣信息库。加强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工作的领导和指导，严防达赖集团插手云南涉藏地区活佛转世工作。事实证明，这些政策措施在云南是切实可行、卓有成效的。但是这些政策举措在其他涉藏地区却未必都是可行的。“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心理和实际情况，这就必然影响着治理方式的不同。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族际整合模式和民族工作方式，不必要求同一，只要适合本民族、本地区实际，只要能推动本民族、本地区发展，就是有益的政策措施。基于这样的认识，全国其他民族地区对于云南经验需要学习借鉴，但不能照搬，而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从云南经验中找到民族工作的规律，探索出符合本地区民族和本民族地区发展的路子，形成自己的经验，创造出自己的民族工作模式。

## 三、国家维度：吸收云南经验，构建中国民族工作话语体系

云南民族工作在全国独树一帜，受到普遍关注。2011年5月，国家民委、中央统战部、《求是》杂志社联合调研组到云南进行专题调研，对云南民族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云南民族工作经验十分丰富、弥足珍贵。云南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

探索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伟大实践的生动写照。<sup>①</sup> 习近平同志对云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进步高度重视,十分关心,他在2008年11月深入云南民族地区调研时就指出,做好民族工作,关键是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要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推动实现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2011年7月和9月,习近平同志分别对云南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作出重要批示。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云南是全国民族工作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云南民族关系亲密融洽,云南民族工作成绩突出,这是云南最可宝贵的财富;明确要求云南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sup>②</sup> 可见,云南民族工作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肯定和重视,云南经验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工作的宝贵财富。

从国家的层面而言,应如何用好云南经验呢?云南经验虽然是在云南形成,但这是云南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理论政策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正确性。另外,由于云南地处边疆,云南经验还在传达着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理念,展现着中国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优势,展示着中化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内涵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多元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云南经验还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因此,国家应加强顶层设计,一方面要把云南经验中具有普遍性、示范性的政策和措施上升为民族工作的理论和制度,使地方性民族政策法规转变为全国性的民族政策法规,以便更好地指导全国的民族工作;另一方面,要在揭示云南民族工作规律,阐释云南经验理论机理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处理民族问题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建构一套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国情而且在实践中内涵不断丰富的科学话语体系。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很重要,单靠云南或者某一个部门很难完成,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推动。

#### 四、结 语

事实上,就云南而言,边疆多民族地区一直被视为制约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因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云南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是表现得非常突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云南还能保持各民族的团结和谐,这就是不少人对云南民族工作感兴趣、对云南经验痴迷的原因。云南经验固然弥足珍贵,但总结云南经验不是目的,而是希望这样的经验能够用起来,起到启示和示范作用。当然,前面说过,云南经验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云南还将继续创造新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云南已经成为中国民族工作成功的一个样板,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这意味着,在很多人眼里,云南民族工作的成功代表着中国民族工作的成功,云南民族工作的失败代表着中国民族工作的失败。当然,这样理解是不全面、不客观的。云南民族工作的成功是云南特殊的地缘、历史和现实互动的结果,是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在云南实践的一个缩影。可以说,云南民族工作的成功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但特殊性是不可复制的。因此,云南民族工作成功的经验可以提供启示性意义和示范性路径,但不能提供可复制的模板。另外,由于云南的特殊性,导致云南民族工作中有很多不确定性,这给云南民族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即一旦出现一点点失误,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者无限放大,演变成灾难性后果。这样的后果云南承担不起。经验属于历史,前路仍需探索。值得庆幸的是,有了这些经验,云南民族工作的未来道路可以走得更稳,也必会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探索出更多有价值的经验。

责任编辑:李亚强

<sup>①</sup> 国家民委、中央统战部、《求是》杂志社联合调研组:《团结共谱同心曲 和谐花开彩云南——云南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经验与启示》,《求是》2011年第9期,第19—22页。

<sup>②</sup> 何春中:《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示范区》,《中国青年报》2015年4月10日,第7版。

# 云南各民族共同性的历史形成与强化路径

叶莹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 民族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本前提。云南各民族有友好交往、团结发展的历史传统, 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 共同性不断增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云南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交往交流交融, 共同性持续得到强化, 有效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成主要体现出历史共通、文化共融、辉煌共创、权利共享的特征。新时代云南民族工作, 要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纲”, 坚持党的领导, 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 不断增进共同性, 减少差异性, 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云南各民族; 共同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 历史形成; 强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1) 04-0069-09

云南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 拥有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 有26个民族, 其中15个少数民族为云南特有。云南少数民族交错分布, 表现为大杂居与小聚居。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云南的民族发展日新月异, 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确立起来并不断得到巩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云南各民族在保持和发展自身特色的同时, 共同性也在逐步增强。云南各民族共同性的不断增强, 使得云南各民族结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形成了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云南现象。

## 一、共同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本前提

1950年, 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中强调了中华各个民族共同开发了中国疆域, 中华各族的劳动者都是中国的创造者, 当然是中国历史真正的主人翁。<sup>①</sup>1954年, 范文澜发表了《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 回答了汉民族的形成问题: 自秦汉起, 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sup>②</sup>这两篇文章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还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这篇文章从历史学的角度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特征, 对新中国民族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今天深入分析“民族”及其相关问题以及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sup>③</sup>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边疆治理中的文化认同教育研究”(YB2020013)。

**作者简介:** 叶莹,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助教,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政策。

① 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1950年第1期,第45—47页。

② 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第15页。

③ 麻国庆:《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与“合之又合”的中华民族共同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14页。

费孝通的民族研究与范文澜历史学的研究路径不谋而合。费孝通指出：“过去大汉族主义把共同创造祖国的兄弟民族排斥在同胞之外，加以歧视和侮辱，是完全错误的。凡是犯这个错误的就应当负责的。”<sup>①</sup> 费孝通民族研究的一大学术特点就是强调在民族差异性基础上的各民族共同性的历史进程和多民族社会共同繁荣的发展观。他在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时，号召多学科共同配合，从各种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民族志等材料中，分析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的分中有合的过程，进而凸显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地方或少数民族自治化的过程。“合”则是民族大交融，“合”的基础是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sup>②</sup> “合”之后是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具有高度的共同性。当然，这种共同性中包含着多元性。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这种“分”与“合”相互作用、互动共生的过程史，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分”与“合”并非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动共生对转的关系，因而“分”与“合”的关系更体现为一种“合之又合”的关系，这种关系必然“磨合”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sup>③</sup> 各民族在“分”“合”过程逐渐整合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1989年，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开拓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研究的新局面，标志着费孝通以及中国学界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创立。费孝通用中华民族这个词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所有人民。

关于民族共同性的定义，见于谷苞在新疆调研期间发表的《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文，他认为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同时又有着许多民族所共有的共同点，即中华民族的共同性。<sup>④</sup> 谷苞引用1984年费孝通《在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两段话<sup>⑤</sup>来说明中华民族现存共同点，他认为历史上早就存在的移民与民族融合是造成中华民族现存共同点的主要原因。谷苞在研究多民族历史与丝绸之路时，关注到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据此论述道：在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为我国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sup>⑥</sup> 尽管在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存有差异性、出现过冲突和战争，但是民族关系的主线还是交往交流交融。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一种常态。谷苞指出历史上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之中；二是有大量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之中；三是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sup>⑦</sup> 在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必然会发生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就是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谷苞看到了各民族间的共同性，认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前提，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

李建宗在对谷苞关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论进行论述时指出：在20世纪末叶甚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谷苞的民族学研究范式与当时学界的主流有所不同，因此，关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

① 费孝通：《兄弟民族在贵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第21页。

②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80页。

③ 麻国庆：《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与“合之又合”的中华民族共同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16页。

④ 谷苞：《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第1页。

⑤ 一段是“我们不要把民族看死了，在中国这样长的历史，民族变化多端，你变成我，我变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且有些合而未化，还保留了许多原来的东西”；另一段是“所以我们要站的高一点，要看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变化。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整体又是许多相互不能分离的民族组成，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密切，有分有合、有分而未断，合而未化，情况复杂，这个变化过程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民族历史”。参见费孝通：《在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民族研究动态》1984年第2期。

⑥ 谷苞：《论充分重视和正确解决历史研究中的民族问题》，《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第44页。

⑦ 谷苞：《在我国历史上有为数众多的汉人融合于少数民族》，《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第29页。



融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的论述和研究,在民族学界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然而,在当下的民族学研究中,谷苞世纪之交(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期)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谷苞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理论对于新时代的民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资源与实践策略。<sup>①</sup>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族共同性即各民族之间相通相似之处,其表现在各民族具体的文化生活之中。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民族共同性的生成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也进一步加强了其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本前提,亦是其发展的基础。

## 二、云南各民族共同性的历史形成和主要特征

民族共同性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各民族的共同性彰显民族关系和谐,共同的奋斗目标促进了各民族共同性的认同。云南各民族的共同性是一个不断增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民族共同体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 (一) 云南各民族共同性的历史形成

云南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地,历代均有大量的汉族移入。首先见于记载的是战国末期楚国的庄蹻带领数千楚人迁到滇池附近定居。秦汉至元朝时期,迁入云南的汉族移民数量相对有限,大部分融合到了云南少数民族之中。尽管如此,他们带来的汉族文化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云南各民族。据史籍记载,至唐代,在南诏国统治下的云南已是“人知礼乐、本唐风化”;<sup>②</sup>元代,郭松年在考察云南民情后也称其俗“略本于汉”。<sup>③</sup>明清时期,汉族移民继续迁入云南,使得云南汉族人口的数量持续增长,现在云南的汉族多为明清以后迁入。<sup>④</sup>各民族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云南古代有许多关于民族团结的史料记载。如云南省曲靖市建设路第一中学后花园内存有一通《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记载着大理国时期民族团结的史事。

各民族间在交往中做到求同存异,建立关系并共同发展。明代以后,连接云南、四川、西藏的茶马古道逐渐兴盛起来,产生于茶马古道上的民族贸易将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大理、德宏、丽江、迪庆等地的各民族有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各民族之间通过茶叶产出、加工、运输、消费纽带的长距离利益共生链,将以往局限于山坝地域中的小区域族际共生关系扩展成为大区域格局内的共生关系,对于加深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彼此认识和认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促进长距离、大范围各民族共生关系建构发展的重要纽带。<sup>⑤</sup>

云南各民族在历史上团结奋战,共同发展。近代以来,中国受到外来势力的威胁,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不断激化,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遭到英法殖民者的入侵。在边疆面临危机之时,云南地区的民族团结意识空前高涨并上升为爱国意识,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御侵略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这过程中不断得到增强。据张公瑾对《大勐笼傣文九曜碑》的考证,此碑纪念的是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哈尼族、基诺族、汉族等联合打败缅甸木梳王朝侵略的事迹。<sup>⑥</sup>

① 李建宗:《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谷苞先生的民族学思想内核》,《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第69页。

②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卷222上(南诏上)》,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第6273页。

③ 郭松年:《大理行记校注》,王叔武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0页。

④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2页。

⑤ 周智生、李伟:《地缘经济联系与西部民族地区跨区域互动发展——以滇藏川交接区域为例》,《求索》2005年第12期,第17—19页。

⑥ 张公瑾:《傣族文化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73页。

碑文见证了当地各族人民团结反抗外来侵略的事迹，是民族团结重要的历史文物。1891—1911年，片马地区的傈僳族、景颇族、白族、汉族、彝族、怒族、独龙族等各族人民联合抗英，与英军进行了多次搏斗，给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抗日战争时期，滇西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在物资及技术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内修筑了一条中国对外交通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滇缅公路的修筑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提高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这些史实反映了云南各族人民团结御敌，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是中华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云南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李维汉指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进入过渡时期的时候起，各民族就开始从各自的水平，先经过民主改革，然后又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向社会主义民族过渡。”<sup>①</sup> 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省委、省政府根据1949年9月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规定，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切实认真地普遍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方针，在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基础上，决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sup>②</sup> 1954年6月，中共云南省委下文实行“直过”政策<sup>③</sup>，云南的景颇、独龙、怒、傈僳、德昂（原称崩龙）、佤、布朗、基诺等民族通过办合作社发展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不仅消灭了民族间的对抗，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和对立，而且进一步增加了民族间的共同性，巩固了民族大家庭的团结。

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云南的少数民族由多元发展逐步转变为统一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揭示了各民族发展上的共同性。正如李维汉所言，“这些共同点，标志着我国最大多数的民族已经开始成为社会主义民族，我国的民族关系已经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中华各民族的大家庭已经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民族大家庭”<sup>④</sup>。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理论与制度上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开启了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新篇章。

## （二）云南各民族共同性的主要特征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云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共同性不断增强，体现出历史共通、文化共融、辉煌共创、权利共享的特征。

### 1. 历史共通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白寿彝先生强调了多源共创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sup>⑤</sup> 各民族之间一直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和交流，各民族共同书写了中国的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彝族创世史诗《查姆》、纳西族创世史诗《崇搬图》、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都认为各民族同祖先，是同胞兄弟。云南少数民族基本上源于氐羌、百越、苗瑶及百濮四个族源，共同族源和历史造就了基本一致的集体记忆，同源的民族在生活环境和文化认同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联系。例如，藏族、纳西族是同源异流的民族

①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0页。

② 李涛：《建国前后的云南社会》，云南省档案馆。

③ “直过”政策，指的是不经过民主改革运动，使少数民族跨越几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策。实行“直接过渡”的少数民族地区，习惯上被称为“直过区”。实行“直接过渡”的少数民族被称为“直过民族”。

④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3页。

⑤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页。

关系，二者在生活地域和文化认同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联系。云南各民族中共有的神话，也是长期以来多民族交流互动的结果，也是其共同性的表现。

## 2. 文化共融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生成的基础与机制<sup>①</sup>。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频繁交往，使得民族文化边界日益模糊，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共同性不断得到彰显和增强。云南各民族的共同性，在文化活动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且丰富。各民族文化受现代化科技的影响，借助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得以快速传播，并在各民族间广泛流传，使得文化的共享性趋势愈加明显。

在云南整个民族共同体内部，我们发现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共享文化。一是民族节日逐渐成为全民性节日。虽然不同人群之间有一定空间距离，但民族节日使各族人民打破空间界限，相同的文化将人们关联在一起。云南有极具代表性的民族节日，如傣族泼水节、傈僳族刀杆节、白族三月街、彝族火把节、景颇族目瑙纵歌节等。这些节日成为一个地区人群的全体节日，节日当天，该区域的民众无论是什么民族，都会齐聚一堂共享欢愉。在民族节日活动中，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以“演”交流，以“节”促“融”。二是茶文化与各民族生计相结合。改革开放之后，各民族的茶文化借助市场得以迅速发展，各类茶商品伴着民族文化入驻市场，一方面使得民族经济得以发展，另一方面促进各民族的茶文化的发展。如白族的“三道茶”、傣族的“竹筒茶”、哈尼族的“土锅茶”、拉祜族的“烤茶”、纳西族的“龙虎斗茶”、藏族的“酥油茶”等。三是民族菜品被广泛接受。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彝族菜、白族菜、佤族菜、傣味等民族菜在城市中随处可见。民族特色菜被各民族广泛食用，成为人们日常饮食一部分。四是民族元素成为时尚潮流。人们审美的包容性越来越大，使得服饰发展呈现多元化。各少数民族服装借市场之力迅速发展，民族服饰得以创新，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添加新的时代元素，包含民族元素的文创产品备受广大群众青睐，在大众中普遍流传。五是民族文艺活动成为大众活动。长期的各民族聚居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促进了少数民族集体舞蹈的发展，各民族音乐和舞蹈得到广泛传播，得以创新发展。云南省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流行广场舞式的集体舞蹈，一般由男子吹弹乐器在前引导，女子列队环舞于外围。例如，国家级“非遗”乐作舞是哈尼族和彝族共有的古老民间舞蹈，现已成为红河州的节日舞蹈、旅游民族符号之一。

## 3. 辉煌共创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域，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培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了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各民族相继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步入社会主义社会，不论快慢和多少，各民族在物质和精神领域都发生着变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云南经历了最为深刻且广泛的社会变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普遍共识。

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住在山区的民族走出大山，走向坝区和内地，改变生计方式，做商人、教师、建筑工人、艺术工作者等。自2015年起，云南先后实施两轮“兴边富民工程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保护和建设工程，使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成为民族文化的品牌、特色旅游的名片和展示美丽云南的窗口。民族村寨的建设，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当地民族群众的生计选择多元化，例如与旅游业相配备的基础设施建设、民宿、饮食、民族文化手工产品制造、民族音乐舞蹈表演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

<sup>①</sup> 李建宗：《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谷苞先生的民族学思想内核》，《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第63页。

大量的当地民族群众参与到国家的发展建设当中,云南各民族的双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边境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普遍形成和发展,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 4. 权利共享

新中国成立以后,贯彻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原则,保证所有民族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和各级地方事务,各民族公民享有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云南民族自治地方,每一个州、县的党委、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及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干部皆从区域内各民族中产生。如云南省最早成立的峨山彝族自治县,1951年6月定名为“峨山彝族自治州”,1956年更名为“峨山彝族自治县”。彝族占该县总人口的50%以上,同时还有哈尼族和回族,在1956年更名为自治县时,民主选举产生了自治机关——政府委员会。政府委员中有彝族、哈尼族、回族,正、副县长中有彝族2人、哈尼族1人,真正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体现了各民族政治权利上的统一平等及合理搭配。云南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多民族成分共存的基础上实行统一的平等的多民族共同自我管理的行政制度。<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认为,各民族都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对人类历史的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其大小、先进与落后,都应当处于平等的地位,各民族在一切权利上是完全平等的,反对任何民族享有任何特权。<sup>②</sup> 政治的平等保障了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新中国成立之后,云南各族人民一同迈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康庄大道,各民族在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sup>③</sup> 步入新时代,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领导民族工作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

### 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增进各民族共同性的具体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sup>④</sup>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共同性是最关键的要素,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核心与实践精髓。<sup>⑤</sup> 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就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增进各民族共同性,“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 (一) 正确认识民族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加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过去有人认为,民族的共同性会造成不同民族的特性消失,不利于社会化发展和民族化进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共同性是人类各民族的本质属性,差别性是各民族的形式属性,差别性

① 方舟:《论云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行政特征》,《思想战线》1999年第4期,第22页。

② 贾平安:《统战学辞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③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⑤ 李建宗:《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谷苞先生的民族学思想内核》,《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第69页。

必然以共同性为前提,民族的平等性是建立在共同性的基础之上的。<sup>①</sup>正确认识民族间的共同性,发展其共同性,反而更加有利于各民族独特性的发挥。共同性并不等于少数民族汉化,云南各民族不仅存在着“汉化”现象,同时也存在着“化汉”现象。在文化上,汉文化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云南以汉文化为中心,吸收了各民族的文化,与各民族文化有着共同的成分;同时,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着汉族的思想观念,汉族与云南少数民族在文化上形成了相互依存和互补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造就了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分不开的血肉联系,推动了云南民族关系的发展。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各民族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是民族全面充分发展的时期。如同其他地区的民族一样,云南各民族仍然存在着民族特点,民族间存在着差异性。因此,李维汉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就是“社会主义共性和各民族个性生动地结合起来的统一体”<sup>②</sup>。民族的发展需要扩大交往交流,正如马克思所言:“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sup>③</sup>在当下,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内容,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实践路径。我们必须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考虑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制定民族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各民族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既强调共同道路、共同发展繁荣,又强调从各民族的特点和实际出发,这样才有利于各民族的平等、团结,才能实现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要始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不断增强各民族的情感联系、文化共性、心灵共鸣,巩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良好局面。

## (二) 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

“十四五”时期是云南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把握好重要战略机遇,发挥云南资源优势,探索发展民族经济的新路子,推进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从总体上看,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基础设施较落后,限制了各民族的交流交往。因此,政府应当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各民族交流交往提供物质条件,构建并发展云南各民族的共同性。

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城市和乡村双向流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跨区域流动的趋势愈来愈明显,现阶段我国已进入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民族人口大规模向内地流动已成为趋势。在马戎看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可以利用自身民族文化优势“嵌入”到当地基层社区,从而为自身拓展出发展空间。<sup>④</sup>面对少数民族群众跨区域流动越发活跃的趋势,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sup>⑤</sup>,城市要敞开怀抱欢迎少数民族群众来就业生活,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要充分发挥云南各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地方特色经济,为构建嵌入式社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支撑保障。以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平衡民族地区心理失衡和地区关系失衡,实现各民族利益共享,促进各民族

① 贾应生:《民族共同性和融合性:解决民族问题的哲学基点》,《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第130页。

②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④ 马戎:《中国人口跨区域流动及其对族际交往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6期,第11页。

⑤ 新华网:《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社会结构》,2014年5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26/c\\_1110866377.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26/c_1110866377.htm),2021年11月19日。

间的理解和交往,为进一步交流和交融架起桥梁。

### (三) 加强民族民主法治建设,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云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在国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作为多民族省份的云南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因为任何一项区域发展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而适时作出改变。云南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进实施和不断完善,一方面解决了边疆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失衡发展,另一方面则使各民族树立牢固的“公民意识”,让各民族增强“五个认同”,从思想和行动上增强各民族大团结。

推进民族地区治理体系的民主法治建设。协调和化解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民间法之间的冲突,实现国家法和民族法的协调和统一。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坚持用法律规范和保障民族关系,打牢民族团结进步的法治基础,用法治手段保障和巩固民族团结。加强边境地区法治教育,依法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边境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民族文化。积极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环境,促使“公有理婆有理,法治才是大道理”成为边境各族群众的共识。

不断提高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民族地区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与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相协调,以全面提升民族地区的整体文明水平,促进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快速发展。保障和落实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自治权,进一步修改和补充民族地区自治权和自主权具体实施细则,使自治权内容更加细化并切实可行,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政府要进一步增强社会团体的组织能力、培养民众的参与能力,唤醒民众的主体参与意识,激发少数民族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四) 推进先进文明建设,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政府要努力推进民族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教育事关民生,通过发展民族教育,可以提高民族地区劳动者的素质,促进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就业,改善一个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从而在源头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sup>①</sup>要加大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力度,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民族文化强省建设,搞好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扶贫先扶志,扶智先通语”。坚持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促进各民族语言互通、心灵相通。

实现文化认同,共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民族政策的有力保障下,云南文化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民族村寨实行双语广播,开展滚动政策宣传,提升村民政治意识,提高各族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和法治素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充分发展和繁荣各民族

<sup>①</sup> 郭晓娜:《教育阻隔代际贫困传递的价值和机制研究——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6页。

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和形象，常态化、长效化抓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大力实施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工程，编写一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读本和教材，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激发群众的爱党爱国热情，增进共同体意识，让中华文化成为云南各民族的情感纽带、心灵归属。

#### （五）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少数民族干部履职的共同性

坚持党对民族地区的全面领导。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不断健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是新中国70年民族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团结群众、争取人心作为民族地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持“各民族最高利益”至上，提高反渗透反颠覆反分裂的本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各民族的共同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在各民族中形成巨大的亲和力和向心力，民族的共同性进一步得到增强。

加强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大力培养和选用政治过硬、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全面加强民族地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快建设一支对党忠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坚强保障。少数民族干部要深刻认识自身肩负的政治责任，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好干部。党政干部、国家公职人员要认识到需要治理的是一个地区的社会，不是一个民族的社会，要代表社会大众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哪个民族的利益。<sup>①</sup>广大少数民族干部要端正思想，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做具有高度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好干部。民族干部要淡化其民族性，强化履职共同性，为区域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谋发展，搞建设。

云南将坚定地践行“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的思想，不断探索民族工作的“云南经验”；更加牢固地树立“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信念，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铸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使“五个认同”“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巩固和发展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更加坚决地兑现“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决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的承诺，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创建工作，以发展民族共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顺应新时代，我们开展民族工作要聚焦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纲”，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不断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进一步促进民族融合发展，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

责任编辑：杨松禄

<sup>①</sup> 沈桂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以民族理论和政策话语重构为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65—66页。



## 法治建设

# 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反腐法治理论的三重逻辑

戴晓静<sup>1</sup>，张茂杰<sup>2</sup>

(1.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00；

2. 石家庄铁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内涵丰富、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其中反腐法治理论是重要方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反腐法治理论可以基于理论、内涵与实践三重逻辑展开：就理论逻辑而言，反腐法治理论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廉政思想为指南、以中国廉政历史文化为基础、以中共历届领导人的反腐倡廉思想为镜鉴，构成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反腐法治理论的理论基础；就内涵逻辑而言，包括反腐法治立场、反腐法治原则、反腐法治抓手、反腐制度建构、反腐法治方略和反腐法治目标六个方面，构成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反腐法治理论的价值内涵；就实践逻辑而言，包括改革创新制度、完善立法规定、协调刑罚设置、推动人才建设、加强国际合作和提升技术水平，构成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反腐法治理论的实践指向。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反腐法治理论；三重逻辑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1)04-0078-10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内容十分丰富，逻辑十分严谨的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就如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外交、国防和党的建设等各个层面、各个角度的落地实施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反腐理论是重要内容。廉政是自古以来人类政治生活不断追寻的崇高目标，立足于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廉政建设就是要保障党和国家的政治安全，跳出兴衰成败的历史周期律。历史上灭亡的封建王朝告诉我们，治国必先治权，治权必先治贪，反腐败斗争永远只有进行时而无完成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立足实践，未雨绸缪，立足于我国目前的反腐实践，围绕反腐倡廉法治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sup>①</sup>“强调要善于运用

**基金项目：**“石家庄铁道大学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YC20210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戴晓静，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学与犯罪学研究；张茂杰，石家庄铁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sup>①</sup>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2版。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国家反腐败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sup>①</sup> 提出了众多具有深远见识与创新精神的新路径、新思想、新方略，深刻回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指出法治反腐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根本路径，深化了我党和人民关于国家反腐倡廉法治方针与政策的认识，丰富了我国反腐倡廉法治建设的理论表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及刑事司法实践的根本遵循。

##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反腐法治理论的理论逻辑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廉政思想为其提供理论指南

早在19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创建和推进无产阶级解学说、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廉政建设的重要性。首先，马克思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剥削，而剥削总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伴随。在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展致富的背景下，“得到最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的盗窃”。<sup>②</sup> 其次，恩格斯主张建立民主政治以防止腐败。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不平等，认为“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sup>③</sup> 腐败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腐败是政治上的变质，反对腐败，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廉洁民主政治。最后，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腐朽的本质。“庞大的中央国家机构在城市里有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议员、凶暴的济贫法委员会委员为其补充，在乡村里有实际上是世袭的治安法官为其补充。”<sup>④</sup> 由此，马克思认为缩减机构，提高效率，建立廉价政府是防止腐败的重要途径。这些思想立足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度，提出了建立具有廉政内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宏伟目标。但与此同时，事物总是处于发展变化进程中的，矛盾的特殊性也普遍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我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要放宽视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sup>⑤</sup> 立足新时代，解决新矛盾，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反腐法治理论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扬人民民主，同时因时因地制宜，探索出了更具中国特色的法治反腐道路。

### （二）中国廉政历史为其提供文化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sup>⑥</sup> 一方面，廉政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民本思想。体察民意，顺应民情是民本思想的内核。二是修身思想。孔子曰“政者，正也”。严于律己，正人先正己的道德准则，敬

<sup>①</sup> 习近平：《依纪依法严惩腐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2013年1月22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5—136页。

<sup>②</sup>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页。

<sup>③</sup> 恩格斯：《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三封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48页。

<sup>④</sup>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62页。

<sup>⑤</sup>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sup>⑥</sup> 《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 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人民日报》2013年4月21日，第1版。

节死制的行为原则,将节气贯穿始终。三是简朴戒贪思想。墨子认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老子主张“少私寡欲”。古人认为勤俭节约、减少私欲是防止奢侈浪费,进而遏制腐败的重要途径。四是法治思想。法家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主张依法治贪、依法管吏,通过严刑峻法惩治贪贿官员,加强对官吏的监督,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官吏应带头守法。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为当今反腐倡廉法治建设提供了制度借鉴。例如防止皇帝失误的朝议制度、抑制官吏徇私勾结的回避制度,弹劾官吏徇私舞弊的监察制度、御史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存在极大程度上约束着官吏的行为,对我们推进反腐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借古警今,告诫全党“以利交者,利穷则散”的道理,在批判地吸收与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关反腐倡廉思想和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期反腐倡廉的指导思想,这是具有深刻文化自信的体现。

### (三) 中共历届领导人的反腐倡廉思想为其提供历史经验

我国反腐倡廉思想和制度建设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这个道理我们党早就明确提出来了。”<sup>①</sup>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形成了适应我国反腐倡廉历史发展规律与现实背景的制度和思想体系,具有广泛群众基础、鲜明的中国特色,深刻反映我国具体实践,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毛泽东认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sup>②</sup>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在改革开放整个过程都要反腐。”<sup>③</sup>江泽民同志提出:“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sup>④</sup>胡锦涛同志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sup>⑤</sup>从党和国家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可以看出,我们党始终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重视健全反腐败的机制体制与民主制度,完善监督制度预防腐败,严惩贪贿官吏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彰显了我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

##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反腐法治理论的内涵逻辑

### (一) 反腐法治立场——坚持党全面领导反腐败斗争,坚持人民的中心地位

不管反腐败形势多么复杂,反腐败任务如何繁重,都要运用法治思维与法律制度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维护廉洁性,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sup>⑥</sup>“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

① 习近平:《在“第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页。

② 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页。

③ 邓小平:《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7页。

④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⑤ 胡锦涛:《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人民监察》2007年第13期。

⑥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学习》2015年第2期,第5页。

是一致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sup>①</sup>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巩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对惩治贪腐行为的根本期待。<sup>②</sup>贪腐行为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直接冲突，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拦路虎”和“绊脚石”，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就是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贪腐行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巩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立场和一体推进反贪腐斗争的坚定方向是赋予人民权利、推动民主监督，发挥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有效保障。

### （二）反腐法治原则——“老虎”“苍蝇”一起打

正风反腐，涓流莫轻。“老虎”“苍蝇”“大腐败”“微腐败”，都应坚决纠正。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无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的意志为指引，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确立“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原则。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案件，敢于一打到底，绝不姑息；又努力预防和惩处发生在广大人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把握“老虎”和“苍蝇”辩证关系，通过推行中央八项规定，惩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送礼等具体问题，以小切口撬动治党管党的大格局。提出了抓作风建设的方法论问题，推动要“抓常、抓细、抓长”。抓常，就是要抓经常、抓常态；抓细就是深入抓、见实招；抓长就是抓持久、抓长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下最大气力解决腐败问题。”<sup>③</sup>通过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违法乱纪行为，坚决查处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绝不懈怠、努力进取，做到老问题毫不复燃、新问题从不萌发、小问题永不坐大。健全对一把手的监督，完善职业回避、离任审计等监察检查制度，破解了长期存在的“人线”“身份线”的选择性执法困境。“老虎”与“苍蝇”都是党和国家的蛀虫，揭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利于维护宪法与法律的权威。

### （三）反腐法治抓手——依法依宪治国，依法依宪治党

“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工具。”<sup>④</sup>全面依法治国，推动反腐败斗争法治化是历史和时代的呼唤。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法治反腐工作，指出：“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sup>⑤</sup>发挥依宪依法治国与依宪依规治党的协调作用，坚持一体建设，协调统筹推进。被查处的贪污腐败犯罪分子，都始于对国法党纪的践踏与忤逆。每个政党机构、各个党员分子，必须服从宪法与法律，不得以言论代法律、以权力压制法律、徇私情枉国法，不得违背大政方针，搞“独立王国”、自行其是；在党纪国法从无例外，要守住底线、坚守红线，从严治党，严明党纪，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徇私枉法；任何人都不得将权力当做私器谋取私利、满足私欲。通过建立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动法治政

<sup>①</sup> 习近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2014年1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sup>②</sup> 习近平：《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中国纪检监察》2020年第2期，第4—6页。

<sup>③</sup>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第2版。

<sup>④</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全面依法治国，开启中国法治新时代——学习〈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人民日报》2015年5月5日，第6版。

<sup>⑤</sup>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0页。

府建设、提高法治工作队伍与领导干部的法治修养与立场定力。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推动反腐倡廉运动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自我批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能力,从根本上保证反贪腐斗争取得伟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为我国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根本抓手。通过充分贯彻落实法治精神、坚守法治底线、落实法治方案,健全反贪腐法治体系,切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体准确、程序正当,为我国反贪腐斗争保驾护航。

#### (四) 反腐制度建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sup>①</sup>“要狠抓制度执行,扎牢制度篱笆,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sup>②</sup>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依靠制度预防和治理腐败行为的极端必要性,要把笼子扎紧一些,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权大还是法大”从来都不是一个伪问题,领导干部必须明确权力边界划在哪里,权力来源于何处。通过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而非通过内在的精神理念、道德修养来规范权力的运行,努力促使权力的运行机制结构更加合理、程序更加正当、权责更加明确,从而破除滋生贪腐行为的体制机制因素。制度的篱笆要筑牢,制度的执行应雷厉风行,制度的笼子应规范一切权力行为。为了防止权力沦为贪腐犯罪的工具,必须依靠法律制度来定性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和监督权力,树立“依法治权、从严管权”的理念,适用法治理念构建防腐治腐的藩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行政机关的工作应当在法治轨道上落实,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sup>③</sup>党员干部要将依法办事作为根本的行为指南,避免走错路、办错事,不为关系所困、不为人情所累、不为利益所侵,身怀正义、恪守规范、保持理性。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构筑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将干部权力、政府权力、党的权力划入监督的范围,避免权力寻租,以权谋私;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刑事司法制度与党内法规制度,构筑严密的刑事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形成刑罚与党内惩治的双效机制,加大贪腐犯罪的惩治强度,构筑反腐法律制度的双重保障,防止权力腐败任性。

#### (五) 反腐法治方略——统筹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把制度篱笆扎起来。放权不是放任,制度要落实,不能是‘样子货’。”<sup>④</sup>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略,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内容。<sup>⑤</sup>“三不”反腐机制的核心就是从思想、行为与后果三个维度建立健全腐败制约制度,“不敢腐”的途径是法律威慑,“不能

① 习近平:《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

② 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7日),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7页。

③ 《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二〇二〇—二〇二五年)》,《人民日报》2020年12月8日,第1版。

④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二〇一四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6月26日),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0页。

⑤ 孙新阳:《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稳中求进基本工作方针系列谈之五》,《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7月26日,第6版。

腐”的路径在于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体制机制，“不想腐”是目标导向。“三不”的内涵包括了党风廉政建设、党纪行政纪律监督以及违纪处置和司法惩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加快构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就是坚持防治结合、以惩促防，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惩治的威慑力与制度的预防力、政策的影响力、文化的号召力综合起来，共同推进、一体发力。“牛栏关猫式”“稻草人式”“纸上谈兵式”的制度笼子是不通的，也是徒劳的。<sup>①</sup> 法规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党内法规制度的构建、规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的制度构建都需要秉持干事有效、于法周延的原则，加快形成覆盖四方，有效管用的法治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 （六）反腐法治目标——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领导干部无论官有多大、贡献多大，都要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办事，遵守法律法规无特权，执行法律制度无例外。法治即为法律之治，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进路中，通过构建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法律程序，将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结合起来，跨越“实然”与“应然”，实现良法善治。“良法善治”蕴含着“以公正为生命线”的法治精神，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将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贯彻始终。我们党始终坚定不移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伸张正义，维护公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sup>②</sup> 腐败行为是党、国家的公害，贪腐犯罪分子丧失了为党为民的廉洁精神，玩弄权力，以权寻租，丝毫不顾及自身的使命与担当，为满足自身私欲，侵占原本属于人民的利益。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sup>③</sup>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就是要毫不动摇打击贪污贿赂行为，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反腐倡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使得人民群众在每一项反腐法治制度、每一个反腐法律决定、每一宗反腐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反腐法治理论的实践逻辑

#### （一）改革创新制度：推进监察体制改革，落实司法责任制

党的十九大之前，对公权力行使的监督权分散在检察院反贪部门、行政机关监察部门等机构。监察权分散，具有多头管理、职权不清、相互牵扯的局限性，使得反腐败斗争难以一体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靠制度更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sup>④</sup> “旗帜鲜明反对腐败是政法战线必须打好的攻坚战。”<sup>⑤</sup> 在总结了之前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积极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在统筹整合了反腐败资源与力量的基础上，成立了专门的监察机关即监察委员会，制订了专门的监察法律即《监察法》，构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监察体系。就其本质而言，监察委员会就是国家反腐败机构，《监察法》就是国家层面的反腐败立法，

① 吴建雄、夏彩亮：《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反腐败科学要义》，《法学杂志》2021年第6期，第41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29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④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4月19日），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4页。

⑤ 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5页。

是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框架,确立了全面覆盖国家机关与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司法体制改革之前,我国司法制度设计及其运行存在一些不足,制度上的漏洞导致司法工作人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司法工作人员要明白100减1等于0的问题,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冤假错案的出现无不暴露出我国司法制度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着权利救济、定分止争、制约公权功能的发挥,而且很大程度上阻挠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在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过程中,要着重落实让判者审、让审者判,破除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体制漏洞,通过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最大程度上防止司法权的行使受到不当干预。推动落实法官的终身责任制度,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司法良知。将“上岸、着陆”不等于没有责任、没有风险的意识观念植入到司法人员的潜意识当中,使其遵守权责统一、权力制约、尊重程序、公开公正的司法制度运行规律,在具体的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要善于牵“牛鼻子”,即“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推动阳光司法、司法公开,落实和完善裁判文书公开、庭审公开制度、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 (二) 完善立法规定:严密贪贿犯罪法网,回应网络反腐倡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sup>①</sup>作为反腐败预防与惩治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刑事法治是最为严厉的手段。基于个别贪贿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给党和国家的损害极为严重,党的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重拳治腐”等一系列反腐举动已然让世人所称道,重典治吏已经成为了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刑法修正案(九)》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落实反腐倡廉法律政策,形成了贪污贿赂犯罪两类共21个罪名的最为严密的罪名设置,扩张了受贿罪的惩处范围,对受贿罪设置了“数额+情节”的法定刑立法模式,结合司法解释对于受贿数额采取“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层级模式与八种具体量刑情节的规定,准确认定了一些新型的受贿行为类型,严密了对于受贿行为的刑法处罚,除了考虑纯粹的犯罪数额外,还将案件情节纳入到了定罪量刑的考虑范围,增加了更多受贿罪入罪的考虑因素,而不仅仅将数额作为唯一的入罪评判依据。<sup>②</sup>除此之外,《刑法修正案(九)》同样扩大了行贿犯罪的打击范围,进一步严格了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彰显了党和国家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力度,贯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顺应了人民群众对于反腐倡廉的新要求和新期待。网络反腐是互联网时代人民群众进行民主监督的一种新形式,具有方便快捷、成本低廉、风险水平低的技术与成本优势,容易形成舆论热点,成为对国家有权机关监督的重要补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这一论述将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提升到了全新的理论与实践高度,体现了新时期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但在目前的网络监督实践中还存在着网络举报渠道不通畅、举报人保护不力、侵权行为多发等问题。为回应上述问题,党和国家出台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关于加强党政机关网站安全管理的通知》《网络监督法》《网络举报法》等法律法规,明确了民主监督的权力与程序救济,将网络监督纳入到了法治化的进程,体现了人民民主为主要特征的反腐理念,多元主体协调统合、

<sup>①</sup>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sup>②</sup> 孙国祥:《贪污贿赂犯罪刑法修正的得与失》,《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76页。



官民深切互动的反腐形式，对于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反腐斗争、突破公权力反腐败斗争的弊端、督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恪尽职守，建设透明政府、法治国家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三）协调刑罚设置：死刑与终身监禁并存，公有私有同等保护

我国一直坚持加大反腐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sup>①</sup>从上述论断中可以看出，“不敢腐”仍旧是当前反腐败治理的重中之重。基于此，一方面，部分受贿犯罪的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特别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保留死刑制度，不仅可以发挥刑罚的报应机能，扶贫民愤，更有利于发挥死刑的一般预防的作用，使得潜在的腐败犯罪分子通过进行苦乐计算而放弃受贿；另一方面，《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终身监禁制度，终身监禁制度是建立在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过渡措施。作为英美刑法中较为常见的监禁刑的处罚方法，通过对罪不至死的贪腐犯罪分子适用更为长期的监禁刑，并且在刑罚执行期间无论其表现多么优异、多么真诚悔罪，均不得进行减刑或者假释的制度设计，将腐败犯罪分子与社会相隔离，以更好地保护社会、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起到良好的预防与警示作用。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要更加注重系统思维、法治思维、以强基为导向，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运行。<sup>②</sup>为应对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治理存在的问题，《刑法修正案（十一）》积极回应社会现实，弥补了反腐败斗争中长期存在的“公私失衡”的治理短板，秉承民营经济平等保护的刑事理念，构筑平等友善的司法环境，通过建立内部协调的刑法体系，加强法律规范与行业规范的相互衔接，“有效衔接并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民事、经济和社会管理等治理手段，加强反腐败工作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法治环境建设，引领推动该类犯罪的社会系统治理和综合施策。”<sup>③</sup>《刑法修正案（十一）》分别修改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的法定刑，使得上述三个罪名的法定刑设置与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趋于平衡，提升了对与私营企业的保护力度，更加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要求。

### （四）推动人才建设：提升法治人才素养，严格落实管理监督

习近平法治思想包括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的理论，强调要推动建立一支对党忠诚、对国家负责、为人民奉献、信仰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至关重要。”<sup>④</sup>努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道德素质、业务能力素质、职业道德水平，努力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当今社会贪腐腐败犯罪行为多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作人员缺乏职业素养、缺乏职业良知。通过加强法治工作人员的科学理论武装和思想信念教育，促使其始终如一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建设者与担当者。坚持立德树人、明法笃行、德法兼修。<sup>⑤</sup>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行为人在思想上出了问题，在钱财利益面前失去了自己的职业素养，从预防腐败行为的出现这一层面上讲，就是要通过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第2版。

<sup>②</sup> 《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 切实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1月10日，第1版。

<sup>③</sup> 贾宇：《民营企业内部贪腐犯罪治理的体系性建构——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关修改为契机》，《法学》2021年第5期，第85页。

<sup>④</sup>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15页。

<sup>⑤</sup> 黄文艺：《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理论》，《法学》2021年第3期，第12页。

提升国家工作人员的法治思维与法治素养,明确当为与不当为,时刻适用法律法规反思自身的行为,做到自我监测与外部监督相结合,不仅需要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能力,减少因无知陷入贪腐泥潭的几率,更要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从内心深处真正做到不想腐,还要加强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监督工作,严格规范管理法治工作人员,减少劣币驱除良币的效应,建立公正清明、身怀正义的法治工作队伍。

#### (五) 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际追逃追赃,健全国际合作共治

统筹协调国内外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应有之意。在国际反腐体制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一方面,腐败犯罪分子将外国当做“腐败的天堂”,贪官外逃企图规避国家法律的规制;另一方面,国际洗钱组织协助将赃款赃物转移至国外,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建立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层面提出,“要搭建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平台,加大涉案力度,突破一批重点个案”。<sup>①</sup>“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反腐败最新动态,提高追逃追赃工作的针对性。”<sup>②</sup>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反腐倡廉实践中,立足于全球视野,统筹法治建设,积极开展跨国司法协助,形成了紧密的全球腐败治理格局。我国奉行国家合作原则反腐败,为此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家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健全了国内反腐国际合作的法律规定。建立起《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国内具体反腐法律制度相结合的实体认定与程序设置标准。将“态度上无容忍、制度上无漏洞、执行上无障碍”核心原则与遣返、劝返、异地起诉、引渡等具体制度相结合,主动参与国际反腐败制度规则的制定,讲好中国反腐倡廉的故事,海外“猎狐”和国内“打虎拍蝇”并举,为国际反腐败斗争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国家跨国追逃成功的案例,充分展现了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将贪腐行为追查到底的坚定信心,极大地震慑了潜在的腐败犯罪分子,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尊严,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 (六) 提升技术水平:引入区块链技术,进行贪腐风险识别

信息化时代下,数字化的科技手段成为贪腐人员用之行贿与受贿的手段,导致“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sup>③</sup>隐性腐败问题突出。“如何坚持靶向治疗、精准惩治,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是廉政研究人员探索的新命题。”<sup>④</sup>2019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区块链技术作为核心技术创新重要突破口。”<sup>⑤</sup>大数据技术可以从惩治腐败、预防腐败、腐败免疫三个维度束缚公职人员的权力,实现腐败、权力、资源的大数据治理。以区块链为例,该技术具有“时间戳、共识机制、非对称加密、智能合约、数字签名技术、链式储存等多项核心技术”。<sup>⑥</sup>美国“新美国智囊团”推出区块链信任加速器

<sup>①</sup>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上关于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讲话》(2014年10月9日),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2页。

<sup>②</sup>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上关于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讲话》(2014年10月9日),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

<sup>③</sup> 张洋:《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确保“十四五”时期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21年1月23日,第1版。

<sup>④</sup> 廖晓明、郑燕:《论大数据视阈下公职人员腐败治理》,《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233页。

<sup>⑤</sup> 《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 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6日,第1版。

<sup>⑥</sup> 唐衍军、肖长春:《区块链助力网络反腐:技术——制度协同视角》,《理论学刊》2020年第10期,第73页。

项目，英国内阁办公室部长马修提出了通过区块链技术监视研究经费，秘鲁 Funes 的数字调查机构通过人工智能 ojo - publico 技术监控政府采购项目。“制度与技术的融合有助于塑造开放、透明的公共服务流程，并带来公共治理的新革命。”<sup>①</sup> 减少行政人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这就意味着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通过破除信息垄断与信息孤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减少腐败机会，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具体而言，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实现反腐协同、交易机制的透明度揭示隐性腐败、时间戳技术助力反腐数据溯源、共识机制保障数据安全、非对称加密防止信息数据滥用。<sup>②</sup> 智能合约 3.0 机制背景下的全球性区块链为数据平台建设提供了低成本、高收益的数据平台，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制度化的反腐机制，开创技术助力制度的反腐倡廉治理新格局。

#### 四、结语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反腐败法治理论一以贯之，深刻体现着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是新时代反腐倡廉法治建设的理论指南，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思想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反腐败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就是因为有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其反腐败法治理论体系的科学指导，习近平反腐法治理论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协调宪法法律与党内法规的统一协调与互补关系，在反腐败刑事法律制度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维度、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政策指导与法治分析，十分深刻地回答了反腐败斗争中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难题，揭示了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的本质要求，那就是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反腐法治制度，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掌握新时期反腐法治实践的“指南针”与“金钥匙”，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责任编辑：杨松祿

<sup>①</sup> 何翔舟、张国芳：《区块链技术控制公共管理领域交易成本的机理透析》，《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10页。

<sup>②</sup> 王方方：《区块链技术在反腐中的功能及其应用》，《廉政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第29—33页。

# 论犯罪预防的依据及措施

路云珊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昆士兰 布里斯班 4072)

**摘要:** 由于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进行预防是非常必要的。国内外对犯罪预防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通过梳理国内外犯罪预防的发展过程及经验,可以看出我国的犯罪预防存在预防措施的针对性不强、犯罪预防组织机构不健全、人民群众自我预防意识薄弱、犯罪预防的技术手段不高等问题。影响犯罪行为的因素主要有社会因素、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被害因素。针对我国犯罪预防存在的四个问题,结合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可以从潜在加害人角度、犯罪情境下的被害人角度,以及公共安全系统统一控制下的科技监控等方面提出犯罪预防的措施。

**关键词:** 犯罪预防; 影响因素; 犯罪预防措施

**中图分类号:** D7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1) 04-0088-06

犯罪是刑法对一个违法行为最为严厉的定性,犯罪行为不仅仅是对受害者造成伤害,也是对与受害者有关的成员的精神打击,更有甚者,对整个社会安全造成威胁。因此,犯罪预防的研究是极其有必要的。而构建合理的犯罪预防体系,设计有针对性、有实效的犯罪预防模式,就成为犯罪预防论的实用目标。

## 一、犯罪预防的发展及存在问题

犯罪预防思想从刑罚产生时就已经存在,由于世界各国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也不尽相同。我们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提出合适的犯罪预防措施。因此,了解各国的犯罪预防现状,并分析出现存问题所在,对于改进犯罪预防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 (一) 国内外犯罪预防的发展

在美国,有关专家认为,对于犯罪行为很难做到“预防”,只能对其加以“控制”,因此,基于“寓防于控、以控达防”的考虑,美国采取了“二级预防”模式,强调控制犯罪条件与犯罪目标<sup>①</sup>,包括常规预防与非常规预防。英国犯罪预防模式<sup>②</sup>的重点在于情境预防和民众参与,同时兼顾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新加坡一直保持着较低的犯罪率,社会治安秩序稳定,被誉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与其成功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比较突出的

**作者简介:** 路云珊,北京理工大学法学学士,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

<sup>①</sup> “二级犯罪预防模式”也被称为“犯罪控制模式”,欧美国家基本属于这种类型,美国最具代表性。参见董士昱:《犯罪预防模式研究》,《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88—89页。

<sup>②</sup> 王若阳:《英国预防和减少犯罪战略》,《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51—52页。

特点是严刑峻法、严格执法，以及社会预防。<sup>①</sup>

“犯罪预防”一词虽然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但是，从春秋战国开始，犯罪预防思想便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周礼中有“失礼入刑”，体现了礼的作用——预防犯罪，即谁若是不遵守礼的规定，则要受到刑的惩罚，以此维护宗法制下严密的等级制度和周王朝的统治。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同样包含了对犯罪预防思想的发展和启示。<sup>②</sup> 儒家法律思想立足于“礼治”的基础上，发展为“法治”，最终成为“礼法合治”的状态，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法律思想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为我国犯罪预防的基本模式。1979年，基于日趋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中央提出，要依靠学校、工厂、街道等城乡基层党组织，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这实际上体现了综合治理的思想。1981年，中央第一次正式提出“综合治理”一词。1983年，中央确立了“严打”方针，将打击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工作。1984年提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点，强调要抓住预防、打击、改造等各个环节，通过思想、政治、法律等手段，实现控制、减少、预防犯罪目标。1991—2000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全国普遍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的出台，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上与法律上的保障。《决定》明确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

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犯罪预防的重心集中于犯罪条件与部分犯罪诱因上，采取了情境预防的策略<sup>③</sup>。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目标、内容和要求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犯罪预防工作得到有效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犯罪预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

## （二）犯罪预防的现存问题

学习借鉴国外犯罪预防措施，笔者发现我国的犯罪预防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预防措施的针对性不强。自从1981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涉及犯罪预防的政策文件，《刑法》及修正案也进行了补充改进，其中针对青少年犯罪、职务犯罪有专门的规范性文件。但到目前为止，党和国家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犯罪预防的具有指导性、系统性的规范性文件或法律法规。另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实践中还存在“综而不合”的情况<sup>④</sup>，犯罪预防效果有待提高。

二是犯罪预防组织机构不健全。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出台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均已建立起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但是这些机构在犯罪预防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并未充分发挥出预防犯罪应有的领导组织的相应职能。严格来说，它们是领导机构，并不是专门的犯罪预防组织机构，而承担犯罪预防职能的主要机构实际上是公安、司法和检查机关。因此，我国现阶段的犯罪预防组织保障基础不足，其实施效果打了折扣。

三是人民群众自我预防意识薄弱。犯罪预防不仅仅是公安、司法和检查机关的事，也是每个人应该具有的意识。但实际上，很多群众并没有将犯罪预防看作是每个人的责任，自然也就在自我保护方面比较懈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教育水平差异较大，落后地区群众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也无法得知自我保护的手段，特别表现在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案件中。

<sup>①</sup> 新加坡突出的治国经验是将治理国家与治理犯罪结合起来，选择了一条法律防治与社会防治并重的“寓防于治”模式。参见董士昱：《犯罪预防模式研究》，《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89—90页。

<sup>②</sup> 侯云杰：《孔孟犯罪预防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甘肃政法学院，2012年，第13—16页。

<sup>③</sup> 杨学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背景下的情境犯罪预防》，《法治研究》2011年第8期，第77—82页。

<sup>④</sup> 王焱：《犯罪预防重心的转移与向社会本位的回归——以犯罪原因与犯罪预防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80—90页。

四是犯罪预防的技术手段不高。虽然我国非常重视人防、器防,利用高科技手段预防犯罪,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经济成本高等原因,普及率不高,导致了部分犯罪分子利用漏洞,实施犯罪行为却无法被定罪处罚,在实质上减损了刑法的预防犯罪功能,使得犯罪预防效率偏低。

## 二、犯罪预防措施的提出依据

提出犯罪预防措施需要先了解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从而能够对照这些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sup>①</sup> 犯罪行为的产生主要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即社会因素、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被害因素。

### 1. 社会因素

由于犯罪在本质上便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其产生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因此,社会因素对犯罪的形成起着主导作用。社会是犯罪的生存空间,犯罪者的犯罪动机是在长期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犯罪的手段和犯罪实现可能性也与社会发展程度有关,可以说,社会因素在犯罪形成机制中居于主导地位。<sup>②</sup> 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解释:首先,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进而促成犯罪。在现代社会,人们的基本需求已经不再只是解决温饱,而有了更多精神上的需求。人口增长,人与人之间交流越来越频繁,在这种大趋势下,如果某个个体由于自身或是外在因素而受到周围人群的冷落、孤立,则非常容易造成其精神孤独,进而有可能演变为报复社会型犯罪。其次,文化对立也是造成犯罪的原因。<sup>③</sup> 社会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不同文化有着各自的内容,其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和倡导的行为规范又有不同,如果两种文化出现对立,持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就有可能出现价值冲突,进而诱发犯罪。再次,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犯罪提供了便捷手段。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电信和网络诈骗犯罪防不胜防。最后,生存环境的变化同样对个体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2. 生物因素

犯罪行为虽然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但是其主体是人或由人组成的组织,个体之间千差万别,这也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能够遵守法纪,而少数人却会去实施犯罪行为的一个原因。<sup>④</sup> 意大利著名的犯罪学家(同时也是精神病学家)龙勃罗梭最早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理论。由于这个理论一经传播便遭到了来自各方各面的抨击,龙勃罗梭也在听取各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将犯罪原因从单独的先天因素与后天的社会影响联系在一起研究。笔者认为,龙勃罗梭的研究并非没有道理,可以为我们寻求犯罪预防的措施提供一个新思路。

年龄也是影响犯罪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理特征,一般将人的一生分为幼年阶段、童年阶段、青少年阶段、成年阶段以及老年阶段,由此来研究个体生理特征与犯罪之间的关系。不同年龄阶段犯罪人,在身心发育状况和社会阅历方面均有不同,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他们各自的犯罪率,并且在犯罪类型和行为方式上也存在差异。青少年正处于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内的青少年们,生理快速变化和心理成熟速度相对缓慢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大,这时候,如果受到来自外界的不良诱惑,或者经历重大变故,很容易导致走上犯罪道路。青少年犯罪具有动机简单,以财产、暴力和性犯罪为主,团伙性犯罪为主以及犯罪手段日益呈现智能化趋势等特点。<sup>⑤</sup> 成人的思想与青少年相比较为成熟稳定,也容易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感,但一

① 丁珈、李斯特:《“犯罪原因二元论”之评述》,《法制博览》2016年第7期,第152—154页。

② 吴鹏森:《犯罪社会学》,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141—146页。

③ 杨在平:《当前犯罪学研究热点问题透析》,《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3期,第91页。

④ 苑广晓:《犯罪生物学视角下的暴力犯罪研究评析》,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7年,第11页。

⑤ 王震:《论我国当前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其预防》,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5年,第6—8页。

巨犯罪,则从智力和手段上来看都常比青少年“高明”得多,危害性也会相对较大。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在不断下降,完成犯罪的几率也会降低,但不排除其也会挑选同样反抗力弱的妇女儿童为侵害对象进行犯罪,或者基于其丰富的人生经历,策划、指使年轻人犯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犯罪仍然不容忽视。

### 3. 心理因素

任何行为都是在心理的支配下完成的,犯罪也不例外。社会因素、生理因素等都需要通过心理控制人的行为。因此,心理因素的产生,实质上是社会因素、生理因素在思想意识上的作用。犯罪心理的产生,主要受到需求、价值观、心理失衡以及人格障碍的影响。<sup>①</sup>人们总是希望获得还没有得到,或者得到的不够多的东西。贫穷时也许是财富,富裕时也许是权力,当这些需求遇到了错误的价值观时,犯罪的可能性就产生了。金钱对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受正确价值观导向的人们,会通过自身努力、智慧获取金钱,而想要不劳而获的人却更加的贪婪,不择手段地满足私欲。例如,性犯罪的人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而受糟粕文化影响的青少年则易寻求刺激,从而做出杀人等犯罪行为。<sup>②</sup>

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贫富差距大就是导致心理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多出现在低收入人群中。人际关系中因为家庭收入情况、性格等原因被大家否定、孤立、打击自尊,也会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

### 4. 被害因素

研究发现,犯罪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行为,在有被害人的犯罪中,被害人一方也是引起犯罪的重要因素。德国著名犯罪学家汉斯·冯·亨梯曾经强调被害人在一个犯罪行为中的角色可能会由被动的客体转变为积极的主体,虽然这个理论有些过于夸大被害人在犯罪中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表现为三种模式。<sup>③</sup>

一是被利用模式。有些被害人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客观地给犯罪人提供了易于犯罪的机会,例如走进犯罪人意欲打劫的首饰店,成为人质。

二是诱发模式。被害人将自己置于诱发犯罪的情景下,例如女子深夜独自行走在无人的偏僻小道,呼救和逃跑的可能性非常小。

三是斯德哥尔摩模式。指人质在被挟持的过程中对犯罪者产生同情、好感,进而支持、帮助犯罪者完成犯罪。例如多名人质被同时挟持,听到犯罪者是因为公司老板不给工伤医疗费用才出此下策时,对犯罪者的遭遇表示同情,并且帮助犯罪者挟持,甚至鼓动杀害同被挟持的老板,此时便出现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被称为“人质情结”。

## 三、犯罪预防的具体措施

明确了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就该对症下药,提出相应的犯罪预防措施。研究了国内外现存措施及其存在的不足之处,结合我国当前犯罪问题及社会发展状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 (一) 潜在加害人角度的预防

犯罪预防的一个措施是犯罪预测。指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通过调查、统计、比较、处理与犯罪有关的数据、资料,研究分析犯罪获得的一般性规律,以达到对一定社会范围内、未来一定时间内可能出现的犯罪现象的类型、数量以及发展趋势或者对某些罪犯的再犯可能性等做出推

<sup>①</sup> 张保平、李世虎:《犯罪心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39页。

<sup>②</sup> 陈和华:《“犯罪心理”的心理学解读》,《青少年犯罪问题》2015年第5期,第35—44页。

<sup>③</sup> 李伟:《犯罪被害人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9—79页。



测和估计的目的。<sup>①</sup>我国在犯罪预测方面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时主要针对的是青少年犯罪预测,随后扩展到宏观预测,包括中长期内的犯罪发展趋势预测以及刑释人员再犯可能性预测。此项措施的重点在于对已经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员和犯罪高发区进行预测。在有针对性地预测潜在加害人,从而从源头阻止犯罪行为的发生方面,只停留在青少年犯罪、已有刑事犯罪记录人员的再犯可能性层面上,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笔者建议,应设置家庭督导员,识别潜在加害人。

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大部分罪犯实施犯罪,是因为自己在家庭中经历过不幸。例如,在不和睦、有暴力或夫妻关系紧张家庭中生活成长的成员,可能造成自信心受挫,压力无处释放,从而报复对方或爆发在其他无辜的人身上。因此,设立类似家庭医生的家庭督导员,以家庭为单位,测评家庭的和谐程度、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专业人员对这些情况加以分析,预测可能做出犯罪行为的潜在加害人,并且及时与其交流,对其进行疏导、教育以及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增加观测频率等,有利于识别出潜在的加害人,使犯罪止于源头。不过,这类措施的一个显著缺陷在于识别的准确性有待商榷。由于家庭环境并不是形成性格和导致行为的唯一因素,仅凭这一方面指标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成为加害人的潜在可能性还不太可靠,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综合参考多个方面因素。

## (二) 犯罪情境下的被害人角度预防

前文中提过,犯罪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行为,在存在被害人的犯罪中,被害人不再只是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运用反向思维,消除被害因素,则可以弥补识别潜在加害人的不足之处。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建立在犯罪情境中,即改变有利于犯罪行为发生的日常情境因素。<sup>②</sup>从被害人角度入手进行犯罪预防的目的有二:一是防止潜在的被害人遭到犯罪行为的伤害;二是防止已经遭受犯罪行为伤害的被害人进行角色转变,成为新的犯罪者。

由于被害人可能是自然人、法人以及国家等主体,本文选择只讨论自然人被害人的情况,分别选择讨论青少年、女性和老年人的被害预防。

青少年认知能力弱,容易受诱惑,社会经验不足,因此,需要家长和学校的协助,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要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安全教育活动,认真学习紧急情况下的应急自救方法,远离网吧、酒吧等不良场所。要引导青少年加强运动,提高身体素质。提醒青少年在外出时定时与家长保持联络,树立生命第一、不恋财物的基本思想,结伴出行。<sup>③</sup>

女性由于生理特性,极易成为犯罪目标,特别是性犯罪目标。近年来网络上有些人认为女性穿着暴露会诱发男性犯罪,将犯罪行为的诱因完全推到女性身上,<sup>④</sup>这是不合理的。实际上,经过调查发现,加害人选择下手的目标往往是好欺负、不敢反抗的女性,并且多数为有预谋的犯罪。我国司法部统计数据显示,63%的强奸案为熟人作案。<sup>⑤</sup>因此,在这类型犯罪中,被害者自身的反应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犯罪是否得以实施完成。针对女性在力量上的不足而言,预防其成为被害人,首先需要女性对熟人保持必要警惕,不轻易跟熟人单独到私密场所。另外,在公共场所遇见或者遭到猥亵,女性要敢于制止,毕竟多数人是守法的,说出来并不可耻,忍气吞声或者视而不见才会助长犯罪分子的焰。同时,女性要避免夜晚单独出行,尽量避开人烟稀少的道路,

<sup>①</sup> 王姍:《警务大数据系统与犯罪预测软件研究开发》,硕士学位论文,西安理工大学,2017年,第11—12页。

<sup>②</sup> 汪澍滢:《试论犯罪被害预防研究的新路径——被害情境》,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12年,第14—17页。

<sup>③</sup> 李恭通:《被害预防——我国犯罪治理的常规模式》,《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3期,第219—223页。

<sup>④</sup> 骆群:《论性犯罪被害人的被害性》,《理论月刊》2015年第12期,第84—89页。

<sup>⑤</sup> 李丹丹:《被害情境下的被害人与个人预防》,《犯罪研究》2017年第5期,第34—38页。

随身携带大音量报警器，而不是折叠刀、防狼喷雾等容易被夺走反过来对付自己的防身工具。

老年人的普遍特点是反应慢，跟不上时代发展，容易成为诈骗、盗窃等财产犯罪的受害者。因此，子女需要为父母准备贴身钱包、手机挂绳等防盗措施，并叮嘱他们不轻信送礼、抽奖等活动，不随意与外人聊家庭情况，以防上当受骗。

### （三）公共安全系统统一控制下的科技监控

随着犯罪形态的改变和现代监控技术的发展，以数据库为基础进行查询、比对，调取手机通信记录并进行分析、使用科技手段进行特别监控追踪（例如视频监控设备和GPS）为代表的新型监控、侦察措施被普遍使用，特别是在针对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以及毒品犯罪的监控、侦察中发挥着重大作用。<sup>①</sup>

我国运用新型监控侦察措施的实践是伴随着公安信息化建设而不断发展的，信息化手段不仅为公安侦破案件带来了便利，而且在犯罪预防中大有可为。据悉，目前公安部已经建成以全国人口信息库为代表的八大全国公安基础信息资源库，分别为全国重大案件、在逃人员、出所人员、违法人员、盗抢汽车、无名尸体、失踪人员、杀人案件储存了数百亿条基础数据。但如今的监控措施主要还是运用于侦察之中，也就是说在刑事案件已经发生之后，再想办法破案，寻找犯罪嫌疑人，无法满足实现事前犯罪预防的目的。因此，想要彻底实现事前的犯罪预防，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公安系统统一控制下的科技监控措施。

据了解，目前中国人口信息库的统计对象主要为上述8种特征群体，而非全民。但是，犯罪者、被害者都有可能是我们身边的每个人，甚至是我们自己，为达到事前犯罪预防目的，需要设置全体人员身份录入系统，主要方式是指纹和DNA的采集。

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还可考虑人体芯片植入。具体方法为，在人体内植入可依靠血液供电的芯片，以之承载身份信息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集手机、身份证、银行卡、公交卡等功能等于一身，有GPS定位装置及日常安全监测系统，包括检测自身安全（如行走时周围是否有伤害性武器）和主体是否会对周围造成威胁两个方面。将所有的监测结果汇合到一个总部，并设置危险预警标准，一旦有符合危险标准的情况即报警提示，公共安全系统统一管理的监控人员有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反应。此项措施一旦达成，可以说就进入了全民监控时代。在全透明的情况下，有犯罪意图的人鉴于侥幸犯罪已无法实现，便不敢随意实行犯罪行为。

不过，对于全面实行科技监控措施而言，最大的难题在于解决与隐私权保护问题之间的矛盾。《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公安机关在进行讯问、勘验、检查、搜查、技术侦察等具体措施时所需要遵守的程序，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做了比较到位的保障。因此，在尚未触犯任何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监控全体社会成员，就更需要出台完善的规定，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侵犯。

## 四、结语

从人类社会文明出现开始便有了犯罪问题，相对应的犯罪预防是需要持续努力的社会课题。任何一个具体的犯罪预防措施都不会十全十美，必然存在其优势与劣势。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结合中国传统犯罪预防思想对当今的启发借鉴和现有的犯罪预防措施存在的不足之处综合研究，学习借鉴国外效果较好的犯罪预防理论及方法（本文选取美国、英国、新加坡为例），开阔思路，寻求新的犯罪预防措施。建议选取几个试点，在一定范围内试行，在得到较好的效果之后再推广至全国。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国能够做到将犯罪止于源头，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幸福感，加快建成平安中国。

责任编辑：杨松禄

<sup>①</sup> 艾明：《新型监控侦查措施法律规制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169—174页。

## 文化建设

# 文化治边视角下的边疆统战文化建设

杨睿哲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4)

---

**摘要:**文化治边是边疆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治边要想获得良好效益,关键在于建设卓越的治边文化。边疆统战文化作为一种治边文化,是统战文化精髓同边疆现实之间的有机结合。边疆统战文化对边疆治理中富裕边疆、法治边疆、文明边疆、和谐边疆的价值追求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建设边疆统战文化,一是需要建设边疆统战文化的价值体系;二是需要建设边疆统战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体系;三是需要建设边疆统战文化的实践机制。

**关键词:** 边疆; 文化治边; 治边文化; 边疆统战文化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1) 04-0094-09

---

政治学视野中的新边疆观认为,“边疆就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国家权力存在管控风险的边缘性区域或领域。”<sup>①</sup>边疆治理就是运用国家权力调动多元主体参与解决边疆问题的活动及过程。文化治边是边疆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将文化视为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通过构建和传播有利于提升边疆治理效能的文化样式,利用该文化样式能更好地为边疆各族群众提供价值追求、行为准则和精神力量。作为一种软实力治理模式,文化治边同时是对规制型治边、情感型治边、合作型治边等其他治边形式的有益补充。

边疆地区由于受历史惯性影响和现实发展瓶颈制约,导致其传统文化自然而深远,根深而蒂固。目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未在边疆地区完全建立发展起来,以至于传统文化中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等不良文化因子在边疆地区仍然占据较大空间,对边疆各族群众起着不可小觑的软指导、软规范和软束缚作用。有鉴于此,就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凝练出一种卓越的治边文化,在保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同时,还要保持边疆地区独有的文化特色。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sup>②</sup>边疆统战文化作为一种治边文化,是统战文化精髓同边疆现实之间的有机结合,建设边疆统战文化将有利于构建文化治边体系。笔者重点阐述边疆统战文

---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强边固防战略下云南边境乡村振兴路径研究”(2022Y106)。

**作者简介:** 杨睿哲,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边疆治理。

① 方盛举:《新边疆观:政治学的视角》,《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87—95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化的内涵及功能，边疆统战文化对边疆治理的独特作用，促进边疆统战文化建设。

### 一、边疆统战文化的内涵及功能

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很难对其进行精准定义。西方的 Culture 一词由拉丁文 Cultus 转变而来，原意是耕种收获，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涉及宗教以及对社会成员行为规范的教化和培养，这里的文化有教化之意。细化来看，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本文所要探讨的是狭义文化，狭义而言，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及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价值观念、使命愿景、民风民俗、文学艺术等。对于狭义文化的构成，可从社会生活范畴划分，分为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生态文化等。在 20 世纪中叶，行为主义分析替代了传统制度研究方法，政治学家们开始对政治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最早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sup>①</sup> 政治文化不同于大众文化，它是在长期的政治价值观的熏陶中产生的，并非是对特定事件和问题的简单反应。政治文化从来就不是一座孤岛，它的内部涵盖着很多子系统，统战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件。

统战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纵向来看，统战文化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完美融合结合；横向来看，包括政党关系上的合作文化、民族关系上的团结文化、宗教关系上的和顺文化、社会关系上的和谐文化等。统战文化中，例如“团结联合一切可以团结联合的社会力量”“民主协商”“民主监督”等观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但是如同文化和政治文化一样，统战文化概念界定至今仍存在诸多争议。杜青林认为：统战文化“既具有文化的一般属性，又体现统一战线特色，是独特风格和气质的文化形态”。<sup>②</sup> 贺善侃认为：“统战文化，即服从我党统战工作需要的战略指导思想理念。”<sup>③</sup> 叶文龙认为：“统战文化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所共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sup>④</sup> 陈喜庆认为：“统战文化是以党际合作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宗教和顺文化、新的社会阶层信义文化、海内外同胞同根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特殊文化形态。”<sup>⑤</sup> 归纳以上各位学者的表述，统战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及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总和。

我国的边疆概念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sup>⑥</sup> 我国有 9 个陆地边疆省区，有着 30 多个跨界民族，其显著的特征是民族成分众多、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导致边疆地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统战文化在边疆地区有着自身特殊的历史根源、社会环境和统战工作对象。边疆和内地核心区的统战工作范围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鉴于边疆的特殊性，边疆统战工作的着力点要放在少数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上。因此边疆统战文

① [美]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年，第 26 页。

② 杜青林：《大力加强统战文化建设》，《求是》2012 年第 7 期，第 7—9 页。

③ 贺善侃：《统战文化与文化统战》，《学习与实践》2009 年第 9 期，第 143—148 页。

④ 叶文龙：《试论新时期统战文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第 24—27 页。

⑤ 陈喜庆：《对统一战线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几点认识》，《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第 5—7 页。

⑥ 周平：《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政治学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67—72 页。

化形成以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为重要主线，大量围绕民族、宗教开展工作，是与内陆地区相区别的特色鲜明的统战文化。

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边疆统战文化的功能。

一是政治认同功能。这里的政治认同是指边疆各族各界人士对某个特定的政治单元的归属感和依赖感。政治认同产生于边疆各族各界人士与各类政治单元（如国家、民族、村寨等）的相互关系，当他们察觉意识到自己归属于某个政治单元时，就形成了对该政治单元的认同。边疆各族各界人士普遍生活在山区和偏远地区，地理环境复杂，经济相对落后，交通基础设施不健全，生活相对封闭。政治生活的地域性、民族性、宗教性等特征突出，相当数量的边疆各族各界人士对国歌、国旗、国徽等基本的政治符号了解和认知不足，对其产生的神圣情感倾向不够强烈，较大地影响他们对国家的认同。边疆统战文化建设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大有可为，边疆统战文化能够找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边疆各族各界人士价值观的契合点、情感共鸣点，帮助他们保持对国家的高度认同，让他们认识到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性。

二是政治信任功能。这里的政治信任是指边疆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生活中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感，同时也指在与他人生活工作中所感受到的一种包容、信任、互助的气氛。边疆各族各界人士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通过各类政治事件的发生，产生不同的政治经历，由此对国家、政府和他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态度，其中最普遍的是开放和封闭、互助和分裂、合作和对峙、信任和猜忌等态度，前者属于政治信任，后者属于政治不信任。作为边疆统战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政治信任影响着边疆各族各界人士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边疆统战文化一贯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战略思维，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目标下，主张求同存异和聚同化异，广泛吸纳不同社会力量，听取各界的声音，提升政治信任，促进边疆经济社会文化的良好发展。

三是政治吸纳功能。这里的政治吸纳是指吸纳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族各界人士，让他们获得政协委员等相应政治身份，并拥有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权利的制度安排。边疆统战文化是统战工作在边疆从理念到行为的集中呈现，拥有强大的政治吸纳功能。边疆统战文化将边疆不同的政治力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强化边疆各族各界人士的政治认同和政治信任，让他们对边疆治理过程进行建言献策和实施有效的监督，对边疆治理民主化发挥积极的助推作用。

建设具有影响力、感召力、辐射力的边疆统战文化，关键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各式各样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边疆地域文化等为基础，建设出具有中国特色、边疆色彩的文化样式。这一文化样式对内而言能够成为凝聚边疆各族群众的精神枢纽，对外而言能够对周边国家产生较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把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内循环”扩展至国际市场的“外循环”。概括说来，边疆统战文化作为一种卓越的治边文化，对完善边疆治理体系，推动边疆治理现代化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二、边疆统战文化对边疆治理的积极作用

价值追求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是指对一定的价值目标的坚定追求并力求达成该目标的强大驱动力。边疆治理的价值追求，就是治理主体解决边疆问题以及治理最终要达成什么样的愿景和结果。我国边疆治理的价值追求是：“富裕边疆、法治边疆、文明边疆、和谐边疆、平安边疆和美

丽边疆。”<sup>①</sup>文化治边是我国边疆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它是将实现边疆治理的价值追求作为其行动目标和行动原则。“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无论是天地万物的产生，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关系，还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都贯通着和合”。<sup>②</sup>边疆统战文化的价值追求正是以“和合”为核心，以团结、合作、友爱、平衡、和谐为思想准则，以对异质因素选择和扬弃、对优质因素进行有机有序的“多元和合”为行动指南。基于边疆地区的特殊性，边疆统战文化的价值追求同文化治边的内在要求是相一致的。边疆统战文化就是通过开发利用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政治吸纳的功能，助推实现边疆治理富裕边疆、法治边疆、文明边疆、和谐边疆的价值目标。

#### （一）边疆统战文化有利于实现富裕边疆的价值追求

富裕边疆，就是在边疆治理过程中谋求经济发展、追求民生幸福的理想愿景。具体来说，富裕边疆就是通过良好的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加快建成现代化的边疆基础设施、高新化的边疆现代产业体系、完善化的边疆民生保障，以此让边疆各族各界人士拥有与核心发达地区同等程度的现代化生活水平。然而源于历史、地理、人文、政策等多方因素的限制，我国大部分边疆地区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与核心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偏远地区部分群众的生活水平还较为低下。边疆地区社会问题的总根子正是经济问题，要想有效解决边疆社会问题，就需要凝聚力量首先解决边疆经济问题。一方面，边疆统战文化能够运用其独特的政治吸纳功能和发挥“黏合”作用。以文聚力，以丰富的形式、多元的手段、创新的方式，团结联合一切可以团结联合的力量，指引和加速各种资源聚集到边疆，加快边疆城镇化进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边疆统战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富裕边疆价值追求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非常有利于促进边疆地区民族团结，有利于持续性地改善民生，逐渐增加和汇聚边疆人口，提升戍边稳边固边能力。通过边疆统战文化的培育和传播就能在边疆各族各界人士中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强化他们对国家主流政治文化和边疆统战文化的接纳度、情感度、受益度。

#### （二）边疆统战文化有利于推进法治边疆的价值追求

人类组成社会，社会秩序的维持就必须有规则、制度。法治边疆作为我国边疆治理的价值追求，其目标为：必须在边疆确立法律的权威地位，必须严格规范边疆地方政府的权力，必须使边疆各族群众的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用法治开启边疆治理的新风尚。政治学意义上“治理”一词的阐释，即以维护一定的政治秩序和达成既定的社会目标为宗旨。可见，治理与生俱来就包含着规范和约束的意义。法治作为一种规制型治理方式，往往过于“刚强”，缺少“柔和”。如果对法律法规的规范性和强制性作用片面强调和过于倚重，容易引起边疆治理过程中情感因素的缺失。这往往致使边疆治理太过刻板，不易获得边疆各族群众的认可和接纳，以致产生抵触心理和抵抗行为，极大地降低边疆治理的效能。边疆统战文化的价值追求是以“和合”为核心，凭借民主协商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用和风细雨般的方式推动统战工作。不仅如此，边疆统战文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注重边疆统战成员的主体地位，尊重统战成员作为“社会人”的需求。要围绕这些需求出发来建设边疆统战文化，培养边疆各族各界人士的法治意识，提升民众敬畏法律、崇尚法律、熟知法律、遵守法律、使用法律和捍卫法律的能力，从而营造良好的边疆法治环境。

① 方盛举：《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20页。

② 张立文：《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源流的考察》，《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1期，第43—57页。

### （三）边疆统战文化有利于助推文明边疆的价值追求

文明是现代国家的鲜明特征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文明位居国家层面。因此，在边疆治理中“文明边疆”也应作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文明边疆的价值追求为：边疆各族群众拥有高度统一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标，拥有文明的价值观，拥有较高的公民意识、道德修养和文明行为规范。边疆统战文化反映着中国共产党边疆统战工作经验的不断沉淀和积累，映射出统战工作的价值取向，对助推文明边疆的价值追求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边疆统战文化主张“心朝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倡导边疆各族各界人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达成社会共识。二是边疆地区统战文化工作尤其注重对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正确引导和统合。边疆统战文化作为一种卓越的治边文化，主张在边疆发展团结稳定、利国利民、注重和谐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通过边疆统战文化的引导更容易在边疆各民族、各宗教团体之间建立互相尊重、互相容纳、互相赏识、互相帮助的民族团结文化和宗教和顺文化。三是边疆统战文化能够对边疆社会风气进行精确的领航，对边疆各族各界人士的内心进行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育化和涵养，提升公民意识和道德修养，创造出优良的文化效应。

### （四）边疆统战文化有利于达到和谐边疆的价值追求

和谐是不同事物通过互相配合和互相协调，从而达到和睦谐顺的状态。和谐在边疆这一视域下被赋予特殊含义，和谐边疆是指在边疆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宗教之间、阶层之间以及与周边国家之间等达到和谐相处、合作发展的美好价值追求。和谐边疆的构建必须以和谐文化的建立为核心，只有边疆各族群众之间、各族群与国家间文化和谐相处，社会才能和谐稳定。然而在边疆普遍存在着内外交织的困境，一方面，传统文化良莠不齐。边疆传统宗教信仰极为常见，宗教活动在边疆较为频繁和普遍。在一些偏僻、发展滞后的古老边境村寨中，“长老”“族长”等传统的宗族组织领袖仍保留着较强的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相关群众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之间产生困惑。另一方面，存在外来文化渗透的威胁。我国边疆民族和宗教要素的复杂性导致外来文化的入侵。例如，云南省紧邻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地“金三角”，在“金三角”地区，毒品滋生出黑色文化、色情文化、血腥文化等一系列“毒品文化”，由此产生的涟漪效应对边疆文化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西方反华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不断利用各种手段向我国边疆地区渗透，加之极端自由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在边疆地区的散播，由此带来的共振效应给我国边疆地区带来了较大的风险和压力，威胁我国的安全边界。如前所述，边疆统战文化就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和合”文化。面对当前边疆内外矛盾凸显期，如何对边疆多元利益主体和不同的利益表达进行协调，如何运用协商沟通和互谅互信来缓解矛盾，如何净化边疆文化环境？这就需要具有整合性和包容性的边疆统战文化彰显其协调矛盾的独到魅力和影响力。

## 三、加快推进边疆统战文化建设

边疆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政治议题。面对着边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滋长出来的诸多难题，我国迫切需要加快推进边疆统战文化建设，这不仅是满足边疆各族各界人士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需求，同时也是提升边疆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客观需求。

### （一）建设边疆统战文化的价值体系

创建具有治边功能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建设边疆统战文化的先决条件。“有目的、有计划、有



步骤地凝练和培育世俗化、开放化和现代化的边疆文化，是实施边疆文化型治理的前提条件。”<sup>①</sup>边疆统战文化要凝练和建立起愿景、使命、价值观等一系列文化，创建具有治边功能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一文化价值体系能够让边疆各族各界人士的思想有效整合到守护边疆、稳定边疆、发展边疆的目标上来，以此营造情感齐向、人心齐聚、能量齐发的全民守边固边兴边的良好氛围。

一是愿景文化。愿景分为个人愿景和共同愿景，个人愿景是个体在自己头脑里希望的图景和画面；共同愿景则是“整个组织中的人们内心的图景”。<sup>②</sup>管理学领域的企业文化理论认为，能够保持长期竞争力的企业往往都有着一个共同愿景。同理，边疆统战文化的愿景就是一种共同愿景，是边疆统战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应该追求并为之奋战的若干图景。总结边疆统战工作的历史 and 实践经验，边疆统战文化建设应追求实现“和合”愿景，包括：在边疆地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联合一切可以团结联合的社会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二是使命文化。边疆统战文化的使命包括宏观使命和微观使命。边疆统战文化的宏观使命是：“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sup>③</sup>边疆统战文化的微观使命是：让边疆各族各界人士（包括个人和群体）形成正确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的精神追求，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共同致力于边疆和谐发展的建设事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积极奉献智慧和力量。从根本上看，边疆统战文化的宏观使命和微观使命是目标统一、相辅相成的。

三是价值观文化。在私人生活领域，人们价值观的差异往往会导致个体间的对抗和分裂。在公共生活领域，人们公共价值观存在的差异，极有可能造成比私人生活领域更恶劣的后果。因此，为了公共生活能够有序展开，就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凝聚社会共识，形成主流价值观，消除社会的分裂倾向，促进社会的凝聚和合作。文化治边同样如此，需要进一步凝练和培育正确的价值观，在文化领域“去落后化”，推动边疆文化的持续繁荣。边疆统战文化需要确立的价值观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追求的国家观。爱国主义是个人对国家情感的反应，是调节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二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价值追求的国族<sup>④</sup>观。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治边中的凝聚功能和吸纳功效的实现，增进边疆各族各界人士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三是以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为价值追求的民族观。民族关系是边疆社会稳定的基石，建设和谐的民族关系需要边疆各族各界人士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四是以和睦协调、崇和向善为价值追求的宗教观。面对边疆部分地区宗教信仰特别普遍的复杂局面，要尤其注重加强宗教领域的文化统战工作。我们应该强化国家认同，自觉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消除宗教中的对抗分裂因素，崇尚信仰上的和谐共生、相互学习、互相尊重，促使宗教在边疆的发展保持健康。五是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价值追求的多党合作观。正如亨廷顿所说：“不是政党反映国家意志，而是政党缔造国家。”<sup>⑤</sup>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强调中

① 方盛举：《我国陆地边疆的文化型治理》，《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第77—85页。

② [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③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1日，第2版。

④ 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79—98页。

⑤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9页。

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同时倡导多党合作，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要在边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法宝作用，凸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 （二）建设边疆统战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体系

建立文化传承和传播体系是边疆统战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我国边疆地缘政治错综复杂，当前又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情下，边疆文化安全面临的形势严峻，治边功能容易受到阻抑。所以，充分发挥文化的治边功能，就要借助一定的文化载体，实现边疆统战文化从抽象化到具象化的转变，转变为生动形象、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把边疆统战文化传承传播给更多的人，让他们潜移默化地认同它、接纳它、传播它、传承它。边疆统战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体系由文化载体以及文化传承和传播路径组成。

1. 加强边疆统战文化载体建设。应进一步通过英雄人物或故事来承载边疆统战文化信息，最常用的载体有统战相关的英雄、统战故事和统战文化活动等。

一是统战相关的英雄。边疆地区产生过很多的国家楷模和民族英雄，他们对统战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们身上体现着国家所倡导的价值观、精神品质和行为规范等。“人类在与环境相处的过程中，最恰当的方式是成为一个主动的问题解决者和学习者。”<sup>①</sup> 建设边疆统战文化就要善于找寻、发掘和塑造英雄人物和关于他们的先进事迹，使其成为边疆各族各界人士学习的榜样标杆。

二是统战故事。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sup>②</sup> 同理，统战故事只有彻底，才能在边疆地区产生凝心聚力、聚同化异的功效。统战故事只有反映立体、生动、真实的统战工作才算彻底。边疆统战文化的传承和传播需要借助统战故事这一载体来进行，所以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收集素材、整理素材、加工素材，讲好边疆统战成员的奋斗故事，讲好建党以来统战工作的卓越成果，讲好统战成员边境抗疫的动人故事等。

三是统战文化活动。统战文化活动是一种十分典型的文化活动，其蕴藏着诸多的价值追求。统战文化活动以正式庄严或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强化边疆各族各界人士的“五个认同”。在边疆地区常见的统战活动有升旗唱国歌活动、统战宣传月活动、统战相关的英雄表彰会活动、“民族团结进步”文艺联欢活动等。在进行集体性的纪念或庆祝活动时，边疆各族各界人士的共同体意识将在所举行的活动中得以进一步凝聚。

2. 强化边疆统战文化传承和传播路径建设。文化传承往往是一种纵向的传承，是同一文化思想、目标、价值观的传承，而文化传播通常是一种横向的传播，是某种文化在社会群体中的输入和散播的过程，两者有差别也有共性。加强边疆统战文化传承和传播的路径建设主要应从标语符号、学校教育、大众传播媒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艺作品等方面入手。

一是善用标语符号。作为一种文化传承和传播路径，标语符号的使用可谓历史悠久、范围广泛。“而对于边境治理而言，制作和广设标语还具有符号政治的特别意涵。”<sup>③</sup> 如，在边疆地区长期印制张贴“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民族团结促发展”“党建引领，统战同心”等大幅标语符号，有利于提升边疆各族群众和各界人士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政治文化的认同，

<sup>①</sup> 埃德加·沙因、彼得·沙因：《组织文化与领导力》（第5版），陈劲、贾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05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sup>③</sup> 孙保全：《标语治边：边境治理的一种特殊方式》，《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52—58页。

营造出浓郁的守边固边兴边文化氛围。所以，建设边疆统战文化，必须有目的、有计划地将统战文化这一主题贯通到标语符号之中，让标语符号承载着文化治边的功能。

二是强化学校教育。在王朝国家时期，历朝历代统治者往往将儒家文化渗透到边疆社会中，以图逐步消除核心区与边疆之间的文化藩篱。今天，我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传承中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但古代文化治边的方略仍值得借鉴。当前，学校教育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和突出，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和传播最有效的途径，是儿童青少年价值观塑造和精神品格培养的主要场所。学校的作用不仅在于知识传授，更主要是在于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等先进文化。在我国边疆地区，为了有效地推行边疆统战文化，应推进国门学校建设，并有意地开设一些涉及统战文化的课程，从小影响儿童青少年的信仰和思维观念，使其在成长的过程中内化于心，形成正确的为规范和行为准则，进而外化于行，使学校真正成为边疆统战文化培育传播和相关素质人才培养的基地。

三是用好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通常是指信息传播的硬件传播工具和进行信息传播的组织机构。传统媒介有报纸杂志和图书等平面媒介，广播、收音机、电影等电子媒介。新兴的数字、互联网传播媒介，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传播之快、时效之高均前所未有。建设边疆统战文化，尤其离不开对当前作为信息传播制高点的互联网、新媒体等新兴传播媒介的开发和利用。要借助互联网，在边疆地区开设关于统战文化的专题网站、公众号、微信群等。同时依托微信、微博等传播平台开展统战文化学习活动，在边疆反复传播统战英雄、统战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为边疆各族各界人士提供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四是做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边疆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能够强化边疆各族各界人士对统战文化的融入感，让他们在对统战文化的深刻体悟中增进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创设良好的文化效应。但对于边疆庞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言，公共财政犹如杯水车薪，经济成为制约边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阿喀琉斯之踵。这就需要我们在非公有经济发展上寻求突破口，统战文化培育传播和相关素质人才培养党和政府联络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重要平台作用，边疆地区更应加强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弥补其资金短板。

五是创造一批优秀文艺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sup>①</sup>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文艺作品都是文化传承和传播的重要形式，是影响社会个体意识的重要力量。兼容并济、博采众长的统战文化为文艺上存在的差异性提供了更加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边疆地区拥有大批专业技能精湛、业务水平高超的党外人士，这些党外人士思维活跃，对文艺有着深厚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应该激励他们在其擅长的领域将国家共同体意识融入到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将他们能工巧匠的技艺引导到传承和传播优秀文化、统战文化上来，塑造出文艺作品的“家国情怀”，创造更多边疆各族各界人士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 （三）建设边疆统战文化的实践机制

建设边疆统战文化，不是一蹴即至的，而是一项系统工程，边疆统战文化必须建设长效的实践机制。

1. 建设边疆统战文化的理论机制。一是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边疆统战文化作为一种“和合文化”和卓越的治边文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指导思想是无庸置疑的正确选择。二是

<sup>①</sup>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注重边疆统战文化理论的系统性。要提升边疆统战文化理论建设与边疆治理顶层设计和战略筹划之间的协同性和耦合性，整合边疆治理资源，防止出现文化碎片化危机。三是强化边疆统战文化理论的精准性。面对边疆统战工作的特殊性，边疆统战文化要运用其亲和力、感染力、影响力，在维护政治文化安全的前提下，结合边疆地区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义、乡规民约等，建设具有边疆特色统战文化。

2. 健全统战沟通联系机制。边疆地区统战成员人数众多、构成复杂，很大一部分统战对象缺乏相应的组织归属。针对这一难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寻找化解之道。其一，通过将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等与边疆统战工作深度结合，打造网络统战平台，优化网络统战平台的服务功能。用“统战+大数据”模式管理和服务好统战成员，用“统战+互联网”模式宣传好边疆统战文化。其二，边疆统战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培训会、学术交流会、座谈会、听证会等，邀请边疆统战成员参加和交流互动，可以将边疆统战文化植入各种会议内容之中，借助各种会议形式达到传播边疆统战文化的目的。

3. 健全统战人才培养机制。边疆聚集着一大批学有所成，术有专攻的专家学者、民间文化传承人和新乡贤等各个领域的精英，他们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同时也是统战文化传承和传播的主力军。一方面，地方政协和统战部门要为培养统战人才建立健全组织协调机制、创新激励机制、专项经费保障机制等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探索出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来识别人才、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另一方面，在健全人才培养机制的同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更好凝聚他们的才智，充分发挥他们在边疆地区的独特作用。

4. 边疆统战文化的建设要坚持持久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否则欲速则不达。要在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文化浸润中，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滋润民风，实现边疆统战文化对边疆社会改造和塑造的目的。

责任编辑：罗 雷

#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红色抗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李际卫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30)

**摘要:**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香港抗战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的抗日队伍, 是由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建和直接领导的敌后战场武装力量。香港沦陷的三年零八个月, 港九独立大队依靠和发动香港人民, 始终坚持抗击日寇, 浴血奋战, 开创性地开展城市近郊和海上游击战, 为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传承和发展港九独立大队红色抗战文化精神, 利用和发挥港九独立大队抗战史迹遗址对于当下香港青少年历史教育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港九独立大队; 抗战; 红色文化; 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1)04-0103-06

抗日战争时期, 香港是英国政府在远东地区控制的经济金融中心和军事设施基地, 也是中国与同盟国联系沟通和抗战人员物资输入的联络通道和重要窗口。因此, 香港对于国际抗战和国内抗战两个战场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1941年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的同时, 早已集结在香港边境并准备完毕的日军部队1.5万人, 大举越过深圳河进犯香港。12月25日, 英军无条件投降, 时任香港总督杨慕琦在九龙半岛酒店签订《停战协定》, 包括总督杨慕琦在内9000余军人成为战俘, 史称“十八天的战争”。在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时期, 由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建和直接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成为香港唯一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坚持敌后战场游击战争, 密切联系和发动群众, 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策略, 浴血奋战, 与敌周旋, 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日军力量, 谱写了一段英勇抗战的壮丽诗篇。

## 一、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成立和发展

鉴于香港要塞要冲的战略地位, 日本觊觎已久。为实现其南进计划, 彻底切断国际援华运输路线, 迫使当时国民政府屈服投降, 打通南亚及印度洋通道, 日本军部制定《对南方施策纲要》, 一个重要要点就是侵占香港。其实对于日本军部意欲侵占香港的军事动向, 中国共产党人早有预判和事先准备。1941年11月下旬,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即接到正在香港开会的政委尹林平的指示: “作好应变的准备, 一旦战事发生, 立即派部队进入港九地区,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sup>①</sup>1941年12月8日, 日军进犯香港伊始,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 于12月9日派遣一

**作者简介:** 李际卫,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sup>①</sup> 柳卓楠: 《东江纵队在香港有个独立大队 浴血奋战三年零八个月》, 2021年7月15日, [http://news.ycwb.com/2021-07/15/content\\_40140926.htm](http://news.ycwb.com/2021-07/15/content_40140926.htm), 2021年10月25日。

部分兵力进入香港新界元朗地区活动；12月11日派遣第三大队并抽调第一中队和惠阳短枪队部分人员组建的新短枪队也同时挺进到香港西贡半岛地区。随后这三支队伍合并重组为武工队性质的抗日武装力量，成功在香港九龙新界地区开辟新的敌后战场。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挺进香港九龙新界地区的有近100人，他们坚持游击战运动战正确方针，在香港敌后战场进行游击战争，如同一把尖刀插入日军心脏地带。1942年2月，为加强香港九龙新界地区敌后战场抗日武装力量的集中统一领导，上述各支队伍统一编列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西贡黄毛应村教堂宣告成立。组织上任命原香港工人蔡国梁任大队长，原香港青年知识分子陈达明任政委。下辖短枪队、长枪队和海上队。全大队有600多人，人员主要由工会社团等进步青年和香港爱国民众组成。1943年6月，港九独立大队将活跃于香港各地区的小队统一编列为西贡中队、沙头角中队、元朗中队、大屿山中队、海上中队和市区中队等6个中队。至此，港九独立大队从最初建立时的100余人，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多个中队、人数规模达800多人的抗日武装队伍。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为“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作为分支仍然隶属，一直坚持战斗在香港青山碧水南海之间，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30日，英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夏悫率军舰抵达香港，香港重新被英国控制。1945年9月28日，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奉命一周内撤出香港九龙新界地区，向香港九龙新界同胞发表《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撤退港九新界宣言》。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大部分北上山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一部分留在香港坚持地下斗争，还有一部分就地复员。

## 二、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抗战贡献

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香港作为联系东亚和南亚通道的堡垒作用，深度全面控制香港，日本方面任命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港督，以军警宪兵特务等为军事力量钩织殖民统治网，在军事上强力镇压和“地毯式扫荡”抗日力量，在经济上大肆掠夺香港财富和各方资源，在文化上诱捕迫害爱国知识精英和奴化普通百姓，香港进入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日军进犯侵占香港初期就深入九龙、西贡和新界等地区，充分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肃清当地土匪恶霸，收集英军遗弃武器弹药，组建抗日革命队伍，为后期顺利开展游击运动斗争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武器储备。

### （一）开创城市近郊及海上游击运动战

相比于内地城市及广阔农村，港九地区城市化程度较高，地域狭小，纵深回旋难度较大，且面临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特点，港九大队坚持游击运动战总体战略，坚持市区与郊区配合，陆地与海上结合，交通站点与情报信息融合，采取机动灵活运动战术，打巧仗，打小仗，声东击西，四处出击，创造性地开展城市近郊及海上游击战。

港九大队充分发挥短枪队高机动优势，主动袭击日军，拔除日军哨所，屡屡建得战功。西贡中队沙田短枪队以观音山、吊草岩一带为根据地依托，带领短枪队在狮子山下一次短兵相接的遭遇战中全歼日军一个分队，联合自卫队在窝塘村发动夜袭，全歼日军一个工兵分队，拔除牛池湾等地的日军哨所，潜入奇袭香港启德机场炸毁飞机油库。沙头角中队林冲短枪队，袭击在吉澳岛的日军，拔除元洲仔码头日军哨所，击毙汉奸沙头角伪区长。港九传奇英雄人物、短枪队杰出代表刘锦进，原名刘黑仔，西贡中队沙田短枪队副队长，多次乔装进入九龙闹市区，处决日军九龙宪兵司令部汉奸翻译，设伏活捉日本高级特务东条正芝以及深入腹地营救美军飞行员克尔等，令日军闻风丧胆。

因香港毗邻南海，日本方面将香港作为其海上交通运输线的重要中转站和物资补给站。为破坏日军海上交通运输线，港九独立大队将原护航队扩编为海上中队，练习跳船、摇橹升帆、投掷鱼炮等基本技能，在九龙西贡沿海、大鹏湾以及大亚湾等海域开展海上游击战，被誉为中国的“土海军”，为1949年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正式成立海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创造出的一套木帆船歼灭机动船战术战法。海上中队主要作用是袭击破坏日军海上交通运输线，击沉损伤日军船只，截获日常货运物资解决东江纵队总部所需短缺，保护游击队自身海上运输安全及商旅客商往来安全。海上游击战持续三年多，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战绩，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经历十多次大海战，击沉俘获日军船只近50艘，击毙俘虏日伪军近240余人，缴获轻重武器若干，截获大批日常物资。

### （二）营救中国文化界精英及爱国民主人士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1年日军进犯香港之前，由于香港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暂时免遭战火影响，一时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避风港”。内地大批文化界精英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疏散迁徙到香港，并由此掀起抗日文化运动热潮。香港成立了大批进步团体组织，出现了大量进步出版物。如由茅盾同志主编的进步刊物《文艺阵地》上发表的张天翼创作的《华威先生》和姚雪垠创作的《差半车麦秸》，并被译介到英美苏等国家，成为中国抗战艺术的可喜收获。将中国抗战信息广泛传播给国际社会，香港抗日文化运动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形式和重要内容。

日军进犯侵占香港后，立即封锁港岛码头、铁路、公路等对外交通线，并开始大肆诱捕迫害文化界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茅盾、邹韬奋、何香凝、夏衍、梁漱溟、柳亚子、沈志远等文化界名人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仍然滞留港岛，处境非常危险。在此危急时刻，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急电指示，要求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务必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不惜任何代价，抢救被困港岛的文化界精英、爱国民主人士，将其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大后方地区。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作为当时香港唯一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坚决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面对极其艰险复杂的严酷环境，周密谋划部署，与时间赛跑，联合中共香港地下组织同志，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迅速与营救名单上所有人员取得单线联系并立即组织他们转移，摆脱日伪特务跟踪监视，按照既定东西两线分头分批营救方案，秘密组织其从港岛离开乘船过海，并护送到佐敦道等地下交通站点，再转送至后方东江纵队阳台山、坪山等抗日根据地。

经过近6个月时间转移营救，800余名文化界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全部安全转移至大后方安全地带，无一伤亡，无一被捕。这一生死营救行动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邹韬奋亲笔题写“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赞誉东江纵队的抗日贡献，夏衍则对此评价道“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sup>①</sup>

### （三）开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号召建立国际国内两条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在香港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成为中国全面抗战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内容。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情报合作，配合英美盟军共同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取得全面胜利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香港敌后战场武装力量，它把开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积极与盟军合作，收集日军重要的军事情报，营救被俘被困的盟军官兵及国际友人。美军第14航空队意识到港九独

<sup>①</sup> 朱姝璇：《烽火旌旗：香港抗战中的港九大队》，2019年6月9日，[http://www.mod.gov.cn/education/2019-06/09/content\\_4843290.htm](http://www.mod.gov.cn/education/2019-06/09/content_4843290.htm)，2021年10月25日。

立大队在香港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主动联系接洽东江纵队，提出建立联合电台，收集日军情报等合作事宜。港九独立大队按照中共中央和东江纵队指示精神，组织精干力量，成立大队、中队和群众层级情报网络，派遣精通英语、日语的同志打入驻港日军宪兵总部，渗透到行政要害部门，取得大量有价值军事情报。如驻港日军军用地图副本、香港日军海防图示及重要设施图样、广九沿线日军工事要塞图解等。鉴于港九独立大队提供的情报信息，在华美军总部对其工作盛赞有加。

同时，港九独立大队积极参与营救盟军官兵及国际友人，建立国际工作小组，在香港九龙等地设立秘密联络点，冒着极大的危险积极展开营救行动。据不完全统计，先后从香港营救英国、美国、苏联、印度、荷兰等国官兵及侨民友人近100余人，其中包括美军第14航空队飞行员克尔中尉、英军赖特上校、香港警司汤姆逊等。克尔中尉专门就从轰炸启德机场被击中逃生到被营救的过程，出版成书《克尔日记》，较为真实还原当时的营救情况，并被陈纳德将军选为教学案例，指导飞行员学会如何寻求中国游击队的帮助。英国皇室还特地为港九独立大队国际工作小组组长黄作梅颁发荣誉勋章，表彰其为英军服务团营救战俘所做的重要贡献。

### 三、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红色抗战文化精神

文化是连结历史、传承未来的最好载体，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绵五千年从未中断，在于中华文化其内在的“起承转合”功能。同样地，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香港同胞，历来有爱国爱港的优良传统。近年来，一小撮乱港分子罔顾“一国两制”下香港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起所谓“占中”及反修例风波等一系列乱港行为，严重扰乱香港经济社会秩序。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审时度势，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为根本出发点，推动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依照宪法和基本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依法设立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提升特区政府治理效能。因此，充分挖掘香港本地红色文化精神，特别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辉煌的红色抗战文化精神，对于切实提高香港特区政府治理效能、国情教育推广开展和增强香港同胞特别是香港青少年国家意识具有巨大促进作用和最直观的真实情感体验。

#### （一）粤港两地同胞同仇敌忾，彰显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

粤港两地同根同源，血缘相近，语言相通，从大革命时期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工人大罢工到抗日战争时期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敌后战场坚持三年多时间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历史脉络上一脉相承，都是为了求得民族解放和国家救亡图存。粤港两地同胞共同抵抗外辱、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伟大斗争，充分体现了香港同胞与内地同胞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我们从港九独立大队的人员组成来看，港九独立大队大队长和政委均为香港本地居民，吸收和发展新队员也是以香港本地工人、海员以及爱国学生为主，这充分彰显了香港同胞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从港九独立大队的斗争方式来看，它遵循中共中央关于敌后战场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策略，紧紧依靠和发动香港人民，以东江纵队所在的南粤大地为广阔腹地，创造性地开展城市近郊和海上游击战。朱德总司令在中共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争》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港九独立大队作为东江纵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用鲜血凝结、铸就了伟大的东纵抗战精神，成为激励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的强大原生精神动力。



## （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

港九独立大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坚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克服各方面的困难，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充分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不计前嫌，摒弃偏见，营救被俘被困或遇险英美盟军。抗战全面爆发后，特别是1938年广州沦陷后，英国政府要求港英政府禁止从香港对华出口武器弹药。法国政府推翻同中国签订的战备物资允许过境协议。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英美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纵容绥靖妥协的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sup>①</sup>明确要求中共南方局在华南地区争取与英美合作组织游击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港九独立大队组织精干力量，成立特别国际工作小组，切实加强同英美盟军团结合作，提供大量精准情报，并主动配合其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和积极的贡献。

## （三）维护国家统一大局，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国家统一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孜孜不倦的理想目标，大一统观念是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深层文化底蕴。从中华民族整体历史来看，统一是历史大势所趋，是凝聚人民力量的源泉，是创造盛世辉煌的保证。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14亿多中国人民包含香港同胞在内共同的期盼和梦想。港九独立大队坚持在香港敌后战场不畏强敌、浴血奋战，并且在抗争过程中队伍由小变大、由弱到强，成为香港抗战的中坚力量。辉煌历程已经证明，港九独立大队是抗战时期插入香港日军心脏的一把利刃，是打不垮、压不断，“扫荡不了”“消灭不了”的人民武装力量。历史已然证明，香港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联合力量团结一致抗击一切外来侵略。“一国两制”方针作为和平解决我国港澳历史问题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内部统一问题提供了特色思路和道路选择。当前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是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大局，依法合规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有理由相信，香港人民可以在“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中确保行稳致远，创造出更多维护国家统一大局的荣光。

## 四、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红色抗战文化的传承发展

文化的传承发展按照时间纵向轴线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任何一段刻意被隐藏的历史文化的缺失，都将造成后来者该段历史记忆的空白。因此，对于港九独立大队红色抗战文化的传承发展在当今香港社会就显得尤其重要。承上所要展现的就是港九独立大队坚持抗战的历史事实，启下所要期望的就是填补香港青少年对香港抗战历史的空白记忆和模糊认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抗战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是事实清楚的，毋庸置疑的。然而，直至香港回归前，半个世纪时间里，对于曾经坚持英勇作战，配合英美盟军建立情报网络系统，深入集中营营救英军战俘的港九独立大队，港英政府却一直不承认其存在的事实，不给予港九独立大队应有的历史地位。同时，长期以来因缺乏实体抗战纪念馆，更使这段历史成为不少香港青少年历史认知的模糊地带。

港九独立大队代表着香港抗日战争历史的鲜活案例，是香港人团结一致凝聚合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共同历史记忆，是香港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段峥嵘岁月，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段香港人民奋勇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光荣历史应成为香港历史文化的核心价值内容。香港回归后不久，香港特区政府于1998年12月在香港大会堂庄重地举行东江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6页。

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烈士名册追认仪式，特首董建华亲自将首批已确认的115名烈士名册安放在烈士纪念龕内。香港特区立法会立法通过确认港九独立大队的积极贡献和历史地位，并依据相关战争抚恤条例，给予健在的队员、烈士家属应有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为了纪念港九独立大队和香港居民对抗战所作的历史贡献，2018年，香港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新界社团联会和新界青年联会等多个香港民间团体组织联合倡议设立专门的首间抗战纪念馆，抗战纪念馆将被命名为“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坐落于香港新界沙头角南涌罗家老屋。罗家老屋是港九独立大队进入香港后的第一个落脚活动点和秘密交通站点，是香港为数不多可以见证香港抗战历程的建筑物。根据计划，抗战纪念馆将于2021年底完成布展并正式对外开放，主要内容分为“港九大队在沙头角”“海上中队的抗日斗争”“香港抗日第一家”三个部分，充分展示港九独立大队的事迹和贡献。

香港抗日战争历史是我国抗日战争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近年来陆续公布香港大浦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和西贡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为国家级抗战遗址，这两处抗战遗址均与港九独立大队密切相关，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题写“抗日英烈纪念碑”碑文，基座碑志记载港九独立大队历史，纪念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英勇牺牲献身的港九独立大队士兵和香港人民，承载了香港抗日战争的情感纽带和历史记忆。我们以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为例，乌蛟腾村是位于香港新界东北的一个大村落，是港九独立大队沙头角中队的根据地之一，英雄的乌蛟腾人民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和爱国爱港的动情故事。据史料记载，日军在侵占香港期间，围攻乌蛟腾村10余次，其中1942年9月25日，日军包围乌蛟腾村，强迫乌蛟腾村民缴械并要求供出港九独立大队队员身份，包括村长在内的9位乌蛟腾村民不惧死亡威胁，不怕水灌火烧，最终壮烈牺牲。村民为缅怀烈士开始筹建纪念碑，1951年10月，建成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成为香港第一座镌刻红五星的纪念碑。2009年12月，迁建于现址乌蛟腾村新娘潭路边。

香港特区政府有责任将香港抗战遗址开发串联成香港抗战史迹旅游线，兼具爱国主义教育和旅游观光功能，充分发挥和合理利用历史遗产本应有的作用，增强香港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这是一项任重道远、久久为功的工作，需要特区政府长期坚持，并将其融入到香港北部都会区长期规划中去，开发出更多抗战历史遗址新项目。香港爱国爱港社团有义务继续秉承爱国爱港优良传统，以“七一”“十一”等重大时间节点为契机，开展富有成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让港九独立大队红色抗战基因世代传承下去。

责任编辑：郭周静

# 明清云南少数民族诗词中的“国家认同”研究

高云翔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国家认同”是指国民对其国家的归属感、忠诚感和自豪感。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历朝历代都有内地汉人与各少数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 在国家认同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云南少数民族同胞自古就有“慕义向化”的倾向。明清时期, 云南少数民族诗人在汉语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于诸多作品中流露出了对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强烈认同, 充分发挥了文学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重要作用。挖掘云南少数民族诗词中的中国国家认同, 将其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文化资源,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 云南少数民族诗词; 国家认同; 政治认同;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1) 04-0109-10

“国家认同”概念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出现的, 是晚近兴起的政治文化概念, 但这并不代表历史上没有关于认同方面的实践和经验。在清王朝覆亡以前的传统中国, 历朝历代都有内地汉人与各少数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 并且形成了有关认同方面的经验和智慧, 故而传统与现代之间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分隔开来。许纪霖教授认为, 在古代中国, 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 是通过文明的认同和王朝的认同实现的。<sup>①</sup>云南民族众多, 历史上多民族心向中华, 具有丰富的“国家认同”历史文化资源。从汉代《白狼王歌》中的“慕义向化”<sup>②</sup>到明清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创作繁荣, 云南少数民族同胞表现出了强烈的华夏文化认同和中国国家认同, 为当今时代的“国家认同”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资源。

## 一、文学在构建“国家认同”中的作用

“国家认同”是一个政治文化概念, 指国民对其国家的归属感、忠诚感和自豪感, 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 而是后天生长于一定人文环境中, 受环境熏陶和影响, 进而自然形成的一种认同感。换言之, “国家认同”是人在后天社会化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该建构过程无疑是复杂的, 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文学在其中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价值。

文学作为人文科学中最美丽、温润的部分, 对美化人生、完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是一种重要精神资源, 使人的情感得到丰富和提升, 精神世界得到滋养和美化, 并转化为美化社会的精神

**作者简介:** 高云翔,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明清云南地方文学。

① 许纪霖:《国家认同与家国天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29—32页。

②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6页。

力量,让人和世界变得更美好。

在我国,仁人志士笔下对祖国的描写从未衰竭,岳飞呐喊精忠报国,陆游期许王师北定,毛泽东赞誉江山多娇等,不胜枚举,这些文学作品背后渗透着创作者对华夏热土的深切情感,不断温润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文人笔下壮丽山河的书写,保家卫国的热血,家国情怀的倾诉都是国家认同的具体表现,并能够帮助这种认同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在潜移默化中持久深远地巩固和加强国家认同建构。

自古以来,天下一统是中国人心中固有的观念,统一带来秩序与和平,分裂意味着战争与杀戮。对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央王朝因地制宜,实行土官自治的土司制度,其根本方式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土司制度的前提是国家认同,即对当时中央王朝的认同,彭福荣在《中国土司国家认同的逻辑起点与利益法则》<sup>①</sup>中有过详细的论述,主要强调了土司从政治经济利益出发寻求国家认同,而云南明清时期的宁州彝族土知府禄厚、禄洪,丽江纳西族土知府“木氏六公”,其诗词作品中表现认同中央政权、抵抗分裂、主动与外来文人交游学习,接受儒家忠孝文化的内容占有相当的比重,这表明文学使得土司家族逐渐由利益驱动下的国家认同走向精神与文化归属下的国家认同。从中不难看出文学作品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创作者自身的“国家认同”程度的变化,对国家认同的建构有着反馈与指导作用。

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曾将传统国家认同解析为三个层次:一是对在位君主忠诚;二是对一姓君王和王朝的认同;三是对超越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中国”的认同。<sup>②</sup>明清时期,云南文学崛起,“以汉语为载体,以传统诗文为主要形式的创作,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并在保持自身地域特点的同时,实现了与华夏传统文学相互融合”。<sup>③</sup>在彼此交融的过程中,云南少数民族诗人对所处国家表现出了强烈的归属感、忠诚感和自豪感,立足文学创作实践,其作品中流露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认同,均是根植于少数民族同胞内心世界国家认同感的外化。

## 二、云边不泯家国念,一腔热血荐轩辕——云南少数民族诗词中的政治认同

广袤的华夏大地为其住民提供了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农耕文化是思考中国历史问题的重要基点之一。故而各民族只要定居下来,均可“耕王之野,立王之廷,逐渐归化,共同走向安全和谐的正道”<sup>④</sup>。中原王朝对“远人来归,莫不欢迎而登诸衽席,教化而‘中国之’”<sup>⑤</sup>。在如此开放包容的环境下,周边少数民族纷纷主动归服,受其教化,在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感日益增强。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曾记载云南少数民族领袖归化汉王朝之事。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任期间“宣誓汉德,威怀远夷”。<sup>⑥</sup>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渴望改变自身“贫薄”面貌的云南各少数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使其纷纷“闻风向化”“慕化归义”。少数民族领袖白狼王主动归化后曾作《白狼王歌》三章(《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表达了当时少数民族领袖对

① 彭福荣:《中国土司国家认同的逻辑起点与利益法则》,《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第32—38页。

② 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第187—206页。

③ 孙秋克:《明代云南文学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④ 周善甫著:《云南文史书系·大道之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9—10页。

⑤ 周善甫著:《云南文史书系·大道之行》,第9—10页。

⑥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六,第2854页。

中原王朝的认同和赞颂。“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吏译平端，不从我来”“蛮夷贫薄，无所报嗣。愿主长寿，子孙昌炽”等词句简洁有力，不仅表述了白狼等部落对中原王朝的归附之意，也道出了他们赞同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共赴强盛的心声。“涉危历险，不远万里。去俗归德，心归慈母”“携负归仁，触冒险陔。高山岐峻，缘崖礞石”<sup>①</sup>则表明少数民族部落视汉朝为慈母，心向往之，不畏艰险，坚决归化，正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集中体现，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与政治意义。<sup>②</sup>《白狼王歌》本为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创制，后转译为汉语，清人赵联元在《丽郡诗文征》中认为其“夷言”是古摩沙（纳西族）语。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认为“此说可取……白狼语与纳西语最相近，或即白狼语为纳西古语也”。<sup>③</sup>据此方先生认为白狼王的族属是牦牛夷支系，古摩挲族，即今纳西族。

明代云南丽江纳西族土司木氏一门为白狼人之后裔，继承了其远祖的优良传统。《明史》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sup>④</sup>木氏一门历来对汉文化重视非常，除了家中有藏书楼“万卷楼”外，还不远万里至江南汲古阁刊刻书籍，同时与汉族文人有着密切交游，曾出现过几代作家群，后世称“木氏六公”，今有大量诗作存世。六公之长木泰，在历代土司中首倡诗书，创兴教育，推崇文雅风尚，同时也是纳西族用汉文字写格律诗的第一人，亦是丽江土司中有汉文诗作传世的第一人。其诗作今存一首《两关使节》：

郡治南山设两关，两关并扼两山间。霓旌风送难留阻，驿骑星驰易往还。

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折梅寄赠皇华使，愿上封章慰百蛮。<sup>⑤</sup>

“两关”即云南丽江坝南之东关、西关，是进入纳西族地区的两个要塞。“使节”本指古卿大夫受聘于天子、诸侯时行道所持的信物，此处代指朝廷的使者。首联在对“两关”地理位置的描写中，用一个“扼”字充分说明了郡治两关的重要性。如此咽喉要道，本应防备严密，难以逾越，但对于“霓旌”“驿骑”则是“难留阻”“易往还”，巧妙地表达了纳西族人对朝廷使节往还的盼望与欢迎。颈联则通过“凤诏每来”与“鹤书不到”一正一反的对比，表达其愿意为朝廷效力的忠诚与决心。最后以折梅赠使，求慰百蛮作结，直接反映了其与中原王朝亲密往来。全诗用歌颂语言，表忠献诚，足见当时纳西族对朱明王朝的强烈认同。

木泰之孙木公，一生笃好汉语诗歌创作，与永昌张志醇及其子张愈光（即张含）为文字交。因其与张含交谊尤深，其诗也通过张含而得到了杨慎的赏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木公“尝以诗求正于永昌张司徒及其子愈光，又因愈光以质于杨用修”。<sup>⑥</sup>杨慎曾选木公诗114首，题名为《雪山诗选》，且为之序。诗选首卷中的《塞上曲》风格豪迈，境界阔大，与盛唐边塞诗的风格相似：

刁斗深夜鸣，烽烟报虏营，将军不惜死，跃马宝刀明。<sup>⑦</sup>

“刁斗”是古代军中用具，形状大小似斗，白天用作炊具，夜间用以警戒报时，是边塞诗中的典型物象，前人诗作中多有提及，如高适《燕歌行》“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陆游

①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六，第2856页。

② 陈友康：《以中华文化的理念、智慧和气度引领人类走和平和谐进道路》，《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10页。

③ 方国瑜：《〈白狼王歌诗〉概说》，载于《云南史料丛刊》，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5页。

④ 张廷玉等撰：《明史·列传第二百二》卷三百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00页。

⑤ 赵银棠辑注：《纳西族诗选》，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页。

⑥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6页。

⑦ 木公：《雪山诗选》，《云南丛书》第47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4989页。

《关山月》“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等。木公创作时本能地将自我定位为戍边将士，为守卫疆土而跃马宝刀，不畏牺牲，国家认同感已深植其内心，不可动摇。木公早年曾辞让爵位，吟咏山林，中年时才承袭土司，统帅边疆。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四“木公恕”条下云：“恕卿韶年让爵，隐于玉龙山南，亭曰翠雪，坞曰丹霞，堂曰一镜，种桃艺竹，环以山松，又起迎仙之楼，日以吟咏为事。中年将兵却敌，功在边隅，永陵有御书之褒。”<sup>①</sup>对于“御书之褒”，木公亦作《嘉靖恩赐“辑宁边境”四字》以应，碍于其时代的局限，虽不免有应制谀皇的嫌疑，但也从侧面体现了木公对朱明王朝的拥护与认同。

除了丽江纳西木氏外，滇中宁州禄氏土司对中原王朝亦忠心耿耿。崇祯二年（1629）冬，皇太极直逼北京，时任土知府禄洪万里勤王，入卫京都，于途中著成《北征集》一卷，礼部尚书董其昌、吴中名士陈继儒皆为之序。陈序云：“庚午建酋入犯，王中丞檄兵入卫。霄宾动色曰：‘君父有警，臣子安能束手坐视，赴汤蹈火亦所不辞。’提三千精锐，裹粮披甲，三月出滇，六月而抵都。”并称禄洪“年少多胆”“真旷世磊落伟大男子”<sup>②</sup>。禄洪勤王之役的诗作，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家国之思与爱国情怀，如《春日北征途次有怀》：

千山迷故国，万里赴都城。夜夜闻鸡舞，朝朝祭马行。

鸟啼乡思动，花拂剑光生。一洗腥膻净，齐歌奏凯声。<sup>③</sup>

该诗作于诗人北上勤王的途中，开篇便点名了此行的意义，“千山”“万里”指此行之过程，“故国”“都城”则是此行之起点与终点，一“迷”，一“赴”，将两个实体意象紧密联系，饱含了诗人无尽感慨，并开拓了下文。也正是因为诗人对“都城”所代表的国家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才不辞万里奔赴，并承受“闻鸡起舞”的辛劳。之后，诗人笔锋一转，巧妙引入“乡思”，在一种看似矛盾的心态之后，以一句“花拂剑光生”再次打开境界，隐含了此次远离家乡是为了更宏大的目标的意思。最后预言此次勤王定能为国一洗腥膻，齐奏凯歌，既表达了禄洪对此行的必胜信念，也升华了诗歌意境，表现出禄洪为国尽忠的赤胆之心。全诗既有军人的风度和气势，又不乏文人的细腻与情思，二者水乳交融，入情入理，字里行间都流露着诗人的爱国情怀。禄洪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土知府，时刻谨记家乡与祖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卫国即卫家”这一思想在其诗作中得到了直接体现。

“官历二十政，宦游三十秋”是古代官员仕宦生涯的真实写照。相比于木氏、禄氏等地方土司，外出宦游才是大多数云南士子实现人生价值的出路。明嘉靖年间的回族诗人孙继鲁，为人耿介，《明史》称其“所至以清节闻，然好刚使气”<sup>④</sup>，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晋升为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在任期间因山西雁门一带的边防问题，与当时的宣大总督翁万达发生了争执，加之其奏疏言辞激愤，最终惹得嘉靖皇帝不悦：“帝方依万达，怒继鲁腾私书，引往事议君上。而夏言亦恶继鲁，不为地，遂逮下诏狱。”<sup>⑤</sup>狱中，孙继鲁依旧为国为民，不改其志，与同狱的御史杨爵意气相投，互相唱和，其《狱中》“忧国忧民意自深，谏章一上泪沾襟”一句，诗人虽身陷囹圄而不忘己志，但因壮志难酬而潸然落泪的情景跃然纸上。而后诗风一转，“男子至死

① 朱彝尊著、黄君坦校点：《静志居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775页。

② 禄洪：《北征集》，《云南丛书》第2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523页。

③ 禄洪：《北征集》，第11526页。

④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385页。

⑤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四，第5385页。

心无愧，留取芳名照古今”<sup>①</sup>一句，化用文天祥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将诗人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表现得酣畅淋漓，慷慨忠义之气溢于言表。诗人视死如归，无愧天地，慷慨激昂，令人动容。孙继鲁此次入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直接原因是为巩固朱明王朝的边防。清人师范曾客晋两年，并亲自“核其营堡，考其山川”，认为“清愍之奏不虚也”<sup>②</sup>。可见诗人为国家固守边防确是殚精竭虑，其屡次谏言而又言辞愤激的背后，实是诗人满怀的一腔报国热血与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这来自于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和高度的国家认同。

清康熙年间云南诗人张仕敬出身楚雄禄劝彝族望族，少好读书，举云南武乡试，后参与平定乌蒙法夏伙目禄天佑之乱，军功卓著，然性情纯然儒者，为人“深于学养，耻言功……好宋儒周、邵、程、张之书，探讨至忘寝食”<sup>③</sup>，在诗作《赠三家村老人》中张仕敬描绘了一派和平、自由、快乐的生活场景：

圣境出于中华，方圆三五人家。住一生长安宅，看四时不谢花。

壶内乾坤活计，杯中日月生涯。欲问何行何止，往来自在烟霞。<sup>④</sup>

此作是少数民族融入国家，获得国家保障，拥有和谐安宁生活的真实写照。诗中的“一生长安宅”“四时不谢花”，人们饮酒谈天，自在往来的依靠是“中华”，强调了国家对个人生活的保障作用，诗人将其称为“圣境”，致以最高崇敬，彰显了高度的中国国家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sup>⑤</sup>

在上述诗人笔下，忠君与爱国差不多是可以互相同等的概念，对皇帝个人和对本王朝的归属与忠诚在大多数场合是一致的，属于姚大力先生对传统中国国家认同解析的前两个层次，其本质上是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存在的评价和情感，客观上体现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具有一定历史价值与政治意义。

### 三、掌故典籍史为鉴，前贤历览了心间——云南少数民族诗词中的历史认同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自汉以来，云南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历史的长河中双方交织交融，拥有着共同的民族记忆，云南少数民族诗人对此也有着深刻认知。

明代木氏家族镇守滇西北，在促进其本族兴盛的同时，也为当地的稳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前文提及的纳西族诗人木公作为“知诗书好礼守义”的木氏土司子孙，亦辑宁边境，于诗作中时常抒发对先辈功勋的追慕并以此为志，《自述》诗云：“汉唐宋元世，历宦岂须夸。腰系黄金重，诚心报国家。”<sup>⑥</sup>诗作首句远溯于汉，追述远祖白狼王之事，今历经唐宋元，对中原王朝之忠诚却未曾动摇。后句“腰系黄金重，诚心报国家”一句通过讲述明太祖朱元璋曾赐其先祖金带（诗后有注云“洪武恩赐‘诚心报国’金带”）故事，表明了木氏世受国恩，必将诚心报国的决心。与《自述》相比，木公的《述怀》更为直接地体现了木公对其先辈“诚心报国”的效法及其自身作为一方首领的风采与气度：

丽江西迤西戎地，四郡齐民一姓和。权镇铁桥垂法远，兵威铜柱赐恩多。

① 鹿垵撰：《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孙继鲁传》，方树梅纂辑、李春龙等点校《滇南碑传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② 师范：《滇系》，《云南丛书》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192页。

③ 檀萃撰：《张仕敬传》，方树梅纂辑、李春龙等点校《滇南碑传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④ 师范：《滇系》，《云南丛书》第11册，第5496页。

⑤ 陈友康：《以中华文化的理念、智慧和气度引领人类走和平和谐进道路》，第12页。

⑥ 木公：《雪山诗选》，第24993页。

胸中恒运平蛮策，阃外常开捍虏戈。忧国不忘弩马志，赤心千古壮山河。<sup>①</sup>

诗的前半段木公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讲述了丽江府与中原的渊源：其府近西域乌思藏，故云“西迤西戎地”；而后一句中的“和”一语双关，在讲明其四州之地纳西人的大都姓“和”的同时，也暗含其领内拥有和平的环境，人民得以免遭战乱，安享太平之意。其权辖之地有“铁桥”横跨金沙江，该桥可上溯隋朝，传为史万岁、苏荣所建，故曰“垂法远”，以示与中原交流之源远流长，而今则又因“嘉靖二十年为大庆事，择选丽兵征交，恩赐白银十两”<sup>②</sup>故云“赐恩多”，表达对国家政权的拥护认可。木公通过对丽江府地理位置、风俗民情、历史遗迹以及国朝大事的书写，将丽江与中原紧密勾连，不分彼此，表达出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而后，将笔墨落实到自我主观情感的抒发，表示自己腹有良策，手持兵戈，忧国思君，一片丹心。全诗气势铿锵，孔武宏大，打破时空格局，在主客观的统一中展现了木公高度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

清代白族诗人师范生于滇中，熟读西南文献，历览华夏典籍，擅长以史入诗，其怀古咏史诗中对华夏历代人物的书写不胜枚举，先后创作咏史诗一百零八首，集成《舟中咏史诗》，其余零散登临怀古，读书咏史之作不可尽数。其笔下诸多历史人物中着墨最多者，当为诸葛武侯，有《武侯祠》《诸葛武侯》《弥牟镇览武侯八阵图》等十余首诗作。诸葛亮天纵奇才，勤劳国事，耿耿忠心可鉴日月，谦恭廉洁垂范后人，倍受历代文士的尊敬与歌颂，从而留下了大量吟咏其人其事的诗歌，或歌其高风亮节，或羨其得遇明主，或叹其壮志未酬，师范所作亦同此列，如《卧龙岗谒诸葛武侯祠》中的“王业开三顾，天威壮七擒”（其一）；“剧怜星落后，仇国论频闻”（其二）；“才华三代少，忠孝一家同”（其三）等句，该组诗为师范第一次赴都会试，于途中折返拜谒所成（其四云“为拜先生墓，回车间草堂”<sup>③</sup>）。由于诸葛亮曾挥师南征，师范在吟咏家乡山川风物时常引其事迹以证云南与中原间的交往交流源远流长。于史学巨著《滇系·杂载》中，亦将“诸葛亮南征擒孟获”与云南地方传说“阿南守贞殉夫”“慈善夫人报夫殉国”<sup>④</sup>同列为“火把节”缘起之由。师范心中对华夏先贤之敬仰与推崇可见一般。

此外，师范还为其家乡弥渡作《建宁杂诗》十二章，分别从历史、物产及人文三个角度对故乡弥渡进行了全面书写，自言“词虽不文，论必有据，惟冀采风者审焉”。<sup>⑤</sup>其前五首诗作以史为序，在历史的叙写中抒发云南与中原王朝的归化与认同。其一云：“建国知从孝武来，褒蒙节亦此中持。天威丞相堂堂在，汉德南荒处处贻。”追叙两汉时代云南与中原王朝建交，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等历史事件，尾句“彩云桥下潺湲水，一样朝宗去不疑”既实写弥渡彩云桥下向东的潺湲流水，亦表达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同胞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其二“十三传后多反复，一百年前有甲兵”句，记述南诏国十三代国王对中央政权态度反复不定，时顺时叛的历史，并由此引出百年前吴三桂建立吴周政权，妄图脱离中央王朝而独立的晚近历史。后句“四卫规模余习气，六街闾阖沸人声”则回顾明朝云南归于中央建立卫所时的繁荣景象，诗人由此表达了对分裂割据的批判和对大一统的坚决维护。其三“崇本死怜蒙建极，扰边深恨老虔陀”，其四“玉斧画残抛大渡，革囊济罢接三秦”等句分别叙述了唐宋元时期天宝之战、宋挥玉斧、元灭大理等影响云南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大事件。诗作最后以“五方占籍称繁盛，才与中华气味亲”作结，表现了对中原华夏的

① 木公：《雪山诗选》，第24994页。

② 木公：《雪山诗选》，第24994页。

③ 师范：《师荔扉先生诗集》，《云南丛书》第27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180页。

④ 师范：《滇系》，《云南丛书》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170页。

⑤ 师范：《师荔扉先生诗集》，第14307页。



认同。诗人纵览古今，既写云南地方历史传说，亦述云南与中原各王朝间发生的历史事件，试图证明二者虽偶有疏离，但终归一统，在对历史的叙述中表达了云南地方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归顺。<sup>①</sup>

师范笔下的“天宝战争”是云南与中原关系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是役南诏联合吐蕃，大败唐军于西洱河，并与吐蕃结盟，受其册封。战后南诏王阁罗凤于太和城中立“德化碑”，其碑文叙述了南诏、唐朝和吐蕃间的关系及历次战争的缘由经过，痛陈迫于唐将淫威而不得不起兵反唐的原委，表明了叛唐的不得已及期望修好附唐的心曲。时光荏苒，“德化碑”随着南诏国的灭亡渐显残破，但南诏王阁罗凤的心迹依旧传承后世。大理白族士子董正官曾作《南诏碑》二首<sup>②</sup>，以追忆这位传奇南诏王。

铭心澡袂誓清波，寂寞荒碑对古河。立马斜阳听吊鸟，至今啁哳骂虔陀。（其一）

阁罗凤本承归义，赞普钟翻受伪名。毕竟忠言匡返正，不返天宝郑清平。（其二）

第一首诗一上来就描写了古河荒碑的苍凉之景，诗人立马斜阳，直言此碑为“铭心澡袂”之作，对南诏王阁罗凤蒙受屈辱，被迫反唐的心迹有着深刻认知，并巧妙利用群鸟啁哳之鸣指责此役的始作俑者张虔陀。据《旧唐书》记载：“迦独生细奴逻，高宗时来朝。细奴逻生逻盛，武后时来朝……盛逻皮死，子皮逻阁立。二十六年，诏授特进，封越国公，赐名归义。其后破洱河蛮，以功策授云南王……七年，归义卒，诏立子阁罗凤袭云南王。”<sup>③</sup>可见李唐王朝自高宗至玄宗对南诏都封赏不绝，而南诏亦归义中央，二者关系亲密，而《南诏德化碑》亦有“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sup>④</sup>的记载，此为“阁罗凤本承归义”之由来，董正官称“赞普钟”（吐蕃赐予阁罗凤的封号，其意为“赞普之弟”）为“伪名”，又引唐人郑回受任南诏清平官，反复规劝南诏返归中原李唐之事作结，如此书写一方面是回顾历史，说明南诏反唐情非得已，另一方面也是诗人心向华夏，视其为正统的体现。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史记》是第一部全国性的通史，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起统一的正统历史观，还第一次为少数民族列传，把少数民族作为封建国家整体的臣民载入全国性史书，这正是“华夷一体”思想的具体表现。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的汉化，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使中华整体观念得到强化和发展。<sup>⑤</sup>回顾云南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在诗人笔下对当地历史的追忆中，云南与中原虽偶有疏离，但终归一统，其更视华夏为正统，把自己当作中华的一份子，此即是对超越了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中国”的认同。

#### 四、滇川终归入海内，一脉共传相交辉——云南少数民族诗词中的文化认同

明清时期的云南文士群体逐渐壮大，同时大量内地文人入滇，也为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带来了丰富的诗词创作经验和写作素材。少数民族士人学习和接受华夏历史文化，并逐步将之与云南地方文化结合，造就了这一时期云南文学的繁荣景象。其中，汉语诗歌创作的成就尤为突出，其对平仄韵律的把握，意象典故的运用，以至于意境体式的效拟，无不彰显了云南少数民族诗人对汉

① 周锦国著：《明清时期白族家族式作家群研究》下册，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2页。

②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民间文学工作部编：《云南民族文学资料·第十四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26页。

③ 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80页。

④ 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整理：《南诏德化碑》，大理：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1979年。

⑤ 刘正寅：《交融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华夏民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3期，第84—94页。

文化的接受与认可。

明代白族诗人李元阳,诗文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尤其对于历史典故的运用如臂使指。他时而以“事典”入诗,用以奠定基调,抒发情感。如过申浦季子庙时,李元阳感于吴季扎之风骨,留诗《季子祠》为记,其中“天地徐君剑,江山鲁圣文”<sup>①</sup>一句,对仗工整,以“徐君剑”之典故(详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将吴季扎与孔圣人并举,既凸显诗人对其人格的推崇敬重,亦引入时空概念,使得诗歌境界大开。时而又于零星词句中用典,言简意赅而情意俱备,如《送冯丞》中“明年应再至,竹马看相迎”<sup>②</sup>句,转接自然,引《后汉书·郭汲传》之典,以说明冯丞为官清正,深得民心。此外,李元阳为避免叙事之作言语拖沓,曾连续用典,以典雅成章,如《哭杨修撰升庵》中,李元阳描述杨慎“忠而见谤”遭遇的诗句:“万死微存息,飘蓬魑魅投。肌残还有骨,绝徼事兜鍪。”<sup>③</sup>“万死”出自韩愈《通解》“虽万死犹有忠而不惧者”句,<sup>④</sup>取九死一生之意。“飘蓬”语自杜甫《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sup>⑤</sup>句,含身世漂泊之意。“魑魅”源出杜佑《通典》“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句,<sup>⑥</sup>本指害人的山妖鬼怪,此处蔑指陷害杨慎的奸臣。“绝徼”亦出自韩愈之诗,《湘中酬张十一功曹》“休垂绝徼千行泪,共泛清湘一叶舟”句<sup>⑦</sup>,指极远的边塞之地,此处指云南。“兜鍪”出自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的“年少万兜鍪”,用以代指士兵,此处指杨慎戍滇。如此密集的用典在李元阳的诗作中并不少见,如《寺庙楼瞰海》的“庞公隐”“阮籍叹”,《封岳台》的“圣谟歌大同”“万国共车书”等。繁复精准的用典,增加了诗作的情感厚度,扩张了诗歌的艺术境界,亦是李元阳饱读诗书,对古代文化典故烂熟于心的体现。

清代回族诗人沙琛,性喜读书,博学多才。《前题》中“副墨而洛诵,元冥亦景附。求马唐肆中,无乃类膠固。小成致道隐,大源力仰沂。惜日日斯新,驹隙悚闲度”<sup>⑧</sup>,八句诗均化用了《庄子》中的典故,包括《庄子·大宗师》篇:“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於讴,於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sup>⑨</sup>《庄子·田子方》篇:“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是求马於唐肆也。”<sup>⑩</sup>《庄子·齐物论》篇:“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sup>⑪</sup>《庄子·知北游》篇:“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sup>⑫</sup>沙琛引经据典,意在告诫弟子应注重学习方法,还要珍惜时光,莫等闲白头。全诗大量引用玄言,颇具谈玄说理之味,可见其对华夏先贤之论深以为然。同时,沙琛也善于从历代文学作品中引用言典,如《杂兴》其二:“授衣风信报初寒,时序萧疏柏叶丹。心化难凭三

① 李元阳:《李中谿全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076页。

② 李元阳:《李中谿全集》,第11080页。

③ 李元阳:《李中谿全集》,第11101页。

④ 韩愈:《通解》,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9页。

⑤ 杜甫:《赠李白》,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15页。

⑥ 杜佑:《通典》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5册),第687页。

⑦ 韩愈:《湘中酬张十一功曹》,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页。

⑧ 沙琛:《点苍山人诗钞》,《云南丛书》第28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697页。

⑨ 庄子著、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解》,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4页。

⑩ 庄子著、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解》,第535页。

⑪ 庄子著、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解》,第50页。

⑫ 庄子著、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解》,第570页。

日效，堂开不耐七丝弹。快逢南菊成秋兴，未厌青山向晚看。薄俸素餐家万里，伐檀真自愧河干。”<sup>①</sup>诗人引用《诗经·豳风·七月》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sup>②</sup>，以及《诗经·魏风·伐檀》的“坎坎伐檀兮，真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彼君子兮，不素餐兮”<sup>③</sup>等句，以感慨自己虽身负官职，却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由泾赴颖道中措费解嘲》则是其于赴任途中因路费拮据外出借钱时自嘲所作：“靖节粗疏仕不宜，看花容易别东篱。弦歌便可谋三径，那得先生乞食诗。”<sup>④</sup>其以陶渊明《乞食诗》自比，贴切地书写了自身处境的窘迫及渴望隐居的志向。

隋唐以降，科举成为了大多数读书人仕宦的必由之路。明清时期，云南在军事体制、行政建制、社会文化等方面得到了长足发展，云南各民族中追求“学而优则仕”理想的文士群体不断壮大，加之传统中国的德性政治即是“以士大夫的人格表率为核心，通过个人的修身努力，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并将儒家的道德精神贯穿到政治实践之中”<sup>⑤</sup>，故而孔子的“仁政”、孟子的“民贵君轻”等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也开始根植于云南少数民族士子心中，使其在仕宦期间与各地百姓无分彼此，感念民生疾苦，于诗歌创作中时有流露。

前文提及的白族诗人李元阳与师范均以科举入仕，李元阳《施贫人棺裘或问其故以诗答之》中有“果报未须徵释老，求仁何敢负尼丘”<sup>⑥</sup>句，引了出自《论语·述而》的“求仁”一词，字面意思是说因果报应之事不必寻找佛道两家的经典来验证，追求仁德是因不敢辜负孔子教诲，言下之意儒学足以对人形成道德规训。《赠杨东周、王元甫辞廩求志》（《云南丛书》21册11074页，《中谿诗集·卷一》目录中，诗题“杨东周”讹为“王东周”）中又云“曲肱双涧枕，掉臂五侯堂。尼父宫墙望，颜回箪食香”。<sup>⑦</sup>以孔子“曲肱”、颜回“箪食”之乐抒发志向，劝勉友人，其对儒学先哲之认可足见一般。孟子的“民本”思想则多体现为李元阳的诗歌中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及对民生疾苦的书写，如《苦雨叹》：

檐溜滴不绝，寒意入衾裯。哀彼茅屋人，相向双涕流。

玉桂悲粒薪，宁思身上裘？门无丁壮儿，徭役何时休！<sup>⑧</sup>

苦雨连绵，寒流入侵，寒意甚至透过了“衾裯”，使得居住茅屋的穷苦百姓无法抵御，只能“相向双涕流”，此为“天灾”，而无休止的抓兵拉夫，充当劳役的“人祸”也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尾句“门无丁壮儿，徭役何时休！”既是诗人对残酷现实的质问，也是其心系民瘼，以民为贵思想的体现。与之类似的作品还有《农家苦雨不得刈麦》《久雨口号二首》《征妇怨》《去妇词》等，其“希取君王不崇武”<sup>⑨</sup>“愿郎悔悟怜小儿”<sup>⑩</sup>等句，无不体现了儒者心系苍生的仁者之心。师范与李元阳一样勤于政事，在其现存诗作中，关心民生疾苦的作品，具有显著特色，以《月牙侧》《采榆树》《大麦黄》《碱滩哄》等最为精彩，表达了诗人对百姓困苦的深切关怀，诗

① 沙琛：《点苍山人诗钞》，《云南丛书》第28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712页。

② 朱熹集传、赵长征点校：《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41页。

③ 朱熹集传、赵长征点校：《诗集传》，第100页。

④ 沙琛：《点苍山人诗钞》，第14716页。

⑤ 许纪霖：《“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85页。

⑥ 李元阳：《李中谿全集》，第11148页。

⑦ 李元阳：《李中谿全集》，第11089页。

⑧ 李元阳：《李中谿全集》，第11106页。

⑨ 李元阳：《关山月》，袁文揆纂：《滇南诗略》，《云南丛书》第3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514页。

⑩ 李元阳：《去妇词》，袁文揆纂：《滇南诗略》，《云南丛书》第3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514页。

人在《感遇四首》其四中更是将这种情感发挥到了极致：

作吏如作妇，揣味调咸酸。先入小姑口，借博阿姑欢。情伪匪一致，法令犹多端。

十羊而九牧，此事占所难。我心即民心，民安我亦安。忠恕有大道，何论猛与宽！<sup>①</sup>

法令多端，十羊九牧，是诗人对贪官污吏的大胆揭露，而“我心即民心，民安我亦安”则体现了其愿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高尚品德。全诗大义凛然，光明磊落，字里行间充满的浩然正气。师范一生奔走，虽官居末品，但心系百姓，治望江八稔，两早两水，其为民请赈，忧劳臻至，勘测灾情，身先士卒，期间所作《勘水感赋》《祝龙》《早极喜雨》等均彰显了师范心系百姓，体恤民瘼的儒者气质。

历史学家黄兴涛先生认为，按照“大一统”理论，“华”“夷”是可变换的，而区别“华”“夷”的最高标准是文化，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符合这个文化规范的是“华夏”，不符合这个文化规范的是“夷狄”<sup>②</sup>。明清云南少数民族以华夏自居，其根由即在于此。少数民族诗人将其族群对汉文化的认可与自身创作实践相结合，二者形成良性循环，温润人心，在繁荣其自身文学创作的同时，亦进一步巩固发展了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心中的中国国家认同。

## 五、结语

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这一主体，不同民族频繁接触，相互影响，彼此交融。云南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是一种归属感和自豪感的体现，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重要文化力量。从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国家认同对于民族团结与融合的重要推动作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就处理不同文化关系总结了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今将之用于概括明清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交融关系也是恰如其分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二者在交融中相互促进，共同成长，均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要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sup>③</sup>诚然，古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不可避免会受其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等的制约和影响，明清云南少数民族诗歌中流露出对封建王朝国家的认同感与今天所谈论的国家认同存有一定差异，但其内核本质里对所属国家（或者说政权）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接受与认同，依旧是当今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今人在学习研究，应用发挥时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充分发掘维护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文化资源，激发古典文学作品活力，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最终共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郭周静

① 师范：《师荔扉先生诗集》，第14371页。

② 黄兴涛、刘正寅：《“中华民族”观念形成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2年11月11日。

③ 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党建》2014年第10期，第7页。

#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年 1—4 期 (总第 89—92 期) 总目

## 特约稿

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准则和遵循

——学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 张献生 (2.5)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毛泽东关于“人民”概念创立与运用的历史考察及意义辨析

…………… 李维昌, 王阳宇 (2.15)

新中国成立初期德宏民族贸易研究 (1950—1965)

…………… 陈思洁 (2.22)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逻辑、经验与启示

…………… 林华山 (3.5)

百年统战历程 生动云南实践

——“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在云南的实践与探索”理论研讨会综述

…………… 马弋涵 (3.12)

百年党史中党内主题教育的特点规律与价值启示

…………… 祝 滢 (4.5)

百年大党理论自信的历史透析与时代启示

…………… 赵庸惊, 孙发平 (4.13)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 李俊余, 刘会柏 (4.22)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三个维度 …………… 陈昌荣 (3.18)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关系模式的内在逻辑与功能意义

…………… 李 娟 (3.24)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

…………… 吕鸣章 (3.34)

从十月革命到苏联再到俄罗斯的历史巨变

…………… 李亚强 (3.40)

统战理论与实践

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社会阶层变迁

…………… 张艳秋, 刘江东 (1.5)

云南统一战线服务“三个定位”发展研究

…………… 李晶燕, 邓青州, 胡 昭 (1.13)

费孝通先生“云南三村”调查的调研经验与启示

…………… 杨春华 (2.32)

“互联网+统战宣传”: 助推云南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

…………… 李应伟 (2.38)

新时代统战视角下的保山市华侨华人文化研究

…………… 李熙春 (2.44)

高校海归教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初探

…………… 杨美新, 郭燕萍 (3.49)

大统战视阈下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现实路径

——以玉溪市为例

…………… 李昆裕 (3.54)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 形态与逻辑

…………… 骆 平 (4.30)

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话语建构的历史演进

…………… 董海军, 邹娟婵 (4.37)

统一战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云南实践研究

…………… 王寅平 (4.45)

云南统一战线智库建设座谈会综述

…………… 李亚强 (4.5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边境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研究

——以云南 W 学院为个案

…………… 兰良平 (4.58)

云南民族团结经验示范的三重维度

…………… 杨松禄 (4.64)

云南各民族共同性的历史形成与强化路径

…………… 叶 莹 (4.69)

协商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	徐 敏 (1.8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论述中的人民政协特质优势探析	现代华人“异中求同”的艺术创作 ——以郎静山摄影中国化和张大千泼彩抽象化为例 刘梅琴 (2.88)	
王 艳 (1.20)	《水经·穀水注》中的错简、脱文与汉魏洛阳城及其周边水系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研究	罗金洪 (1.27)	杨萧杨 (2.99)
协商民主：“共和”话语中的文化与实践	吕承文 (2.50)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的运行考察
参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研究	张 星 (2.60)	邵 宇, 孙玲丽 (2.108)
论人民政协界别制度与组织优势的效能优化	李旭辉, 江生亮 (3.60)	对“‘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的思考
新时代协商民主：逻辑、理论特征与实践价值	周宗耀 (3.71)	魏永琴 (2.116)
民族研究	云南水族文化传承及发展研究	方 琳, 李云兵, 张 横 (3.94)
彭桂萼与云南边疆民族研究述论	杨宝康 (1.32)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
佤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重构研究	杨逸平 (1.41)	张 璐, 许 焯 (3.101)
——以临沧佤族为例	孙 敏 (1.50)	云南故事
民族地区乡规民约对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作用研究	卢石英, 周朗生 (2.67)	红军长征过滇西北贺龙的统战工作实践及启示
国家治理视域下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三重逻辑意蕴	董国菊 (2.75)	陈金星 (1.92)
从少数民族传统节日谈民族文化自信力的养成	曹 莉 (2.82)	牢记初心使命 传承善洲精神
——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尹记远 (3.82)	张倩倩 (1.99)
边民补助：一种陆地边境治理的政策机制	李 贞 (3.89)	发展问题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开展民族工作的历史贡献	文化治理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中的现实意义研究	以四种思维方式把握中国当前发展机遇优势论析
尹记远 (3.82)	——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	艾丛路, 廖小明 (1.106)
文化治理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中的现实意义研究	李 贞 (3.89)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论析
——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	李 贞 (3.89)	钟启超 (1.116)
历史与文化	清代云南人与台湾治理及台湾诗文书写	我国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陈友康 (1.63)	近三十年许德珩先生相关研究述评与展望	吴 韬 (3.108)
胡 辉, 宋宁刚 (1.78)	从传统到多元：海外华文教育研究的发展变化	大学生公益创业融入社会治理：逻辑、功能与进路
		苗江欢, 熊天露 (3.115)
		法治建设
		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反腐法治理论三重逻辑
		戴晓静, 张茂杰 (4.78)
		论犯罪预防的依据及措施
		路云珊 (4.88)
		文化建设
		文化治边视角下的边疆统战文化建设
		杨睿哲 (4.94)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红色抗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李际卫 (4.103)
		明清云南少数民族诗词中的“国家认同”研究
		高云翔 (4.109)



#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重点征稿方向

## 一、参考选题方向

- (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 (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
- (四) 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
- (五) 国家统一方略与港澳回归的历史经验研究
- (六) 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
- (七)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 (八) 统一战线基本理论、范畴与话语体系研究
- (九) 坚持和加强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历程和经验研究
- (十) 统一战线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究
- (十一) 新时代坚持统一战线的政治路径研究
- (十二) 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 (十三)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 (十四) 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运动的历程和经验研究
- (十五)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治理研究
- (十六)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研究
- (十七)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
- (十八) 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研究
- (十九) 民族理论中的“大一统”思想研究
- (二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研究
- (二十一) 新时代云南文化润滇的路径研究
- (二十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
- (二十三) 党的百年奋斗与世界历史进程研究
- (二十四) 中国共产党的天下胸怀研究
- (二十五) 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
- (二十六)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研究
- (二十七)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研究
- (二十八)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
- (二十九)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理念和经验研究

## 二、相关说明

以上选题方向仅供参考，欢迎广大作者据此结合自身优势、研究专长和所关注理论、实践问题自拟具体题目撰稿。对参考选题范围内的来稿，本刊将优先选用，优稿优酬。

来稿篇幅以8000-12000字为宜，稿件要求主题鲜明、观点突出、论证充分、逻辑严密、富有理论性和创新性。文字复制比原则上不高于20%，引用不同文献著录不少于15条，体例规范参见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官网。本刊对政治不合格的稿件实行“一票否决”，反对任何学术不端行为。

投稿邮箱：[ynsyxbbjb@163.com](mailto:ynsyxbbjb@163.com)

联系电话：(0871)68091595、68091586(传真)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季刊,1999年创刊)

2021年12月 第4期(总第92期) 第23卷

主管: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办: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刷: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行:《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址: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编:650031

电子邮箱:ynsyxbbjb@163.com

出版日期:2021年12月20日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Started in 1999)

Dec. 2021 No.4 (Sum.92) Vol.23

Responsible Institution: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No.221 Wu Yi Road,Kunming City,PRC

Post code:650031

E-mail:ynsyxbbjb@163.com

Published: December 20, 2021

ISSN 1671-2811



定价: 9.00元